

右派言論選集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部資料
注意保存

右派言論選集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漢口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 耗 $\frac{1}{2}$ 開·6 $\frac{1}{4}$ 印張·160,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8,000

統一書號：3106·64

定 價：(4)0.48元

目 录

馬哲民的右派言論	1
第一部分：馬哲民在几次會議上的发言(摘要)	1
一、5月21日在政协湖北省委党派座談会上的发言(部分記錄)	1
二、5月22日在中南財經学院教职員工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2
三、6月3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摘录)	5
四、6月7日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	7
第二部分：馬哲民的反动綱領和在“鳴放”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言論(摘要)	9
一、馬哲民的几条反动綱領	9
二、馬哲民号召“吐苦水”	12
三、馬哲民在整风开始后在中南財經学院所发表的重要言論(摘要)	13
附：馬哲民的历史簡要介紹	24
耿伯釗的右派言論	27
一、6月7日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摘录)	27
二、耿伯釗的一些右派言論綜合	28
附：耿伯釗的历史簡介	31
晏勛甫的右派言論	34
一、在武汉市委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講話	34
二、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	36
附：晏勛甫的历史簡介	37

朱裕璧的右派言論	40
第一部分：在兩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40
一、在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召開高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負責人、省人委委員等座談會上的發言	40
二、在政協湖北省委會5月16日邀請醫藥衛生界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42
第二部分：鳴放中一些右派言論的綜合	43
附：朱裕璧的歷史簡介	46
鄧介松的右派言論	47
一、鳴放前的反動言論(摘要)	47
二、在中共武漢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49
劉叔模的右派言論	52
一、在中共武漢市委统战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52
二、在中共武漢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54
三、在民革武漢市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54
粟寄滄的右派言論	56
附：粟寄滄的簡單介紹	59
王一蛟的右派言論	61
程千帆的右派言論	64
附：程千帆歷史簡介	84
陸華柏的右派言論	86
一、4月24日在華中師範學院邀集的一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86
二、5月12日在湖北省文聯所召開的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88

三、5月12日湖北省文联举行的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的发言	88
四、5月18日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89
五、6月6日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91
六、6月16日在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扩大常委会上的发言	93
附:陆华柏的历史简介	94
章导的右派言论	96
韦卓民在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会召集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101
艾璋生的右派言论	106
一、在华中师范学院非党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106
二、6月4日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106
三、6月17日在民盟华中师范学院支部扩大会议上发言(摘要)	109
吴联辉的右派言论	111
一、5月18日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工分组会议上的发言	111
二、5月19日在民盟湖北省委座谈会上的发言	113
三、5月25日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工分组会议上的发言	115
四、6月12日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工鸣放大会上的发言	118
廖若平的右派言论	121
附:廖若平的历史简介	123
×	×
王一鸣的右派言论	125
李蕤的右派言论	136
第一部分:在大鸣大放中到处点火放毒的作品和书信的一部分	136

一、“注意脚边的小草”	136
二、“談嗅覺”	140
三、給姚雪垠的两封信	143
第二部分：在大鳴大放中各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146
一、4月間在“長江文藝”編輯部小整風會議上的一次發言	146
二、在4月30日“長江日報”邀請的部分學術、工程、文化界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	147
三、5月11日在湖北省文聯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49
四、5月15日在中共武漢市委召開的文藝界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	150
五、5月4日在中共武漢市委文教委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154
六、6月3日在中共作協武漢分會黨支部處理一個黨員錯誤問題的支部大會上的發言（摘錄）	156
七、在作協機關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一部分）	156
附：李蕪的歷史簡介	160
姚雪垠的右派言論	162
第一部分：姚雪垠的几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	162
一、創作問題雜談	162
二、打開窗戶說亮話	171
三、“蘆溝橋禮贊”中的一部分	184
第二部分：在大鳴大放中的兩次發言	185
一、5月24日在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座談會上的發言	185
二、在“文藝報”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	187
第三部分：給姜弘的一封信	189
附：姚雪垠的歷史簡介	190
江云在作協武漢分會作家座談會上的發言	191

馬哲民的右派言論

第一部分：馬哲民在几次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根据會議記錄、报刊发表材料整理)

一、5月21日在政协湖北省委党派座談會上的發言(部分記錄)

在解决人民內部矛盾上，过去是教条主义，党怎样講，我們也跟着怎样講。我个人过去是搖旗呐喊，党所好者好之，党所恶者恶之，完全依靠党，因此牆的形成，我也担了土，有責任。过去群众說民主党派是跑龙套，是尾巴，今天看这些批評是对的。过去我們帮了倒忙，但党要鼓励我們帮倒忙。特别是基层只准帮党的倒忙，如华中师范学院只准說好，不准說坏，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否則就看不慣。今后就不行了。我們过去拥护党講的話，不是自己的言語，而是党的話，实际上話可以不一样，而結論則可一样，过去是公式，是入股，以后應該散文式的做法，使党与群众結合在一起，才能帮助党正确的处理矛盾。

统战部是党的机构，但执行的是否是党的政策呢？不但党外，連党内也不知道。如剛解放时，我曾問李維汉部长统战部管什么？他說：不管政策，只管工作。有的說统战部是交际处。这就把我搞糊涂了，怎么不管政策而能管工作呢？現在明确了，特别是毛主席的講話。毛講，党内也有小資产階級，我看党内民主主义思想比社会主义思想多。大家都有两面性(都有小資产階級的影响)，

如中原大学搞小家当，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嗎？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中国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因此，如不从团结愿望出发，板起一付面孔，认为自己都正确，怎么会没有墙呢？毛主席是英明的，不是教条主义，他对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王国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張奚若講，中国如沒有毛主席领导，党能否胜利还是个問題。大家可以看，每次問題都是毛主席扭轉的，这次又是，这是值得我們深刻反省。因此，建議多在党内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很好的学习与体会毛主席的講話，提高政策与理論水平。其实党内教条主义也并不高，如艾思奇說是理論大家，实际上他是外行，只是因为他是党员，不敢批評他，党内理論家多是小资产阶级，与我們一样。現在领导文艺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論，如所謂人民性，就是主观的产物，而不去了解人民究竟喜爱什么。

二、5月22日在中南財經学院教职員工大会上的发言摘录(見5月23日“长江日报”)

我們对党是爱之深，望之切，故不能不責之严。院内党組織在对学校工作的推动与保証上是有一定成績的，但并不是沒有严重的缺点。如果說党的工作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那么这方面的缺点就更加严重。

院内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貫是照本宣科地講課，既死板又枯燥。即令这样，还犯了原則錯誤，例如，有人講課时說，一个人再过三十年要死，这是必然性；水灾旱灾，这是偶然性。其实，人过多少年死是偶然性，人要死才是必然性。又如，講联共党史时，不結合中国革命史講，教条式地奉为金科玉律，結果到苏共二十大党代会后，发现有問題，轉不过弯来，就干脆不講了。其实，以前生吞活剝地講固然不对，后来完全不講也不对，問題是要对照中国革命史、結合中国的經驗講，不要教条式地講，对联共党史中總結的經驗的优缺点，應該有判断能力。

院內的時事政策學習，不是不及時，就是時斷時續。院內時事政策水平的低下，可以從這樣的事實中看出來：有人把柬埔寨說成東埔寨；有些人對匈牙利事件的認識也很模糊。

黨的主要作用——在政治思想領導上的作用既沒有發揮出來，因此教學管理、教學質量的提高也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有些黨員自己對馬列主義理論也並未很好的掌握，只知道以書本理論及蘇聯經驗為金科玉律，而無獨立思考和創造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又只知運用狹隘的經驗，即游擊時代的經驗與中原大學時代的經驗。前者是鬥爭敵人的經驗，後者是搞思想改造、整敵對思想的經驗。總之，都是整人的經驗。

書本理論和狹隘的經驗不能應付新的形勢，就只能靠上級指示，就只能對這些指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體會其精神實質，只是當作命令來執行。正如張奚若說的笑話一樣：“靠毛主席吃飯。”毛主席的確英明，個別黨員未必英明。

教條主義搬到了教學改革上。用照抄蘇聯經驗來代替教學改革，出了不少笑話。有人問，講義算不算科學研究？這完全是形式主義的觀點，因為，如果講義寫得好，當然就可以算是科學研究；寫得不好，就不是科學研究。是內容問題，不是形式問題。

五分制是一種等級制，在俄國時代就有，並非蘇聯創造的先進經驗，我們却也拿來大事鼓吹。

全面負責、全面發展的教學方針在院內也未貫徹好，只是形式主義的貫徹，而不知道這主要是思想教育的問題。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在專政一天小一天、民主一天大一天的情況下提出來的。院內有的黨員同志卻還不了解。一位黨的負責同志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是指學術思想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指生活中的問題。”奇怪，思想上要民主，生活中可以不要民主嗎？

院內肅反成績如何？不久前黨代會說成績是主要的，我的意見是缺點不少，主要是波動面太大。原因是違反了中央指示，把

思想問題与政治問題、历史問題与現行問題混同起来了。这样，平时发发牢騷，就要挨斗争，岂不人人自危？

有錯必糾。上星期省委書記还对我这样說过，可是我院似乎未这样做。一个学生用叔父的名字考进了学校，肃反时因为他叔父是反革命分子，就張冠李戴地把反革命帽子戴到了他的头上，开除了。现在事情已查清，他要求回学校来，我同意，但是党組織不同意，說是用別的办法解决都可以，就是不叫他回来。这是什么意思？是維持“威信”嗎？这样的“威信”我是不要的。

总之，我院肃反中有严重錯誤，把非对抗性矛盾搞成了对抗性矛盾，要檢查。

有人說，党是自相矛盾，肃反时，說錯一句話就是反革命，現在，不向党提意見就是不进步了。下一次再来个运动，是不是又会整我呢？这說明他們不了解革命的辯証法，但也說明，党也并没有把这个道理講好。解放这久了，許多人还未掌握革命的辯証法，我觉得丟人，也为党丟人。这是政治思想工作未做好的又一証明。

前不久院內开了党代会，也有很大的缺点。党組織本来應該用毛主席講話的精神来深刻檢查自己的工作的，而事实上却与群众所希望的相差很远，足証認識不够。

問題是：院內黨員数量虽多，但力量并未發揮出来。宗派主义和宗派情緒严重。党与群众之間，中原大学与非中原大学之間，黨員彼此之間……都有宗派。

真正的无产階級政党是大公无私的。不能大公无私，对群众差别看待，就是宗派主义。一个宗派就有一副有色眼鏡，戴上三副有色眼鏡，就会看不清人了，也沒有团結的愿望了。解放后，我觉得一些共产党的老朋友的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驕傲自滿起来了。要知道，誰摆起四方面孔，就不是共产党员；群众如果对党感到害怕，就是对党的侮辱了。

学校党組織在貫徹知識分子政策上也有很多問題。如对老教

师特别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首先是缺乏团结的愿望，信任不够，培养不够，对他们的进步和作用估计不够。其次，对他们的安排使用不合理，也不放手，并且没有很好的进行说服工作。

以党代政的现象是严重的。党外有职无权，党内则无职也有权。我这个院长，对教务处总务处的许多事都不知道。在系里，秘书（多系青年党员）可以当系主任的家。好象党外人士一定是被领导似的。

照形式逻辑来看，这似乎有道理：党是党员组成的，党的领导就是党员的领导，反对党员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可是，照辩证逻辑来看，这就不对了。党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领导，而不是包办一切。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而不是一党专政。只要党能监督得好，非党人士的领导也是党的领导。

今后党要集中力量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分散力量，一切都抓，这样才能真正搞好党的领导，联系好群众。如果学校中一切都要党来负责，那我这个院长可以不要了。党代会的报告中，连茅厕没搞好都要党负责，这难道不是分散力量吗？

党与非党，都是为了革命工作。搞好了工作，非党员也就等于党员。没搞好工作，党员也就不成其为党员。

这些，只当作向党提意见的开始。

三、6月3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

谈会上的发言摘录（见6月5日“长江日报”）

在大专学校中，青年学生、工友和党的矛盾现在已经超过了高级知识分子和党的矛盾，成了学校里党群关系最主要的最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难解决。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党、团员，所以学生和党的矛盾还不能完全说是党群之间矛盾。

青年学生和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教育质量低，学生怕高不成、低不就，业务没有专长。原因是1.来院学习就是由统考分配来的，

不是自覺選擇的。畢業後統一分配又不一定能根據志願和長處。

2. 一些黨團員青年教師教學質量低。如何趕快提高教學質量，滿足青年人的求知慾望是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注意。

大專學校黨群矛盾的根源是，首先執行政策的盲目性。如學習蘇聯，既割斷了中國的歷史傳統，又離開了中國的現實，把蘇聯的經驗當成教條，盲目地套用。結果不但是毫無選擇，而且把好的也學壞了。如五分制是沙俄時代就有的，並不是蘇聯的先進經驗，我們也搬來了；但蘇聯大學的制度很好，可是由於我們沒有體驗，所以又學不到。其次肅反政策貫徹的偏差也很大，黨組織認為肅反是肅清反革命，受點冤枉不要緊，是個鍛煉，但群眾就不這麼想，他認為黨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什麼要整人民，認為是不尊重人權，這樣看法不統一，就產生了矛盾。第三，在人事安排上，黨偏重德，而且把黨外的都看成無德，群眾則認為有德無才怎麼能當教員？加上在工資、福利、培養等方面又都是先照顧黨員，這樣就顯出了特權階級，有人便說非入黨、團不可，否則只是奴才，不能當家作主。現在整風要邊整邊改，一些必須要解決的如肅反遺留問題，安排使用問題等等應及時解決，但是這還不能解決黨群關係問題，因為黨、群在認識上不統一，形式上看溝、牆已拆了，但思想的溝、牆仍舊存在，就達不到團結的目的。因此，必須研究黨群關係的矛盾。

要解決三大主義，就要解決群眾路綫的問題。黨脫離群眾的思想根源主要是老同志過去對敵鬥爭中，對敵人憎恨是對的，但現在時代變了，要從團結出發，要他們對廣大人民熱愛，這對他們很不習慣。當然，過去他們也是團結人民的，團結、熱愛人民本來是黨的目的，但是那時候主要是打擊、消滅敵人，因此團結人民發動群眾只是為了打擊敵人，目的變成了手段，本末倒置了，現在要他熱愛人民反而習慣了。其次是老同志產生了優越感，驕傲自滿，功臣自居，要求別人嚴，要求自己松，習慣於用命令或者是打通思想的辦法來貫徹政策，很少考慮如何將政策和群眾

的要求結合起来。党内思想有二种情况，老同志多是經驗主义，不能提高到理論上来。新党员則是教条主义，根本不懂馬列主义，两者結合起来就是主观主义。因此，党内馬列主义水平很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政策实質的掌握很不够，上級不指示就不能工作，三大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大专学校的领导要发挥集体的作用，现在学校有五条綫，即党、政、工、团、民主党派，实际上只有一条綫，即党的领导，其他四条綫沒发挥作用。

四、6月7日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見6月9日“湖北日报”)

(一) 与民盟有关的一些問題

1. 北京有人提出組織知識分子政党，即把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等合并为社会主义知識分子联盟。我觉得这問題在现在还有困难，解放初期就曾提出过，其根据是这些党派都做知識分子工作，党派間也都有历史渊源。当时提出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贊成，認為各民主党派都向国内外宣布过，不好随便解散。但好处是可以避免机构重迭，組織重复。

2. 民盟内部也存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間的矛盾。总部对地方不了解，也不大过問，存在官僚主义。地方干部很有意見，过去地方同志是靠当地统战部领导。以后民盟要发挥独立作战，而总部不领导，地方同志就会感到苦恼。

3. 干部問題。现在一些基层干部政治水平低，在爭鳴中沒能够很好带动群众，担当起他的政治任务，盟員对他們不滿。

4. 相互分工問題。民盟与农工、民进、九三虽有分工，因民盟在各学校、各机关、各企业的知識分子中，早就有相当基础，因而就常常和这些民主党派碰头。现在要求加入民盟的人很多，更容易发生交叉碰头的現象。

(二)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問題

1. 过去党的統战工作是統上不統下，或上統下不統。以后这一問題如不加注意，“长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就不能很好貫徹。

2. 統战政策沒有全党貫徹，黨員对統战政策了解不够。很多黨員不懂得統战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現在这一問題更值得注意，根据新的形势，这一問題应提到更重要的地位才行。

3. 互相監督的作用还做得很不够。过去不敢提，認為这是与党分庭抗礼，对互相監督不习惯，沒經驗。所以过去的团結还是有些流于形式，互相監督的作用，沒很好發揮。今后絕不是形式的团結，而是要达到巩固和提高。通过爭鳴、批評与自我批評来提高。

(三) 对政协的希望

1. 政协的作用应很好發揮出来。政协的性質、任务和作用現在好象还不十分明确。好象可有可无似的。政协的任务應該是在党的领导下协助党和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就需要做許多具体工作。

2. 在扩大民主生活，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方面政协也有許多工作要做。

3. 对政府的監督作用。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好象不易發揮作用。我想，今后地方政协，应对地方政府起監督作用。民主党派在政协中是骨干，应起到骨干的作用，可加强民主党派联席会来解决。关于政治协商問題，过去做得較草率，对进行协商的問題，沒經過很好研究分析，討論不深入。以后对政治协商應該做到严肃認真，应加强思想性。

平反是政治問題或思想問題，不应是法律問題，有人認為是法律問題，这样处理不对。因为帮助党整风不是向后退，不是出于报复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大家团結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部分：馬哲民的反動綱領和在“鳴放”中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些言論（摘要）

（根據民盟湖北省委整理材料編選）

一、馬哲民的幾條反動綱領

馬哲民丑化、誣蔑、毒害黨，攻擊黨的各項政策，特別是攻擊肅反政策，知識分子（又特別是思想改造）政策，人事制度和學校黨的工作，到處搜集材料窺測方向，派遣幹部放毒點火，挑撥是非煽動鬧事，所有這一切活動，都決不是如他所謊稱的對黨是“愛之深，望之切，責之嚴”，而對他所指責的各項工作，真正從善意出發，糾正缺點改進工作，領導盟員幫助黨整頓作風。這從他為着毒害黨可以把象鼻子說成“竹筒”，為着挑撥人們的情緒，可以把“不是事實的說也是客觀存在”，可以把“片面”說成“幾個片面就是全面”，完全得到證明。（這有與古時指鹿為馬的大奸趙高，千古奇冤莫須有的丑惡秦檜如出一轍）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為着實行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最終達到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目的，馬哲民是從哪些問題上打開缺口，占領陣地，妄圖實現他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目的呢？

第一，“盟搞業務，黨搞政治”。

解放初期，馬哲民就認定了黨對大專學校的業務無人領導，1953年馬更公開提出黨搞政治，盟搞業務的口號，因而學校的教學改革，必須由民盟負責，黨應該把教學改革交給民盟，由盟包下來。民盟組織曾經把教學改革作為專業，並為此大開其專業座談會。馬哲民會親自起草通知寫代社論，出專刊，華中農學院的柯象寅等人就是這一主張的積極推行者，這顯然不是什麼接受黨的領導，當然更不是什麼加強黨的領導。這直接了當的就是把黨

搬在一边搞所謂政治，而学校的所謂业务由盟領導。（注意：学校里还有什么比教学这門业务更重要更丰富的政治內容？）实际上把党置于次位而盟居于首位。当时有人說这是把盟变成第二党，如果按照馬哲民的作法盟将会变成第一党了。有人說这是平分秋色，按實質講，这何尝只是平分秋色而已哉。这种主張，被明眼人識破，受到指責，当时表面上收回去了，标榜起他的“取消思想”，实际上馬哲民至今还是一有机会，春风吹又生。事实上根本没有息灭。財經学院学生业远仁揭露馬哲民积极主張取消党委制，高等学校內民盟一手包办。馬哲民今年5月22日“当作向党提意見的开始”对財經学院党作了一次全面誣蔑攻击的两小时講話，馬哲民曾对这次講話进行了充分准备（事前几天在政协座談会上及市統战部会上自己透露的），他这次講話一开头就开宗明义的說：“党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領導，而不是包办一切。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階級为領導的专政，而不是一党专政。”結束这篇講話时，他斬釘截鉄的說：“今后党要集中力量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分散力量，一切都抓。这样才能真正搞好党的領導，联系好群众。如果学校中一切都要党来負責，那我們这个院长可以不要了。”6月6日馬哲民在省委統战部座談会上又专门講了这个問題，他說“学校党委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領導，保証监督行政任务的完成，而不應該包办一切，以党代政。中南財院党委包办一切，削弱了政治思想領導，形成事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馬哲民排斥党代替党的这条綱領，解放以来他是始終如一的。

第二，自称代表小資產階級，企图組織知識分子政党。

馬哲民到处強調民盟和知識分子特别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集团，又特別強調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間大的特点，和小資產階級在中国的重要性，这实际意味着共产党不过代表着为数很少的工人階級，而中間大的小資產階級应当由民盟代表着。而民盟对知識分子則又是“改造知識分子的渡船，通过它为过渡时期总路綫服务”。那就是說，不經過民盟这渡船，知識分子是不能登彼

岸的，这样傳播，无非是为締造知識分子政党准备輿論。至于为什么要組織知識分子党，可以用馬哲民“贊成”而且認為“很好”的所謂“北京有人”和“我們的艾瑋生”，所提議的意見來說明。艾瑋生6月4日在武漢市委座談會上發言，認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應該是对峙的双方平等的称呼，不能以不平等对待。認為共产党大，民主党派却不大，小的无法監督大的，認為領導与被領導的关系不是平起平坐。艾瑋生是根据这样一些特点提議四党合并，成立知識分子政党“組織起来發揮更大的作用”的。馬哲民認為“这样的合并是很好的”。馬哲民对此是“原則上同意”只是“事实上有困难”，而这个困难只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反对，恐怕对国际上有影响”的顧慮而已。馬哲民除去“贊成”，“很好”，以外認為如果这个顧慮是不必要的，可以商量。在这里，認定馬哲民是一个主張組織知識分子党的野心家是有事实根据的。由此，也就找到馬哲民一貫热衷大发展，不能大发展就产生取消思想的根源了。为什么如此，艾瑋生說“組織起来發揮更大作用”，“平起平坐”，有人說是分庭抗礼。

第三，企图推翻国家的根本制度，陰謀資产階級复辟。

馬哲民假借“大家認為”发表自己的意見認為“全国人代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議为全国人代会所代替了，政协綱領为宪法所代替了，全国人代会成了最高权力机关，政协仅負团結改造的任务，事实上也就仅負有改造的任务了，因而，这就意味着政协无形中取消了，民主党派也无权力了”——（馬哲民是最不喜欢改造二字的，他說教条主义者一要改造；二要改造；三要改造；改造得抬不起头来。他強調調民盟搞业务，也有取消改造工作的陰謀），他談到政协以后要改变性質說将仿效苏联改成两院制（注意这是欺騙），政协可能改为相当于資本主义国家的上議院的形式（这是本意）它包括解决民族問題并加上監督权（在另一个地方馬哲民說还有否决权），人代会可能改成相当于下議院形式。如此就把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关系固定下来。如要长期共存，就要

考虑到制度上，各方面都有保证贯彻这一方针，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来时很重视政协，他们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很感兴趣。

馬哲民去年8月12日在廬山松門別墅的报告中最后十分明确的說：政协在解放初期是权力机关，但在全国人代会后就改变了，有人提出政协应该对政府有监督权，应成为上議院的性質。我主張这样提这个意見，虽然現在不能解决，但是我們要这样提。只有通过提意見，才能解决问题，不提問題就会永远存在，就放弃我們的組織責任。——总之，客观条件是好的，主要的还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限于篇幅关系，资本主义两院制，有着监督权（据说还有否决权）的上議院，同我們国家根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相容，勿須論述。馬哲民这样的主張，难道不是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嗎？馬哲民所謀划的盟搞业务，党搞政治，这里不是也在搞政治了嗎？一切謀划都不过是为了资本主义复辟。值得注意的，主張两院制，强调組織监督，正是章罗联盟与他們的各路專員与馬哲民、沈志远等人制定的反党綱領中的两条，难怪馬哲民如此肯定明确，大力贯彻。

第四，如果說馬哲民过去是平分秋色，分庭抗礼，那么，“鳴放”以来，就簡直在妄想取而代之了。取而代之当然不仅是学校取消党委制，而是准备收拾殘局。他认为党能否在群众中挽回威信值得考虑，当然只等他收拾了。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虽然用尽一切办法促其实现，但这不过是缺口而已。打开缺口，占领陣地之后，全盘收拾。馬哲民得意的告訴張云冕說“我們要放就放要收就收”了。汉阳县一中学生在右派分子馬哲民的信徒楊煥尧策动之下，决口就打开了一下。不过，“收拾殘局”，倒不需馬哲民集团。而馬哲民集团的殘局却正需好好收拾。

二、馬哲民号召“吐苦水”

馬哲民說：“高級知識分子内心确有苦水牢騷，因为在思想改

造运动中，特別在肃反运动时，使用极端粗暴的办法对待他們，对于他們的人权都不重視，在这些运动中，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們搞得
太苦了，太伤心了，……他們觉得，他們做人的起碼自尊心都被
毀灭了，这是他們再伤心不过的事情，因而他們对自己的生存意
义都发生了怀疑。（“光明日报”5月8日）

三、馬哲民在整风开始后在中南財經学院所发表 的重要言論（摘要）

（見7月21日“湖北日报”）

5月14日在院学委会上的講話：

“毛主席講話在湖北的学习还不大正常，原因是党内同志有些
抵触情緒……”

“毛主席講話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反映到經濟方面，有許多
問題要重新考虑……”。

“知識分子談到放都有顧慮，根据过去的經驗是有理由，怕
重复过去的命运，这是沒有掌握自己的命运，認為人民可以受摆
布……”。

“我認為党和知識分子是有矛盾，这是容易想象的。但是，党
和工人农民也存在一些問題，工人农民对党有很多意見……”。

“希望各系主任及院部負責同志充分准备，向党提出党的短
处，我們不應該有所顧慮……”。

“党的領導从制度上說还有些問題”。

5月16日在处室負責干部座談会上的講話：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議上說过，民主人士應該有职有权，如
果无权應該整一下，有些問題牽涉到制度問題。”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但不等于党专政。党决不能代政，我
認為这是一个制度問題，牽涉到政权實質問題。”

“如肃反、防汛,另外人事只是依靠党做,假如学校党委制撤销……人事一定要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事材料由党掌握,怎样来办好高等学校很成问题,中央也有宗派情绪。有人說党是有特权的,党员有威有势,我們象小媳妇,又怕党,又怕群众,不是党员就低三分。有人說人事处是閻王殿,害怕得很,如果搞了一点材料,就永远不能提拔,压力大得很,大家也怕得很。大家觉得是有很大的压力。肃反在我們学校打击面过宽,当时听说还有几个高潮,我怀疑难道我們学校就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一句話就推出其罪,这很危险……肃反不但未肃反,反而影响了团结。知识分子出身不好,不能因此罗織其罪,使知识分子与党更隔离。”

“这个制度究竟怎样合理,是有一些问题,党员是有权有职甚至无职有权,这应作为一个制度来研究”。

5月22日在全院教工大会上的講話:

如果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那么,学校党对于我們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便存在着很大的缺点。首先是政治課方面,所表现的是照本宣科,死板板的教条,真是“两耳不听天下事,一心只知教条搬。……”

“……党的自身,对馬列主义,对党的基本理論和指导思想,没有很好的掌握,为販来的馬列主义和苏联經驗的教条所束縛,当做金科玉律,沒有运用独立思考,缺乏創造力;也保有游击作风——打敌人这都是整人的經驗……例如肃反运动,把发发牢騷的,就認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邏輯。这是沒有对人民有团结愿望的表现;这就养成对別人不能有从团结愿望出发和治病救人的习惯和認識,就缺乏大公无私的精神。从这种思想基础来形成党性,而这种党性,又实在只有造成与群众更加疏远;不但不能克服矛盾,只有增加矛盾。”

“另外,学校里面也有些‘以党代政’的現象。以党代政,包办代替,形成党内与党外之間,有一条鴻沟,党员会变成特权阶级,

好象群众是为党员服务，而不是党员为群众服务。……”。

5月23日在原中山大学的四位教师座谈会上讲：

1. 广东先生放得怎样了？我还没有放完，各级党领导不能压，压不下来。

2. 昨天我的报告批评学校很厉害，你们可以不必顾虑，我的报告是对党员很挖苦的。对武汉鸣放能起推动作用的。

3. 学生快要放了，学生问题更难对付。

4. 谈话对党员是讽刺，也是教育。

5月25日在工人座谈会上讲：

工人工资太低了，以前我不知道。这样低的工资怎么生活下去呢？有几口人就不能维持生活。

5月27日接见工经系学生代表。支持派代表向高教部“将军”：

“你们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教学计划不合理，是有问题……”

“你们对高教部提意见，提要求，不要考虑可能不可能解决，尽管提，打破清规戒律……”。

“你们要派代表去北京，我个人是同意的，支持你们，但还要学校开会研究，才能决定，我们现在是集体领导”。

“官僚主义是很顽固的，我也赞成你们向高教部官僚主义将一军”。

对统计系毕业班的讲话：

“你们提出不要毕业考试，我非常同情，这种考试是教条主义的考试，的确是不好的。”

“教条主义很害人，我们学校完全是从人民大学来的，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堡垒。”

“你们不考试，希望大家最好能写一个心得代替考试。”

5月28日在院学委会上的讲话：

解决“鸣放”中所提出的问题主要要解决根本问题，制度问题。现在工人说，党员对我们比资本家还坏，过去还可以调换工作，今天就是大帽子压在人民身上。

接見農經系學生代表談話：

“我很同情你們的情況，培养目标實在不太明確”。

5月30日在學生代表會議上講話：

同學們提出的問題準備採取措施解決：

1. 培养目标不明確；

2. 由於目标不明確，由此教學計劃也不明確；

3. 与目标不明確有关的，是教學質量不高、不具体、不实用。因此，培养出来的人，不但当不到高級人材，而且还不如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人，这是大家的意見，这样有負同學的青春，又浪費國家的資金；

4. 由於这样，社会人士对財經人材不重視，高教部把我們排为倒数第一位，这也是同學們的共同看法，社会上把財經人員随便安插，工資比較低。同學們提的都是实事求是的，的确存在問題。特别是信貸、工經提得很多、很具体。

同學們提的問題有很大貢獻，对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今后，可採取每年檢查。

过去，我院做的总结，成績是主要的。是狗屁、胡話。我同情同學們的意見。今后在教學中一定支持同學們的要求。我完全同意能在学校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提到高教部和向社会呼吁。

這些問題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希望各班代表考虑一下。現在的教學計劃，是1954年全国高等財經院校會議决定的（有关經濟等的大学、各业务主管部門、計委、苏联专家等人），由这几个部門共同制定的这个計劃，是由大家主观訂的，完全模仿苏联教条主义。过去提倡，今天的苏联就是中国的明天。这样的計劃当然是不合理的。這個問題，高教部应負責任，把苏联的教學計劃当作法律一样，不准別人变更。在教材方面，也直接搬苏联的。因为高教部沒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当时高教部把人大当作母雞，由苏联专家培养一批青年教师，我們学校也有許多人人大毕业

教師。結果，造成一套蘇聯教條主義，而我們聯系中國實際又不行，只是一些零碎的補充。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提出以後，高教部指示各校可以酌情修改教學計劃，提出學校中國化，當時是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很不夠。我們也感培养目标不明確，但不象同學感覺得那樣具體。

上面解釋，是不是說我們沒有責任呢？不是的，問題是，我們做得還不夠。特別是一些老師還拒絕結合實際、照本宣科，應該打屁股，因為他們害同學不小。教條主義就等於叫同學們做一個書箱子。象這樣，只要同學們專學俄文就可以，蘇聯出一本書，就翻譯一本好了，成為一個懶漢。如果我們對教條主義不除，毒害就更大。過去缺點，教條主義是一個因素。高教部和人大是直接睡在蘇聯專家肚皮上，而我們是間接睡在蘇聯專家的肚皮上。

這個運動所爆發的同學們與學校的矛盾救我們了，否則我們就要破產。我們還要求同學們幫助我們解決青老教師之間的團結問題。同學們提出的意見不是不愛護學校，而相反的是愛護學校。發揮教授的力量，是解決我們存在問題的办法。同學們提出的問題，我們一定盡力做，滿足同學們的要求，請大家放心。

同學之間、同學與學校之間，應該團結一起，共同向著一個目標奮鬥。應合併的就合併，如工學院的工經系，農學院的農經系，要求與我們合併，信貸系短期也可以合併。

不過，一些問題不可能馬上可以解決，因為我們國家還將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不是那麼計劃化，如教師問題、分配工作問題，不一定個個恰當。如果我們不願意和同學們奮鬥，那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願意和同學們奮鬥而不能解決問題，那是客觀條件問題。

5月31日接見貿易經濟系學生代表講：

革命對於共產黨不過僅僅是一個名詞而已，我院的一切事情均由黨團員來決定，就是學生會也都由黨團員來領導和決定，根本沒有民主。

6月1日对貿易經濟系貿易专业学生講話：

“同學們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都是十分正確的，完全正確的。學校的專業問題存在的缺點和錯誤是很多的，如此下去確實要誤同學們的青春。所以，本學期結束前或者下學期開學前給同學們答复，否則我這個院長也不好和大家見面。

不是社會上不需要高級貿易財經人材，而是社會上經驗主義多了，理論人員少了。”

接見楊堯忠講：

“很好，你們一開始就抓住了主要問題，目標是有一個，就是教條主義，非改不行。”

“我們還要解決社會地位問題，並不是國家不需要財經幹部，主要是宗派主義，老干部這麼多，編制又這麼緊，當然人也用不上了。唉！我非常了解你們。”

在各班學生第二次代表會上的講話：

“國家是缺乏各方面的高級人材，今天搞財經工作的有兩路人，一路是經理、科長，很多是無理性知識的，他們靠經驗和上級指示工作，很多是盲干的。將來憑真才實學分配工作。

業務部門很好的分配畢業生工作，對分配不合理要抗議。”

在505教室召開的“行動委員會籌備會”上的講話：

“提高財經人員的社會地位是很合理的，過去高教部把財經學院放在倒數第一位，我也有這樣的感覺。過去我也認為大學畢業生應授予學士學位，曾向高教部提過，但他們不同意，我有什麼辦法呢。”

“專業問題，取消也好，合併也好，我沒有意見。但是站在你們青年的立場上，要怎樣提都可以，但是我是不好提的”。“這問題，學校解決不了，我同意你們派代表到北京去，我去北京不好提。”“要解決問題必須團結一致，我願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那是我的責任。我作了努力，問題不解決，那是客觀原因。”

接見貿易經濟系學生代表講：

“你們要求撤銷專業嗎？光是我同意而不經過他們（指高教部和合作總社），豈不是要說我無組織無紀律嗎？”首先就要找他們。

畢業生“分配不合理這是事實，確實浪費了你們的青春，儘快的把材料整理好，去質問他們，抗議他們。”

6月3日接見“專門委員會”主席楊堯忠等人講：

①學生也叫起來了，在蘇聯臭的東西也搬過來了，好東西也學壞了，唉！你們又吃苦了。

②你們可以在這方面（指專業培养目标問題，社會地位問題——編者）反映同學的意見，學生會是不行的，你們談好了。

③向各地發信發通電可以多一些也無妨。

④你們可以採集各系畢業生分配不當的例子，要典型的。可以叫畢業生回校開座談會，讓他們談談苦楚。

6月4日接見農經系學生代表談話：

“你們代表在高教部提意見我是同意的，你們去好說話，我去時當然也可以帶你們的意見，但我本身是一個國家幹部，那就只有站在領導的立場上講話，否則高教部就會批評我不負責，不從國家方面着想去考慮問題”。

接見學生會代表講：

“學生會也派代表到北京去？你們能不能領導他們？他們是不是相信你們？”

“學生會派代表，我個人沒有意見，派可以。你們最好到朱副院長那里去請示好了”。

“畢業分配工作不當……我對這樣學習蘇聯就不大同意……我們學校問題很大很難辦……”。

（馬哲民對學生代表的要求，從來都表示完全同意。這次學生會要求派代表他却表示了不同意見）。

6月6日接見工經系學生代表講：

“你們專業培养目标不明確，教學計劃不合理，是有問題……”

“現在高教部的權力下放，學校行政，系主任的職權比以前大

一些，教学計劃，专业問題，学校可以解决的，可尽量解决，但培养目标要高教部确定，要对口徑，学校不能确定……”。

“你們对高教部提意見，提要求，不要考虑可能不可能解决，尽管提，打破清規戒律……”。

“你們要派代表去北京，我个人是同意的，支持你們，但还要学校开会研究，才能决定，我們现在是集体领导”。

“帮助党整风是爱护党的表现，不要有什么顧慮，应该暢所欲言”。

“官僚主义是很頑固的，我也贊成你們向高教部官僚主义将一軍。”

接見綜合資料室代表講：

“不要着急，院党委领导水平低，一下子轉过来是不容易的，因此还要繼續鳴放，要改还要經過曲折的道路，我到北京去以前还須要放起身炮”。

武汉还不是大鳴大放，王任重回武汉后还没有鼓励大家鳴放。

接見“专门問題委员会”主席楊尧忠等人講：

“对于增派毕业班代表到北京去，我很同情毕业班的苦楚，我个人对多派几个代表到北京去沒有意見”。

“关于学生会也派代表到北京去，可能是朱副院长的意見。我是决不会派学生会代表去的，我看沒有必要”。

接見財信系学生代表講：

“从五四运动以来，我和青年搞在一起，很了解你們的心情，每个系派两个代表是行政會議通过的，我答应你們的要求，即使事情做对了，会說我独断独行，做錯了就更糟。我一向是遵照民主程序的”。

6月7日接見計劃系学生代表談話：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現在的中南財經学院停办，把它改为干部整訓班，另外再办一个“經濟大学”，只培养少数質量較高的学生。

这次各系代表到北京去，实际是成为一个中南财经学院代表团，但是院方不准称为代表团，这主要是党委会的意见。

6月9日对全院学生报告：

专业不专，这和教学任务以及学习的任务不符，大家学了不能用，学习苏联是盲目的，因此，学了不能用，教学质量非常低，培养的人材也是脱离实际的，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所以使大家感到浪费了青春，浪费了国家资财。

我们学校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关头，我同意大家到高教部呼吁。

6月11日接见“惊涛社”记者唐熾和問：

問：你認為我院学生的鳴放情况怎样？

同學們的鳴、放，基本上是健康的正确的，也是有意义的。抓住了根本問題，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学习，使国家能够培养更合乎規格的建設人材。也就是說，使我們的教育切合客觀建設需要。也暴露了党領導教育工作存在的矛盾——重大的矛盾。同學們鳴、放的内容，對我們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不僅起到推動作用，而且也取得了很大作用。我們今后的教育，要大力提高和改进。不然，絕對不能滿足青年的要求，根本就脫離了學生群眾，失去了教育的根本意义。同學們的鳴，使得以前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如青老教師的團結、青年教師驕傲自滿、教條主義的教學、盲目學習蘇聯的教育、學用不一致等等問題都需要作根本的解決。這一毛病，向來不易解決，這次非解決不可。也使得黨在教育工作中的領導所發生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非根本鏟除不可。所以，大學生鳴放的意义，就我們學校的觀點來看，是有特殊的意义。

6月12日对全院教工的講話：

“鳴放”以來的問題是，黨領導學校有些也不合理，黨的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最突出，在以上幾個問題上（指肅反、人事安排、工資改革、生活福利等——編者）都反映了宗派主義，起碼是兩重宗派主義，黨和非黨的，中大和非中

大的，甚至还有三重四重。

我們对鳴与爭要有正确的理解，鳴放本身就是爭，放就是为了爭，既然有矛盾就要爭，这也是辯証的。在学校里把一般性問題說了，但象无产階級专政問題，中央的体制應該怎样？这些問題都未說……

中国六亿人口，絕大多数是小資产階級，如农民、小手工业者、改造中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都是民主主义，所以要扩大民主生活。对这些人不能专政。将来工人階級也就要改变，我們不能把这—个階級观念老放在脑子里不变。

今后人民內部关系，不仅是平等，目标基本上一致，剝削被剝削，統治被統治的差別沒有。就共产党員來說，就應該大公无私，不能戴宗派主义的帽子，要貫徹真正的人道主义，要認清大家都是人……这样就可以把狹隘的階級仇恨消除掉。

共产党要热爱人民……不能蹂躪人民，打击人民。今后人民內部的差別是共同进步中有进步快慢之分，而沒有更大的区别。工人階級的特殊性共产党員的独特性不要強調。

6月14日答“紅色游击队”記者問：

問：你觉得毕业班派系代表，从現在看是否必要？

答：毕业同学要求的問題是社会地位和学用一致的問題，朱明远院长的意思是不要去，他主要是傳達高教部的意見，因为其他各单位去的代表很少，而我們去的代表最多，上海財經学院就沒有。此外我院已經有代表去了，他們对我們所提的是可以帮助提意見。并說每个人去北京要100—200元，这对財院是个浪費。所以我的意見还是不要去好。至于这两个問題，我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

問：你不同意“大鳴”之后必有“大爭”，你認為在“鳴”的过程中就有“爭”，但我院前一阶段只有“放”而少“爭”，今后如何深入“鳴”呢？你的看法如何？

答：“鳴”的本身就是“爭”，鳴和放是暴露矛盾，我們的“放”

本身就是“爭”，人民向党提意見就是“爭”，“大鳴”本身就是“爭”，以爭為主，它的表現就是放，這是一個問題的两个方面，沒有“爭”就沒有“放”的必要。“爭”按辯証法來說是“否定之否定”，它能使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在今後的鳴放過程中，可以討論以下問題，如“專業不專”“學用不一致”，“教學質量不高”，“培養目標”，“對肅反問題”“黨同群眾的關係”，這都可以進行爭論。

問：你說章乃器是落后了一些，但反對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是進步的。關於這個問題，你是否可以補充一下？

答：章乃器的說法無疑是錯誤的。章說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其實這個問題只有講清道理；就連資本家也承認。例如，我曾和私方代表（震寰紗廠）談過，我說你們有兩面性，因為你們有進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新的影響也有舊的殘余。所以說你們有兩面性，他聽起來很容易理解，結果也同意了我的看法。資產階級，我看就兩面性的問題，在我的思想當中，我認為很多人都是有的。真正是單純一面性的人全國不是很多。但教條主義弄不清這點，他們採用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就章乃器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後一直朝着進步方面走，不過也進步的很不够、資產階級思想較濃厚，馬列主義搞不清，今天的言論就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所以說他是落后了一些；不過這些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們可以坐下來談，不能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今天主要是幫助黨整風，主要是除“三害”，不是整民主人士。

盧郁文的發言是不合辯証法的，拆牆是雙方面的看法是不合乎矛盾論的，他否認了矛盾的主導方面。目前在“鳴”“放”過程中有兩種人，一種是機會主義，例如儲安平；另一種人是用教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例如吳大琨和盧郁文談的一些理論，象這種種教條主義的“爭”，我是不願意“爭”的，因為沒有什麼意思。

問：你認為本屆畢業班同學分配時要不要改行？

答：如果存在學用不一致的話，是可以改行的。事實上，目前我們的培養計劃已經打破了，並不是什麼計劃分配的問題。

問：如果毕业同学自己提出改行的話，学校方面是否允許他們改行？

答：所以今天問題不是怕同學們改行，而是怕同學們不愿改行，如同学提出，学校是同意的。

問：北京代表問題，我們認為現在是沒有什麼作的了，是否学校可以派他們回来？

答：当然他們如沒有解決問題是无法向同學們交代的，怎么回来呢？

另：很多人有两面派，真正沒有的在全国是很少，沒有几个人，共产党也有两面性。

附：馬哲民的历史簡要介紹

（根据民盟湖北省委员会整理材料）

馬哲民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务委員，民盟湖北省委会及武汉市委会的主任，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員，中南財經学院院长。早年曾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后退出；也曾加入过共产党，旋脫党；晚年曾加入民主同盟，后背盟。作过国民党中央党部文書主任；任过国民革命軍軍政治部秘書；投靠过改組派，給他們写过文章，当过改組派和第三党的大学教授。历任北京大学等多年的教授，有一段时期冒名列邓初民、黄松林等进步教授之林，也称为进步教授。入盟后曾編过民主报等报纸。1933年在北平曾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入獄，經人保出。1947年在重庆被捕，拘留四小时被張篤倫釋出，从此依附張氏，不久即向張氏声明背盟。回武汉寄居張氏的新聞处，被任为湖北农学院教授。解放前后，再度从事盟的活动，几年来，披着进步外衣，背着进步教授的头銜，和老民主人士的荣誉，承受了人民的重托和广大盟員的信任，担負着人民代表，民盟負責人，大学教授的职責。

但是，馬哲民披戴着这些荣誉，肩負着这些重任，几年来，作的什么勾当呢？

解放初期，民盟进行整頓，清洗了他招罗的一些社会渣滓，流氓地痞特务分子，他无限痛惜。关于民盟在大专学校的活动，他主張党搞政治，盟搞业务。实际上是把党置于次位，把盟居于首位，排斥党对大专院校的領導。置学校于盟領導之下。取消党的領導的思想，这时就开始暴露。当时被揭露批判之后，不是真正改过而且蔭蔽发展，今年鳴放期間，又极力主張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党专作政治思想領導，責备党不应包办一切，強調民盟是知識分子的政治集团，是知識分子的渡船（无此渡船或不上渡船即不能登岸），強調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間大，为組織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政党准备輿論基础，准备組織大党与共产党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在国家根本制度上，馬哲民主張把政协改成資本主义国家的上議院，并賦以監督权和否決权，把人民代表大会改成下議院，这样的两院制，就不可能与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无产階級专政）共存并容，就不可不是資產階級复辟。这就不是什么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直接了当地就是取而代之了。

馬哲民包藏資本主义复辟的禍心，在党的整风期間，假借帮助党整风之名，暗下毒手。敌化、誣蔑、毒害党和黨員，把黨員說成业务水平低，而且政治水平低，黨員是无才便是德，是特权階級，是极端主觀主义，思想水平低能万分，能否在群众中挽回威信值得考虑（馬哲民为我們忧虑了），一团漆黑，請他入党他都要考虑入还是不入。还有人事工作是鬼門关是閻王殿，肃反是杀人邏輯。党委制越来越阻碍高等学校的发展。知識分子有苦水，恨死人事科，工人农民，劳动模范对党也不滿意，而且还超过了大学教授的不滿。党很危險，需要他来救党。一句話，一切能找到的恶毒字眼，馬哲民都加在党和黨員身上了。这一点，絲毫也不落在章罗联盟其他分子之后。然而，馬哲民并不只停留在言論的毒害上，他还派遣干部，一个月內到43个单位在175人次，点

火放毒，挑起向党进攻的斗争。避开党召开会议，串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起来（组织联合机构）向党攻击，逼党员下台离校，立刻动身（工学院右派分子追问党委负责人何日动身走），诱导启发右派分子造谣诬蔑，说把象鼻子说成竹筒也可以，不是事实也是客观存在，几个片面就是全面……。要人们吐苦水，发牢骚。策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以及暴乱（汉阳事件就是马集团的信徒杨焕尧一手策动的）。为了加紧反动活动，一个月內，马哲民集团出版13期（每周三期）工作简报，专门刊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经验，散发到全省一切民盟组织和全国省市盟机关和罗隆基本人。马哲民是何等紧张指挥向党进攻。

正是由于马哲民向党进攻太不避讳人了，“收拾残局”，资产阶级复辟的心太急切了，所以他的一切反动活动很快就被人们——社会人士和广大盟员所揭发了。人们警告他认真反省低头伏罪，仍给以适当出路。但是马哲民从没（至今还没有）答复人们的要求，人们的要求不是别的，至今也还不过是毛主席所指示的——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耿伯釗的右派言論

(根据湖北省第一届人代会第五次會議秘書处所整理材料选編)

一、6月7日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

(摘录)(見6月8日“湖北日报”)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監督問題，我談的是个别黨員的情况，党是偉大光荣正确的，沒有問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敏感，有的人本来滿腔热情，想靠攏党，向党学习，黨員对他冷淡，不免寒心，这就变成了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消极因素，对国家建設沒有好处。党是信任知識分子的，但个别黨員不这样，如果不信任知識分子，就不用他，不要把他当作花瓶来点綴，什么都对他保密，使他沒法工作。党的領導干部要充分認識民主党派的作用；民主党派如有問題，应帮助解决。要把他們当作眼睛、耳朵、鼻子，不要当作眉毛，現在是当作眉毛，可有可无，沒发挥作用。統战政策不光上面重視，还要推广到各县、各乡、各个角落，每一黨員都有作統战工作的义务。民主人士，民主党派也要加强学习改造思想提高自己，才能和党的整风配合得上。

毛主席真英明，他在国内反对大汉族主义，使少数民族对党心悅誠服；在对外关系上反对大国主义。这次提出整风运动，据我的体会，也就是反对大党主义，不要黨員人人以領導者自居，盛气凌人，建議毛主席把这話明确起来，这对党的威信有益无損。

有人在“人民日报”提出反宗派主义就是反对党的天下，反对家天下。我同意这个说法，又不同意。宗派主义发展起来，后果严重，象满清只相信满人，不相信汉人，结果亡于宗派主义；蒋介石信任四大家族，信任浙江人，结果被赶出大陆。现在共产党的宗派主义还不十分厉害，但发展下去，或将为清蒋之续。反对宗派主义，就要充分发扬民主，民主不过是一个原则，要靠法制来保证。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但“三害”不除，继续发展共产党也不能长存，何况民主党派；现在要作到互相监督，只有互相监督，才能长期共存。

最后向党提出十条建议：一、每个党员要提高文化水平；二、每个党员要学一种技术；三、从思想上根本铲除特权思想和行为；四、党员要联系群众，不要骑在人民头上；五、党员社会经验不足，要学习社会知识；六、要学一些待人接物的修养；七、党的领导同志要堵塞阿谀奉迎之门；八、起义军官定级不当，安排不当的要纠正过来；九、有职有权问题，要订出制度，划分清楚；十、要重视辛亥老人。

我热烈诚恳地向领导党建议，我热爱党，所以期望党更好地领导六亿人民，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好。

二、耿伯钊的一些右派言论综合

耿伯钊对新华社记者曲一凡讲：长期以来，以党代政的现象是普遍严重的，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指示和文件，上行下效，继而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均是党政联名发号施令，这样做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与威信。

他讲：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的职权截然不同，我根据很多人士的意见归纳起来共分为两类，一、党员干部是“有职有权”，“无职有权”“有职有权而无责”。二、非党员干部则是“有职无权”，“无职

有責”，“無權也有責”。例：有些起義軍官反映他們好象是一個皮球被踢來踢去，沒有固定的職權，但事情搞壞了卻有你的份。我耿老“年紀已老朽，雖有職無權，也不想爭。”

他講：“公私合營的私方代表，有職無權是事實，應當給他們以適當的權力。”

“省政協副主席六、七人，實際經常駐會工作的是周杰一人和幾位秘書長，說來也真難為了他們，有職無權，周杰身雖是一位副主席，一切事還得聽從黨員秘書長、甚至黨員科長的吩咐而往往還受得許多冤枉氣。有人為民主人士的處境送八個字‘希承意旨，伺候顏色’。黨若把事交給人家做還是可以做好的，但是不放心，不肯付之以權，說的難聽一點，有些黨員對待民主人士“如防強盜一般，生怕洩露秘密”。

“參事室，除人代會起草和審查提案、法規等工作外，長期沒事干，所謂‘拿餉吃飯’的機關，叫大家學習，事情不順也學不好，以前有一個秘書主任——×××，以×××為依靠，專橫霸道，作威作福，包辦一切，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我這個主任，也只是掛名‘當個傀儡而已’”。他又講：“統戰部的工作是統小人不統君子”，“親小人，遠賢臣”。

他講：“我原本是一個愛講話也敢說話的人，解放前蔣介石統治時那樣凶狠，我耿某沒有怕過他。”

“解放後我還是敢講話的，自從受到×××公開打擊和明目張膽的對我們進行監視後，我氣憤，從此我就不講話了，後來我才明白了，凡是对黨善于阿諛奉承的人（有人說這是鑽狗洞）就受到統戰部的重視，官位步步高升，反之，經常向黨提出一些善意批評的人，正直的人，被認為是頑固落后分子，打擊的對象。”

“×××為人態度粗暴，惡劣，在他主持統戰工作的時期內，使許多民主人士傷了心。我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三視’即‘中央重視’‘省里輕視’‘縣里鄙視’。×××說我是‘胡說八道’，從此我耿某更成了統戰部的眼中釘，後又派來一個×××監視我，好吧！”

我干脆搬到参事室楼上住，讓你監視个方便，如果我說的不是事实‘可以杀头’”。

他对新华社記者曲一凡講：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儲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的意見，提得很好。我打听后才曉得儲是“光明日报”总編輯，这也是給新聞界增光。

他講：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的一個大党，但黨員只有一千多万，比起六亿人口还是少数，如果共產黨員以領導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視民主；人民是受不了的。又說：“中国有六亿人口，共产党只有一千多万，分开打一架，看誰打过誰。”

耿伯釗在东湖疗养院对朱鼎卿講：“旧社会人家說黃埔学生是蝗虫，我看今天的共產黨員也是蝗虫”，并說：“我一看見与我意識不相投的共產黨員就不順眼。”

他对彭伯助参事講：“我們民主人士要有自尊心，不要靠攏共产党”、“共产党可以馬上得天下，也可以馬上失江山。”

他講：“斯大林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話的語气就不合理，而实际上是助长黨員的特殊思想。”又說：“共产党还不是他們父母交合的血液。”

他在1955年某日对徐宪章說：“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

他說：“建国八年，法制工作搞的很差，目前除婚姻法外几乎沒有别的成文法律。”又說：“旧的否定了，新的就拿出来，当然国民党的‘六法’不好，但就其具体内容來說，不見得都坏，古語說：‘旧瓶装新酒’，旧形式賦予新内容，仍有許多参考的地方。”

他講：“从几年的執法情况看，特别是三反，肃反，我完全拥护章伯鈞、罗隆基的建議，設立‘平反委员会’专门組織机构，檢查三反、肃反偏差，有錯必糾。”

附：耿伯釗的历史簡介

(1) 耿伯釗的历史

耿伯釗，原名勤文，曾用名楊太寶。男，現年74岁。恶霸地主家庭出身，湖北省安陆县人。

1903年中副榜（举人），1904年由張之洞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曾在滿清人果清阿手下任軍事教官，辛亥革命后当过黃克强的参謀长，大革命时参加国民党，充任武汉市三特区（德租界）管理局长。大革命失敗后，即动搖叛变，到南京找蔣介石充任参軍多年。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充任蔣匪軍軍事参議院参事（为湖北亡国論者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活动为伪国大代表，出席过伪国大会議、制宪会議。張篤倫任鄂省主席时，他为省府委員。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員，湖北省戡乱委员会副主任委員。解放前在武汉与白崇禧往来密切（师生关系），白匪曾利用他搞伪和平委员会，用要求和平名义电蔣下野，讓李宗仁上台。武汉解放前夕，耿为取得政治資本，在白匪逃走后即利用和平委员会作了一些治安工作，加入民革。解放后曾历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参事室主任、民革分筹会委員。現任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参事室主任、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委員。

(2) 耿伯釗历史上的罪恶活动

耿伯釗是安陆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衙門里吃黑飯的人，对人民敲詐勒索，是个十足的劣紳，耿伯釗繼承了其父的衣鉢，一貫压榨农民。根据安陆县双路乡农民楊大符的揭发，他种了耿伯釗一石六斗田，每年收获的粮食繳了租就沒有吃的，逼得他大儿子长年在外做工。1941年大灾荒，一石六斗田只收获了八斗谷，可是地租照样繳。

群众称之为“土皇帝”，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安陆县人民講：

耿大老爷在外面吼一声，平地能起三尺浪。耿大老爷在屋里吼一声，扬尘都要落下来。可見耿伯釗在安陆压詐群众的一般。

耿伯釗不仅是“土皇帝”，而且是有名的官僚政客。当談起辛亥革命时，他講他也参加了工作，实际上当别人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顛洒热血的时候，他却在南京向滿清亲王献春宮、陪喝白兰地，謀求升官发财之路。在討袁护法时，他講为此亡命三年，实际上他却在受袁世凱的豢养，在袁世凱將軍府当官。在汉口任特三区管理局长时，因保护帝国主义的财产，欺压中国人民有功，曾受法帝国主义馬克的表揚，并获得二千元銀元的报酬。如上事实說明耿伯釗政客之身分。誰有錢有势就跟着誰走，由滿清而軍閥，由軍閥又过渡到蔣介石。民族气节在他來講是无所謂的。

大革命失敗后，耿伯釗就投奔了蔣介石，当了蔣介石屠杀人民的劊子手，一跃又升为反共专家，当时鄂豫皖三省成为劊子手們的屠場，宁可錯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革命群众被匪徒們惨害，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摧殘，而耿伯釗此时正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員，策划反共。为了进一步摧毁革命事业，維持土皇帝的統治，耿伯釗真不愧为蔣介石手下的一員干将，他把胡宗南的亲信胡受謙保荐到安陆任伪县长，强征戡乱軍費，修建碉堡，弄得民不聊生。胡受謙并未辜負耿伯釗的重用，他到职不到五个月，就惨害我革命志士一百余人，搞得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严重的罪恶血債，怎能說与耿伯釗无关？

1948年，安陆被我軍解放，胡匪受謙自杀。耿伯釗亲自在武昌組織并主持追悼大会，会上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耿伯釗在会上說：“胡县长受謙在胡司令长官名下任參謀长时，正值陕北共匪蠢动，胡县长运筹帷幄，迭树功勋，他是文武兼全將領，頗为胡司令长官及蔣主席所推重。安陆素为共匪剿穴，自刘匪到大别山后，奸党潜伏分子积极蠢动，县长一职，沒有老成干練，文武兼全人物坐鎮，不堪胜任。我为爱乡心切，征求他的意見，那时上峰

倚界正殷，慨然不釋經就，这种服务桑梓热忱，实堪欽佩。到任之后，专重治軍，并将奸匪潜伏首要分子，予以处决，与奸匪战斗数次，都予匪軍以严重打击。2月17日匪軍集中大軍，向安陆进犯，胡县长率領县警乡团，登城亲自指揮，匪軍伤亡不少，終以众寡悬殊，县城淪陷，胡县长不愿遭匪凌辱，自殉于邑中报恩寺。（言至此痛哭）茲当戡乱方殷时期，胡县长以身殉职壮举，实为地方行政人員树一良好楷模。他的死不仅安陆不幸，也是党国严重損失。同时我因爱护桑梓，請他出任县长，落得这个下场，我也应負相当責任。（言至此又痛哭）死者已矣，唯胡县长素来廉洁，归来两袖清风，他的子女，尚屬孩提，我們急应呈請国府，优加撫恤，使一代完人，能瞑目于地下。”

从講話中可以看到，他对革命事业是多么残忍，对反革命分子又是如何关心。

耿伯釗的罪恶还不止于此，他为了繼續屠杀人民，亲自率領一些逃到汉口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紳，到伪武汉行轅及伪省府請愿，要求派孔鉄助担任安陆县长，并要求派飞机、匪軍，支援孔鉄助回安陆。就这样孔鉄助回到了安陆，繼續作屠杀人民的罪行。

此外，根据民革成員刘年芳老先生的揭发，耿伯釗曾向滿清政府告密，以致使辛亥革命湖北領导之一英祿貞被刺杀于奉天。

解放前夕，他勾結汉阳伪警察局长将其内弟用船騙到江心，推入江中淹死。这些血債罪恶，始終未向人民作过交代。

从这个两手粘滿了人民鮮血的反共专家历史来看，实在难以找到点滴和平因素。解放以后虽然政府未究既往，而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給予优厚的待遇，照道理来講，他該心悅誠服向人民悔过，立功贖罪。但是他却終日盼望蔣介石复辟，这次又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

晏勛甫的右派言論

一、在武漢市委召開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見5月22日“長江日報”)

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主席指示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最近中共武漢市委員會又一再號召我們提意見，由這些事實中，我感覺到共產黨是誠懇的，也是偉大的。

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很快，黨員們的出身好，成分好，政治條件好。但是，不一定每一個黨員的工作能力都強。解放以後黨的幹部政策重視德、才，不注意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不夠好的，這方面希望黨檢查一下，摸一下底。

我覺得黨的宗派主義是很嚴重的，黨員好像高人一等，表現特殊，一個人一入了黨就變了樣子，冷冷冰冰，一副官架子，一眼就看出他是入了黨了。還有一些投機分子，他們也鑽進黨內，他們中間有些人，看不起民革的成員，說民革都是一些舊軍、政人員，都是落后，亂七八糟。我看，黨如果不檢查一下，宗派主義是沒有方法克服的，是很危險的。

華中農業科學研究所，幾年來行政上和黨總支原來對民主黨派是相當重視的，不知為什麼現在情況不同了。他們的領導上喜歡阿諛奉承的人，不看自己缺點，只整別人。韓所長對民革的成員說：“拍馬屁你們都拍不上呢！”韓所長經常在報告中說工作中的錯誤應該由非黨的系主任負責，與他這個所長沒有關係。其他還有一些單位也是這樣，民革成員是到處受歧視的。

在肃反运动中，民革有些成員由于历史条件得不到党的信任，有些人被打錯了。搞得过火了一些，以致他們很消极。我認为这些知識分子應該得到信任，談起这些情况，有些人一直到現在还很痛心，这个問題應該得到正确的解决。

在工資改革与人事安排中也有宗派主义。中南財經学院民革支部楊时展將他們系內工資調整的結果作了一个統計。教授和副教授絕大多数是非党人士，他們的工資只增加了14%还不到，黨員團員的助教的工資却增加了35%。由此可見，党和非党人士的工資增加是有区别的。这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宗派主义。再举一个例子，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不重視非党工程师的合理化建議，楊世华工程师是民革的成員和李国齐工程师共同試制成功有筋耐压水泥管代替鑄鉄自来水管。中央开会要談这个問題，公司里却派了一个黨員副科长×××去了，沒有叫原发明者去参加會議，这个单位的行政和党組織宗派主义是相当严重的。

民革社会联系工作，是民革在統战分工中一項重大政治任务。現在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将近两千人，有一些人是有工作能力的，希望中共武汉市委和市委統战部重視他們，勿令他們长期失望。

針对上述情况，我个人提出四点建議。第一，要由思想上解決問題：共產黨員与非党人士，首先是共產黨員，对統一战綫的意义与作用，对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的道理，要有正确的認識。各民主党派所代表与联系的群众，就工作來說，是对党的分工，接受党的領導，起助手的作用。因为党与民主党派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为了建設社会主义。第二，从制度上取得保証：那些重要會議，允許非党人士参加，那些有关資料，允許非党人士研究，要明确規定出来。为了使民主党派的基層組織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应經常举行党派联席會議，討論有关重要問題，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布置工作时，不要把民主党派撇开，单独向党团布置。第三，从生活上交誼上培养感情：要提倡党与非党人士談交情，平时采取訪問、談天、文娛活动等方

法，增加双方感情，使彼此意見容易接近，逐步做到融洽无間，改变現在彼此之間冷冰冰的状态。第四，从人事安排上鼓励非党人士的积极性：提拔干部方面，要改变对非党人士的进步估計不足的情况。配备和提拔干部，不应只強調政治条件而忽視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非党干部要有升迁和調換工作的平等机会，用人要真正做到“唯賢”“唯能”，才能使非党人士有职有权。

二、在中共湖北省委統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見6月8日“湖北日报”)

我今天談一談非党人士对党的看法問題。

現在党外人士普遍感到的一個問題，是：“党对我是否相信？”

現在入党入团，都要看成分。党外人士認為唯成分論不好，成分好的人，不見得一切都好；成分不好的人，也不見得一切都不好。解放几年来，選擇党团员都看成分，这是不合理的宗派主义現象。肃反运动时，有些单位硬用5%的比例找对象，扩大了斗争的面，这也是唯成分論的一个結果。

解放后吸收党员太多太快，有些不好的人混进党了，这次整风，我觉得最好把党的队伍中一部分人审查一下。

佛經上說：“如何降服其心”，这就是說：若是你誠心誠意的帮助人，可以使人心悅誠服。現在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相信毛主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一切都从六亿人口出发，抓住了全国人民的心。有些党员、特别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人則不然，他們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天使，是改造人的人，瞧不起党外人士。这种人将来会不会变成“黃馬褂”，变成“新貴族”？党外人士很为他們耽心。工商界反映有一个党员說：“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我認為这个人真是狂妄自大。有些人說，解放前入党的有一部分人是恃功而驕，解放后入党的，是“无功自驕”。工商界的那位党员就是如此。

有人反映：党对党員寬大而对党外人士严格，在住房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比非党員好，他們提升的也特別快。天下本无事，由于对党員与党外人士待遇大不一样，結果鬧出了許多事情，使广大的党外人士普遍不滿。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監督問題，現在统战部一切都推脫不管，許多問題推出来叫我們自己商量。我們既有事向统战部商談，为什么不可對我們提意見？我以为统战部對我們是尊而不亲，怕伤我們的和气。这样是不能做到融洽無間的。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提出后，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台灣广播电台說，“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成绩是共产党的帮助下作出的”，又說“民主党派是摆样子的”，这固然是他們的看法，但我們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間的确还存在距离。我希望我們双方来拆牆，常常說些知心話，把我們的關係搞得更好些。

自从中央政府將联系社会人士的任务交給民革来团結教育、改造后，已經三年了。我們省市民革去年广泛开展這項工作以来，現在已联系了两千多人，统战部好象是采取不聞不問的态度，这样确实不好。其中却有不少的人，是可以担負各种工作的，我希望统战部在可能与需要的条件下解决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最后我要談一談湖北日报對我們不尊重的事实。台北人民反美示威游行后，記者請我写文章，我立即动手写稿交去了，但一直沒登出来。为什么既要找我写文章又不发表？我認为这是对我不够重視的表示，附帶在此說一說。

附：晏勛甫的历史簡介

(这个材料，是民革武汉市委员会整理的)

晏勛甫，男，現年65岁，湖北汉川人，家庭成分买办資產階級，个人成分軍閥官僚，保定軍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初，投靠軍閥趙恒惕起家，繼隨唐生智历任伪少將，中將參謀長，1932年

晏投在大反革命分子劊子手夏斗寅下任伪湖北省政府委員。1932年至1933年晏兼任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巡察組長，这是第四次圍剿工农紅軍时期，蔣匪兼任剿匪总司令，晏在襄河中游地区：天門、沔阳、汉川、潜江一带与紅軍第二軍团作战，屠杀紅軍与人民。

1933年至1935年又任蔣匪南昌行营第二厅伪中将厅长，专搞反共軍事情报特务工作，为蔣匪坐鎮南昌圍剿江西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反共最得力的左右手，晏为蔣匪策划第五次圍攻紅軍的工作，調集一百万匪軍，二百架飞机，在1933年10月对紅軍根据地开始总进攻，采取步步为营，实行碉堡推进的堡垒政策新的作战方針，分四路进兵向紅軍根据地內地压缩，特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这是晏的反共最毒辣最殘酷圍攻屠杀計劃，也是一笔罪恶滔天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35年至1937年晏助甫担任豫鄂皖边区剿匪督办公署第二区司令官和豫南清剿指揮官。晏是直接屠杀紅軍的大劊子手，在豫南地区：新野、唐河、罗山、光山、潢川、固始一带，屠杀紅軍高俊亭部革命战士很多，迫害进步青年和善良老百姓无数。

1938年至1939年晏助甫任伪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謀长。晏是花园决口策划人和执行者，花园决口当时的情况平汉铁路以东二十几县被淹成为汪洋大海，新四軍和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浩劫。由于花园决口使黄河的水泛滥到河南从桐柏山起，江苏从淮北起，安徽从皖北起的淮河流域，全长有八百公里的田房蕩然，使三千万人飢寒交迫，流离失所，这是晏助甫的滔天大罪。与此同时，晏助甫与肖作霖已結成反共的老搭当，肖在晏的领导下搞迫害青年的大集中营，其情况暗杀迫害，惨无人道，血債累累。

1939年至1940年，晏任蔣匪伪天水行营中将参謀长，这时的勾当是以战犯胡宗南三十万軍队封鎖西北，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专搞反共活动。

1946年至1947年晏任伪国防部测量局中将局长，出卖祖国领空权和国防秘密给美帝，亲自签订“中美航空测量合作协定”，还供给美帝测量三角点，晏并曾与美帝驻蒋大使司徒雷登勾搭进行阴谋活动。

1948年至1949年晏为竞选伪立法委员组织新十人团（特务组织）进行活动，后又投靠战犯白崇禧当上了伪汉口市市长。

武汉解放前夕，晏先把他的老婆儿女送到香港，自己准备以后再跟白崇禧走。当时，与我地下党有关系的地方人士都曾一致留晏，晏却到处磕头“求饶”要人家放他走，否则便求人家用手枪打死他，一边哭，一边对人說：“你们做好事放我走吧。”最后看逃不脱了，他表示可以不走，但提出三个条件：（1）解放后愿当老百姓，不作什么工作；（2）保有本人私有财产；（3）不在电台广播，不发表文电。

朱裕璧的右派言論

第一部分：在兩次座談會上的發言

一、在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召開高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負責人、省人委委員等座談會上的發言（見5月10日“湖北日報”）

一、關於宗派主義問題。宗派主義肯定是存在的，各個部門都有，只是深淺不一致，有的到很嚴重的地步。應該有“天下為公”的精神。過去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現在也可以說：“天下非一黨之天下。”毛主席也說過，黨員在全國人民中只占很少數目，要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團結全國人民一齊動手。而宗派主義就表現在：有些黨員不承認這一點，總認為這些事非我們辦不可，你們要干，也只是被利用的。

知識分子對祖國是熱愛的，黨對知識分子的愛國思想應估計得更高一些。“以馬上得天下，並不能以馬上治天下”，用簡單粗暴的方式來治國家，未免把這個工作看得太簡單了。黨的負責同志要對各方面的問題作細致的研究，深刻的分析。湖北黨的領導力量大部放在農村，今後對高等教育工作也應該加強具體領導。在學校中黨的工作做得很好的，恐怕是在50%以內，而不是以外。從本院看，歷次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對於醫學科學對祖國建設的作用，醫學的發展，醫學教育的性質和任務等問題，在認識上是不夠明確的，最近我在院內一次大會上作了關於這幾個問題的發言，

这是我八年来较为系统的一次发言，我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这个发言在党内所引起的重视是不够的。党内同志们自信过高，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和党员能不能领导科学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前些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小品文，表扬某校党的工作人员熟悉科学领导得很好，当别人称赞他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时，他谦虚说：“我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斧头。”但我们高等学校做党工作的人，有这三斧头的比例数还是不很高的。

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还存在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我们还要不要？周总理认为是可以学习的。但在具体问题上，这点还做得不够，我们还不大胆正视人家的东西。在医学中已出现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医学在某些部门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我是一个搞外科的，我认为苏联的外科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苏联喜欢把不同学派的学说戴上反动的帽子，这是一个偏差，例如说什么威尔嘯的反动细胞学说等等，事实上苏联今天仍然在用这个学说进行工作。我们对苏联的教科书在理论上的错误，过去也没有采取批判态度。如苏联有一种细胞经消毒后转化为活质的学说，开头大家都说很对，直到苏联批判了这种学说之后，我们才又来批判，自己不敢独立大胆地来分析批判，因为对这类学说的批判分析，往往牵涉到两大阵营问题，大家怕戴帽子，因而不敢讲。

宗派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有些党员见非党人士提意见，就以为这会影响党的威信，而片面地加以袒护，实际上无论我们的意见正确与否，决不会损害党的威信。还要反对一些利用党的职权来推行个人意图的行为。据我了解，很多人都对汉字拉丁化有意见，我也是有意见的，据我看来，汉字是一种特殊语言，要把它拉丁化将会影响我国的文化，如果只是为了注音，注音字母较拉丁字母的优越性要大得多。我同时对这几批汉字简化也不满意，一点不成逻辑，不成系统，“木”着一个“又”就是“权”（權），“三点水”着一个“又”就是“汉”（漢），而“力”着一个“又”又成了“劝”（勸），这怎么

个講法？我們是有意見的，但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利用职权，对提意見的人往往是圍剿一番。

还有一个意見：我認为我們的教育中加强了政治教育，但忽視了公民教育，忽視了教学生如何做人，因而文明的水准是低的，應該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二、关于党外負責人如何有职有权的問題。我是党外負責人，有职有权。但有的人并不如此。省卫生厅姚克方厅长，照我看，沒有發揮他的作用。姚厅长現在在搞什么呢？他主要是在寄生虫病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兼所长，这个所的设备人力非常薄弱，談不上搞什么研究工作。姚厅长对于把全省卫生工作怎样做好，是有非常丰富的知識和經驗的，而如今竟然沒有能使他發揮更大的作用，这对湖北卫生工作是非常可惜的。

我是要爭权的，我不消极。我是用斗争的方式来工作的。既然还把我留在职位上，就說明党信任我，我就要行使我应有的职权。我很贊成武汉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的話：要就撤我的职，否則，我必須按照我的职权作事。

二、在政协湖北省委会5月16日邀請医藥 卫生界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摘要） （見5月18日“湖北日报”）

党领导的新中国是英雄能用武的时代，但感到湖北省和武汉市还不是英雄能用武的地方。武汉医学院和湖北医学院有許多力量沒有很好的發揮。卫生厅姚克方厅长，对卫生工作是个专才，有丰富的学識和經驗，如果能得到党的重視、信任、依賴（不能說是利用）是可以起到較大的作用的，現在姚厅长在厅里搞个研究所，所里沒有人、沒有事、又沒有設備。古人有隱于朝隱于市的說法，姚好象是隱于研究所。姚是不得已而为之，現在我提出来姚厅长自己承認与否，是另一問題，但党对这个問題要加以考虑。

現在省衛生廳對什麼叫做近代化的衛生事業，恐怕還有些模糊不清，衛生事業的遠景，是包括改變人民的衛生生活和習慣，要做到死亡率降低，人的壽命提高。荷蘭人口平均年齡要活到76歲，我國沒有精確統計，大概平均只活到30幾歲，這就說明我們少活了40年。這40年是成熟了的40年，極為可貴能做許多事情。因此衛生工作，要有具體行動，用具體行動來做衛生工作，才是愛國，光賣膏藥是不行的。

現在對預防為主的思想，認識還不夠明確，衛生廳里對這項工作，進行得很差。我到縣里去看過，各縣的衛生院都有了，甚至縣以下還有衛生所，質量如何？大成問題。如武漢市環境衛生很臟，有些專家來到武漢也說臟得不成樣子，這是尖銳批評的意見，可是我們有些領導同志，聽到這些話，也只是跟着大家笑一笑了事。前些時中央來了個檢查組，到水果湖看了一下，對我們批評了十二個字：房子是“莊嚴偉大”、設備是“富麗堂皇”、衛生是“一場糊塗”。

共產黨能領導科學，但不等於每個黨員都能領導。有些黨員認為過去能領導人民向階級敵人作鬥爭，就能領導一切事業。朱裕璧說，隔行如隔山，能打仗的人，不一定能看病。

目前衛生教育工作，存在缺點很多，如現在醫士學校學生18歲就畢業了，以18歲的青年人去做醫生，去掌握人家的生命權，大家是不會放心請他們診病的，應當加上三年到21歲做個醫生還差不多，可是這個意見向衛生廳提過，廳里說是與中央規定有抵觸。我本是對中央規定的辦法有意見才提的，不必要是這樣答复我。後來我向衛生部某司長也提過，他也不加理會，象這樣的教條主義，嚴重到了什麼程度。

第二部分：鳴放中一些右派言論的綜合

（一）黨的領導及黨群關係問題：

1. 建議中央選擇下面三種辦法試驗一、二年，看看如何？（一）校長制；（二）校務委員會制；（三）黨委制。他說：現在之所以要求撤銷黨委制，大概是因為黨員在學校工作中表現得太壞了。（新華社武漢6月6日訊內部參考）

2. 在教授座談會上說：對知識分子有兩種方式：一個是信賴；一個是利用。我認為信賴好些，信賴可以推心置腹；利用是各懷鬼胎，俗話說“口里叫哥哥，腰里掏家伙”這不好。應當推心置腹；大家共事，堯舜的時候還講“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現在也可以說“天下非一黨之天下”，領導黨不必一手包辦，又說：黨委領導醫學院，我沒有任何懷疑。然而，從醫學院黨委成員來看，單靠他們的专业知識水平是不可能把醫學院辦好的，必須有一個具有一定學術水平又有代表性的校務委員會來領導。

3. 在某一次黨委會上發言說：（一）×××同志囑我馬上成立院務委員會；（二）人數要少，五人左右，以教授為主，行政負責人不一定都參加院務委員會，黨委可派人參加；（三）黨可以作政治思想工作。

4. 在教授座談會上說：附屬第一醫院外科教授作大手術，要青霉素，需要經過黨員副院長批准，各科用貴重藥品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凭什么根據批准，黨領導一切，這簡直是笑話。

5. 他對新華社記者說：有的教授入黨之後，由於黨內清規戒律很多，脫離群眾，人家說他是通風報信的，有的黨員因為在黨內得不到自由，故有“悔不當初”之感，這說明黨內沒有民主，他認為黨內也應有一定的民主。（新華社6月6日訊，內部參考）

6. 在教授座談會上說：我在院內說話不大頂事，很多事要黨員幹部出面，這是一種混亂現象，黨員副院長奪取院長權利是不合法的。黨外同志有職無權的問題，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正職和副職有什麼權限區別，應該由國家法律規定，各人根據法律行使職權，不要讓單位內部來開會分工。那樣會糾纏不清，加上黨的嚴重宗派主義，黨外人士就難以真正做到有職有權。有人當着

我和于江同志的面叫他做院长，叫我叫朱院长。学校里从上到下都知道我说的话不能算数。中央规定一个单位有一个首长，若干副首长，副首长论理应该是协助首长，代表首长进行工作的，我是院长，我应该是一院的总负责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混乱状况。职权问题是法制问题，这问题不明确，宗派主义就能钻空子。党假若认为我担任院长还称职，就应当能管人，也能管钱。

7.又說：省委派来医学院党的领导干部都不恰当，第一个以教育长名义来的×××同志能力不够，水平不高，作学习报告不准备，连党史也讲不清。以后的×××同志和××同志来学院后都不安心工作，就是现在的××同志，工作不深入不细致，热中于理论说教，陶醉于开会，要不然就坐办公室。党员同志的科学头脑不树立起来，医学教育是搞不好的。党向我宣传马列主义，我是诚恳虚心地接受，我向党员宣传科学，他就不理睬，甚至拒绝。

8.青老教师的关系、师生关系的不好是某些共产党员制造出来的，年轻的人看到自己一代是党的宠儿，年老的人一次又一次在挨打受批评。

(二) 挑撥、点火，煽动群众对党不满：

1.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统治者的颜色说话的；一种是士可杀不可辱的，我最讨厌看统治者颜色说话的人，现在教师中还有很多人有顾虑，是看领导脸色说话。

2.在学校民盟一次会上动员说：“只要说缺点，不要说优点。”“毛主席说过对反革命分子都不杀，难道你们说错话还有什么要紧。”

3.当省委许书记来校，进一步的帮助了学校，解决了一些问题，他在大会上说：“现在省委的官僚主义已经动摇了，学校里的官僚主义也开始动摇了，但仅是开始，运动到了高潮，下一段要深入一步把运动推向更深更细致的阶段。”

(三) 誣蔑新社会的民主制度：

他向新華社記者說：今天“到處官氣十足，衙門氣重”，又說：“資產階級民主值得我們注意，在美國人人能暢所欲言，特別是在羅斯福時代，甚至君主立憲國都有民主。”他舉出德國皇帝腓德烈福雷達的例子，使人民親切地稱他為福雷達。他說腓德烈和一家磨坊打官司，法庭公正地判決皇帝輸了，足見這些國家是很民主的。

• (四) 關於學習蘇聯問題：

在講課時說：“蘇聯外科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蘇聯過去高教部、衛生部都是教條主義，黨員捏着鼻子說優越性。”過去朱平亞副院長曾經批評過他的資本主義觀點，現在他說：“再也不願聽到你這一套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我不能容忍，這是非科學的態度。”

附：朱裕璧的歷史簡介

朱裕璧湖北宜都人，現任職務，湖北醫學院院長，民盟中央委員、湖北省民盟副主委，家庭出身地主，1942年受反動頭子陳誠、朱懷冰之聘擔任湖北省醫學院院長留任至今，解放前對統治者送禮逢迎，對反革命分子王文俊（偽教育廳長）、朱懷冰（偽民政廳長）很忠順，關係也密切，在學校內則實行家長獨裁統治，師生員工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引用私人，特別在財務方面不公開，過早的錢都要學校報銷，貪污放高利貸營私，把醫學院當作私人財產，有濃厚的家天下思想，對進步的學生運動進行壓制，但是卻親自為反動派組織反蘇遊行。湖北省人民代表大會上揭發了他曾隱瞞了八年的反動歷史，他曾擔任三青團湖北省監察委員。

解放以來，雖然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還是一貫不滿，反對黨的領導，說湖北衛生事業是由三個半護士領導，長期對省級領導採取抗拒態度，對於學校黨的負責同志都是輕視和打擊他們。

鳴放階段，學生群眾對基建問題由於不明真象，提出了一些不滿的意見，朱裕璧就趁機大肆向黨進攻。

邓介松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邓介松系民革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这个材料，是他鳴放前后的反动言論的摘要。

一、鳴放前的反动言論（摘要）

（根据省人代会第一届第五次會議秘書处整理材料）

（1）誣蔑党的领导攻击人事制度

邓介松在1954年3月13日政协双周座談会上說：“我們的干部，不但数量不够而且質量也不高，現在有許多专业学校沒有公开招生，有些人連高小程度都沒有，进去以后無論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都展不开，不知究竟是什么道理？”邓在1956年4月12日市政协双周座談会上說：“苏共20次大会文件公布后，大家重視，但想談无法談，很少人和人談，其他不敢談的感到很苦悶，思想界莫衷一是，各有各的看法。主要有两方面，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拥护馬列主义者对斯大林奉之为神，找根据都要从其著作中去找，現在这一来，麻煩就来了，对过去所学的得要考虑了。”

邓介松早在1951年11月的“武汉民革”創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我端正了对土改的态度”一文中，他有这么一句話：“我是湖南人到湖南去吧，情况当然比較熟悉些；但我在湖南太久了，社会联系太多了，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顧慮，只恐帶着有色眼鏡的人难得把眼鏡取下。”

邓介松說：“統战部的干部都是小孩，怎样能做工作？”

蕭作霖揭发邓介松說：“邓介松总有点以为党不分邪正，只听

假积极分子的話，我常說假积极总比不积极要好些，他不贊成這句話。他瞧不起共產黨員，如對聽報告就不大感興趣。認為沒有什麼可聽的。這一點我也同樣說過。他說現在我們都懂得一點馬列主義了，黨指導水平也非提高不行了。在高、饒事件以後，他認為是黨內分裂的象徵，他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共產黨的变化是難以想象的。他對黨不信任，常勸我不要隨便向領導上寫信提意見，他說寫出去了就成了憑據。他在解放前確實厭惡黃埔系，解放後卻又厭惡共產黨員，總是說共產黨驕傲自滿，他非常反對現在的人事制度。因此特別稱贊粟寄滄（右派分子）在市委座談會上的發言，他說是很精辟。他總是說我們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有民主的形式。去年高干班小組會上，他說我國當前的主要問題應該是民主問題。他喜歡誇談他自己在解放前組織的‘民主政治學會’。”

鄧介松親自起草民革市委會送中央的工作報告中提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提出後，還不是沒有問題的。統一戰綫工作“上層重視，中層輕視，下層蔑視，這是最一般的說法”。他在報告中又提到：“就業的主要障礙是年齡限制和歷史關係兩點：用人機關只要30歲以下的人，用人機關以歷史為用舍的標準。”

(2) 歪曲和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

何元愷在民革武漢市委反右座談會上說：1954年2月間鄧介松在市政協雙周座談會上曾高唱發展重工業是一個特殊的條件，而不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般原則。他又說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縱即不夠發展重工業的國家也不會被人侵略的。發展輕工業也可以獨立。他認為舊中國工業不發達是由於當時政府的無知無能。

(3) 對國際事件的反動論調

在蘇彝士運河問題發生時，鄧介松認為英國畢竟是不好惹的，

他說納賽尔这次輕举妄动，可能招致大禍。后来又对蕭作霖說尼赫魯毕竟比納賽尔高明得多，老成得多。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邓也曾同意尼赫魯的看法，他說不知匈牙利事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对苏联的公正态度表示怀疑。

(4)不相信党的和平政策

彭杰如在民革武汉市反右座談会上揭发：邓介松是不相信党的和平政策的。“人民日报”登載了湛江开辟新港的消息，邓怀疑地对我說，他認為湛江港是軍港不是商港。我不懂得他为什么認為党报是假宣傳。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持有不可避免的看法。

二、在中共武汉市召开的座談会上的发言

(摘要) (見6月6日“湖北日报”)

整风运动是治病救国运动，是起死回生的一副藥。三害之严重、普遍是聞所未聞，惊心动魄，如果发展下去，将不堪設想。

年紀大的、經歷多的人看了报上揭露的材料以后，特別感到心胆俱寒，不用看远了，也不用看波、匈事件，只看看八年前国民党的統治，前后对比就会不寒而栗。不論朋党、政党，大凡一个党从組成、壮大到消灭都有一个規律，起初是有一定的作用，在成长过程中，真正优秀的牺牲了，海蚌魚虾垂死之徒，坐享其成。一登龍門身价十倍，別人打下的天下，他当了官，因此不良現象逐漸增加，作用就一天天丧失了，最后腐敗崩潰。原因就是宗派主义。有党就有宗派，宗派发展，就必然灭亡。如国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进步的，后来便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党，实力一天天扩大範圍却一天天縮小，成为四大家族的了，这样就非崩潰不可。国民党之前，湘軍、北洋軍閥都是一样，最初是要軍权，后来要財权，最后一切包办，結果是包不了，办不好，包而不办就崩潰了。这一些我是亲身經驗过的，因此对宗派

主义的严重性特别敏感。

最近从报上的材料看来，三害突出表现在统战工作，人事管理、文教部门和工商业改造这四方面。统战方面有八统八不统，即统大不统小，统上不统下，统左不统右，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统老不统少，和统邪不统正，统生不统死。统战工作应由政协来具体化，感到政协是形式，如协商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名单时，民革的代表名单都没有通过他们就拟出来了，只叫他们来通过，有意见也不好提了。如民主党派参加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由统战部决定，自己酝酿的不算。人事管理工作方面，每次提升的科长三十岁以上的多半是非党干部，三十岁以下的多半都是党员。我怀疑二十一、二岁的人当科长、校长怎么能行，科长是基层单位最重要的干部，要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一个人的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年限的，党员是特殊材料做的，难道成熟得就比一般人早吗？在某些工作方面应有最低年龄的限制，特别是人事、教育部门，三十岁以下的人不能当科长，在文教部门一个初中学生来领导高等学校也是不对的，不论是什么特殊材料做的都不行。

对宗派主义只有一味药，就是民主，但是空说民主没有法制，民主是会落空的。中国有法制的传统精神，满清的“王者犯法与庶民同罪”群众非常满意。但这种精神在这几年受到了损失。司法改革反了六法，却不懂得六法是什么；如果把民、刑法都反了，那就是无法了，法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限制，无法对统治阶级有好处，而人民是反对的。现在法制观念很不强，宪法虽颁布了，但党和政府都不重视，省、市长产生可不通过人代会，肃反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很多。

中国封建社会所以能维持几千年主要原因是坚持了严肃的考试制度，许多名人都是出身微寒，通过考试爬到统治阶级去的，这样就巩固了统治阶级，许多内部矛盾都无形冲淡了。当前人事制度之坏，不尊重考试制度是主要原因。过去考不取入不了学，得

不到工作只怪自己沒学好，心安理得。可是現在不同，青年人对考試失去信心，認為是个把戏，录取不凭成績，只凭成分。所以严格执行考試制度不仅对向科学进军，培养人材有好处，对当前解决中、小学生就学問題也有好处。

整风要边整边改，如群众对子弟学校的意見很多，就可以考虑撤銷。民主党派自己也有三害，也应该整风；清朝制官法严制民法寬；首先是干部要守法，宪法要遵守，不完备的如民法刑法要制定。

刘叔模的右派言論

按：刘叔模現任 民革武汉市委会秘書长、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參事室參事。以下是他在鳴放期間发表的一系列右派言論的一部分。

一、在中共武汉市委統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的发言

(見 6 月 12 日“长江日报”)

民革市委委員、市人委參事室參事刘叔模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示他認為昨天厉无咎說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太籠統了。他認為整风由当事人来看，就是要找毛病，找主要矛盾。客觀上可以提优点，但由客觀上檢查主要是找缺点。他同意陈銘樞的看法。他說，陈銘樞只說缺点不說优点，这話我看不出什么矛盾。他認為“人民日报”社論里边提到“缺点可以提，优点也可以提”，一般說是可以的，但今天是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这样提法便同我們整风揭发缺点的目的不大合适。他說“人民日报”表示不同意，是带有感情的，不冷靜，不理智。他說，动感情、語气过重的話，对运动是沒有好处的。

他还談到他对葛佩琦的看法。他認為葛佩琦那一套理論是带有恶意的，不應該发表，大概他可能是肃反被斗的，受了些委屈，所以他說話完全是感情用事。他对“人民日报”就卢郁文接到匿名信事件发表社論，也表示不同的看法。他說匿名信也只是一个人的問題，我們这里左方面也有人写匿名信，是不是都要发社論呢？他說有些問題是可以研究的，不必箭拔弩張。

他談到是不是應該爭鳴的問題。他認為是應該的。他引証邓

初民一句話：“大放之后必有大爭”。他說將來可以提出幾個重要問題來爭。有許多問題今天還不明確，通過爭鳴大家明確了，可以共同提高理論水平。李爾重同志昨天發言中曾說武漢沒有北京爭得厲害。劉叔模認為在武漢談的問題具體些、深刻些；北京有很多人的發言是空洞的原則講話。

劉叔模就黨性和人情味的問題，發表了些意見。他主要認為共產黨在解放前，處在敵人包圍之中，客觀形勢逼其形成小圈子，這是黨性的表現；並且多少要與社會隔離，是保護黨性的方法。而今天對黨性的要求恰恰相反，是要與群眾多多接近，與群眾在一起。他說在解放後，黨掌握了政權要分清敵我，而又要聯繫群眾；這個矛盾一直糾纏到如今。他說，大體上說——用現在的話說是基本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共產黨。他認為要拆牆就要黨主動接近人。

他認為民主黨派應該參與國事決策；黨應該注意從民主黨派中培養政務人材。他說章伯鈞、王昆侖提出民主黨派要參加國家政策的意見，是很自然的事。過去大家不熟悉共產黨的政策，有自卑感。文章不敢寫，話也不敢說，因為很容易出漏子。他說，人代會本來是決策的。但以往不敢提出來，自以為不夠不敢提。現在敢提了。他批評說習慣上是共產黨討論了一個方案，黨內決定了，形式主義討論一番。看來只有兩個作用：一個是教育民主黨派；一個是民主黨派表態。他認為民主黨派是人民有組織的政治結合，有些原則問題應該事先參加討論。他說，到如今八年了，學會了的徒弟打師父了。現在大家不再是對共產黨提出的方案舉手贊成了，因為儘管一些問題他也參加舉手通過了，但仿佛只有批准權沒有創制權，所以現在是要求參加事先的討論。他認為參加這種討論也就是培養了政務人材。這種要求是必要的，做得到的，完全應該的。

劉叔模最後批評了目前理論學習的方法。他認為這幾年的理論學習收效是不大的。他以章乃器為例，他說象章乃器最近所發

表的一些言論看来，就可以說明这几年的理論学习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他認為馬克思主义只有几条基本原则，学会是不难的。难的在于分析具体問題。他說一些人接触到具体問題的分析，便会現出丑来的。他不同意自修，主張講課。

二、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座談会上的发言

(見6月5日“長江日报”)

刘叔模說，“墙”“沟”的問題主要是宗派主义，旧社会講权势，有的靠权势无所不为，有的厌权势有所不为。解放以后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有人多接近党员就是靠攏党，靠攏党的人可能是无所不为的人，而党說他們是积极分子，形成宗派主义。

刘叔模建議重大問題应由党和民主党派协商，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应由民主党派民主选举，以便更好的發揮民主党派的作用。

三、在民革武汉市委扩大会議上的发言

(見6月20日“長江日报”)

刘叔模談到：章伯鈞是一个沒有中心思想，但是有企图、有野心的政治家。之后，他对以前“長江日报”登載的他的两次发言，提出了意見，并重新申述了他过去发言的意思。他說：“‘人民日报’批判陈銘樞的那两句話，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毛病的。‘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社論，我以前在发言中說是早了一点，是就武汉的情况来說的。卢郁文接到的恫吓信，可能是特务干的，这是个人的事，何必这样！葛佩琦的发言，可以不登，他为什么要說那些話，什么原因，可以研究。”他說：也沒有說过党是小圈子。可是，他接着說：“解放前，党是这样（說到这里，刘先生用手打了一个小圈子）才能保持党性；解放后，在各种运动中一再說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綫，才能保持党性；現在，情况不同了，和群众

保持联系，才能保持党性。”他說：“我提出要参加决策，并不是受了章伯鈞‘政治设计院’的影响，而是我自己的主張，我希望在制定很多政策时，民主党派能提出意見，取得知識。現在則多是先拿出成品。最好是先討論，再拿出草案，这是民主党派成員的要求，还是應該提。”他又說：过去他說的“徒弟打师父”，是为了談話的风趣而說出的，沒有別的用意。

栗寄滄的右派言論

(按：这个材料，是根据武汉大学整理的材料选編的)

(1) 污蔑、丑化黨員和党組織，打击党的威信

1. 他在5月14日武大民主党派座談会上說：“我很憤怒，听了揭发，我感到(武大党的)每一角落都腐朽了!”“刘真說，大多数黨員是好的，坏的是个别的，但大家揭发后我怀疑，坏的是多数。”在談到党群关系时他說：“黨員对群众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武大領導与被領導的关系变成了統治与被統治的关系。”

他在經濟系第二次鳴放会上說：“武大的黨員上自×××(黨員副校長)，下至×××(黨員机要通訊員)，大多数都是品質恶劣的。”又說：“經濟系的黨員有五大特点：(一)自高自大，脫离群众；(二)自私自利；(三)宗派情緒特別濃厚；(四)特別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五)对系內事情包而不办。”还說：“經濟系党支部的特点是若有若无，无明无暗，无所事事。”

在5月23日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大专学校民主党派座談会上他指出：“武大党委改組，人事布置是十八罗汉換座而已。……旧党委威信扫地，不敢上台講話，只有刘真一人(新派来的党委書記)，单枪匹馬。”

在鳴放高潮前他說：“現在群众不相信党，而相信民主党派，群众不找黨員談話而找我和程千帆談話。”

(2) 污蔑肃反运动是宗派主义，是迫害

栗寄滄在6月4日“长江日报”登載的一篇文章中說：“……領

導肅反的黨員同志，由於帶有濃厚的宗派主義情緒，根本不信任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年以上的舊知識分子。”

在6月3日武漢市委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他說：“時時刻刻把舊知識分子看作是漏網的異己分子。”

本年寒假期他在經濟系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曾講過：“殺人有二種，一種是有形的，一種是无形的，肅反（对被斗的人來說）是後一種迫害。”（現本人不承認講過這段話了）

（3）惡意的攻擊人事檔案制度，企圖取消黨的領導

他在6月3日武漢市委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說：“人事處是一個神秘的獨立王國，‘它掌握生、殺、予、奪之大權，掌握群眾的政治生命，它保存着每個人的材料袋，這個袋子已經成為每個教職員工的沉重的包袱。我們不知道裡面放進了什麼東西。’”

他在5月23日省委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也講過“一到人事處就毛骨聳然，誰也不敢進來，生、殺、予、奪；權操在他們手中，工作方法變成了偵察機關，時刻拿着小本子記你的事，處處保密，人人受到懷疑”。

他在6月4日“長江日報”上寫的“從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說到目前高等學校中的人事工作制度”一文中說：“目前高等學校中的人事處又可以說是培養宗派主義情緒的溫室。……總之，今天在高等學校中沒有比人事處更為脫離群眾，更為不得人心的組織了，如果說高等學校的黨群關係之間真有一道牆，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人事處就是這道牆的主要建築者。”“人事處手上的‘材料袋’，實際上已成為每個人的沉重的包袱。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材料袋中究竟裝了什麼東西，從而不免時時懷疑和顧慮領導對自己的信任。加以有些人事工作者，態度冷酷，作風生硬，他們把所有黨外的教職員工都看成未被拿獲的階級異己分子。有的人事工作者甚至於利用職權，作威作福，濫用私人，排除異己。”“除極少數有現行的政治問題的人外，人事處應該讓每個國家幹部知道

自己的‘材料袋’中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以便消除顾虑，安心工作。古语说：‘士为知己者用’，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取得国家的充分信任以后，才能够愉快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与工人、农民一道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4) 兴风作浪，挑拨离间，鼓励右派向党进攻

1. 美金案在大字报上重新提出来后，他曾对×××经济系党员副系主任（三反时曾处理过美金案）说：“每个人（按：指党员）都要作好思想准备，火可能烧到每个人头上来。”

2. 民革支部委员×××是靠攏党的积极分子，因为他的爱人是共产党员，粟寄滄把他看作是“异己分子”。不仅民革的某些活动不让×××知道，而且很多例会也不让×××参加，怕×××泄露他的秘密。

同时，他对右派分子姚梅镇、程千帆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则极力给予支持和鼓励。例如：姚梅镇在法律系一次座谈会上说：“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粟大肆赞扬说：“姚的馬列主义水平很高，能够把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来看，这是×××（法律系党员副系主任）所不能领导的。”姚在另一次座谈会上说：“共产党把党员看成我，党以外的人看作敌。”会后粟寄滄拍着姚的肩膀说：“你的发言很好，抓住了根本问题。”

他在群众中挑拨是非，离间党群关系。例如：工资改革时，×××的工资早已评定为四级，但粟跑去对×××说：“组织上原来把你摆在第六级是我替你据理力争才提到第四级的。”

3. 他在6月5日刘真作报告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同学们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发泄（意指搞大民主）？因有些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应谴责的都不谴责，‘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更沉重了，不敢说，怕报复。”

(5) 盗用民主党派名义印发反党宣言

当武大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企图利用整风运动制造阶级斗争，并已公开提出：“争人权、争民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发动了包围人事处，到“长江日报”去争取“新闻自由”，到校外张贴反动标语，要到农业社进行煽动，酝酿搞“大民主”的紧急关头。

栗为了达到助长右派活动的气焰，与党争夺领导权的目的，起草了“武大民主党派对目前我校整风运动的意见”的所谓“联合宣言”。宣言中明目张胆地提出：

1.“我们对同学在揭露‘三害’工作中的辛勤劳动和英勇表示钦佩。”来替企图搞大民主的学生打气。

2.“今后如有压制批评和私人报复的事件发生，希望大家据实举，我们负责向有关机关反映。”明目张胆地向党争夺对运动的领导权，争夺群众。

3.公然污蔑武大党“有相当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企图制造党群矛盾，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

4.提出“为了根除‘三害’，不仅需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还号召“教职员工要开始对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这些与他一贯对党委制和人事制度的攻击是一脉相通的，同时也是和右派分子马哲民散发讨论体制问题的文件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无非是要取消党委的领导。

5.还别有用心地、大言不惭地叫嚣：“希望全体党委同志都能够积极主动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党委会对于那些有思想顾虑不敢大胆投入运动的个别党委和某些党员，应该积极进行教育”。企图在群众中减低党的威信。

附：栗寄滄的簡單介紹

右派分子栗寄滄，是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民革武汉市委委

員和民革武大支部主任委員。他出身于高利貸起家的地主家庭，解放前他是李匪宗仁和白匪崇禧的亲信(李匪曾資助粟留學日本，粟曾協助李匪競選偽總統起草競選演講稿)，作過偽北京行營參議，作過偽中國農民銀行的專員、主任、副經理以及廣西分行經理，並曾在一些大學里作掛名教授，解放後他才正式轉入廣西大學經濟系教書。後經院系調整調來武大經濟系任教。在整風運動前，他一貫對黨不滿，利用武大民革支部負責人的名義，處處與黨唱對台戲，打擊領導的威信。說武大黨委不重視民主黨派，黨群關係不好，黨委政策水平低，領導能力差，說肅反是宗派主義，是迫害；說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比法西斯還厲害。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向黨進行猖狂的進攻，污蔑和丑化黨員和黨的組織，惡意的攻擊人事制度，說人事處是一個獨立王國，掌握生、殺、予、奪大權。在群眾中挑撥離間，極力鼓勵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在右派分子活動最猖狂的時候，他利用民主黨派名義發表了聯合宣言，給右派分子打氣，與黨爭領導權。

王一蛟的右派言論

按：王一蛟系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是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这个材料，是根据农业厅整理的资料选编的。

(1) 恶毒攻击党、丑化党，与党争夺领导权，企图平分秋色

王一蛟說：“我不同意‘党天下’的提法。”“我认为党天下比家天下好，专制时一朝帝王，国民党时四大家族，四家比一家总民主一点吧，党天下总比家天下四大家族的天下好。”他又說：“以党代政在县区乡三级是严重的，专署要地委决定，县长决定不如县委，有事只能找书记，县长，区长，乡长在行使职权上很不容易，这个制度的优点是以党代政，以党治政府，所以两套人马（注：指党委和政府），县委有农村部，农业局就成了附属机关。究竟是农村部领导农业生产或是农业局领导农业生产？如党委领导，农业局可以合并（注：指合并到党委），假若以党代政不对就得还政于政府机关，为什么需要两套班子两套人马？所以以党代政的问题是日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党代政指导思想不明，职责不明，难道說去年推广水稻不是教訓嗎？”他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說成是三部曲，即“地下时期是朋友关系”，“解放后有过敬鬼神而远之的一个时期”，“现在是兄弟关系血肉关系”。

王一蛟說：“李闖王进城以后一切变了，武将刘宗敏拷打降官、劫掠吳三桂爱妾陈圓圓，无恶不作。代表知識分子的牛金星报喜不报忧，只有李岩几次建議整頓軍紀，广开言路，重視统战工作，选賢任能……党员中不能說沒有少数象牛金星，刘宗敏那样的人，象李岩那样的人不仅党内多党外也不少”，又說：“用人不疑人，疑

人不用人，要能容人才能用人，一块共事如互相不信任那怎能共事那怎得了？誰愿找麻煩？我又想起一个故事：唐朝有一个宰相叫魏徵，他敢說敢言，鉄面无私，任何人犯了錯誤他都要批評，所以文武大臣三宮六院就是皇帝也怕他三分，有次皇帝升朝，抱了一个鸚鵡在玩，魏徵进来了，皇帝赶快把鸚鵡藏在袖子里，俟魏徵下朝鸚鵡已死在袖子里，皇帝下朝回到宫里很生气的說，魏徵有一天犯到我手里非杀他不行，皇后說有劍在此，可将下旨扑杀，皇帝說我方才的話乃戏言耳，他是国家栋梁即使对我再不恭敬，即是使我不快活也不能杀他，这說明能信任合乎統战政策。有些同志說厅里党外同志不是有职无权的問題，而是尽职尽责的問題，我不同意这个說法，尽职尽责要有尽职尽责的条件。”

(2) 有意歪曲事实，夸大缺点，否認社会主义建設成就

王一蛟在“竹溪县中峰区左溪乡調查报告”中对粮食問題大做文章，他說：“当前这一区的农业社開粮食供应是一个很突出的問題，如左溪民主社缺粮戶占总戶数64%强，七一社缺粮人数占总人数74%，前进社缺粮戶占总戶数90%弱，农村一片缺粮声。”他还引用“农民”反映（按：这个“农民”是什么人王沒有說）：“轉社好，轉了社讓我們吃草”。說：“这里农民沒有听說有吃草的，但吃蕒苣叶子的农民大有人在，一区黑龙乡有一个农民因粮食問題和别人吵了嘴投河自尽这一切都是反映这一問題的尖銳化。”在他分析这一問題的原因时說：“从粮食生产及分配来看，每人去年平均应分口粮在420斤以上，然而据他們（指群众）反映沒有分到这么多的粮食，一般的是360—380斤，上級发下来的供应指标控制在区乡干部手里未能及时发下，同时社里控制了一部分机动粮，又分配得不够合理，所以普遍開供应。”因此他主張“对缺粮戶，必須放手供应”。在同一报告中他說：“有的牛骨瘦如柴帶病耕作甚至累得皮烂肉破口鼻出血，使牛的人为了多挣工分，还是快馬加鞭把无处伸冤的牲畜打得体无完肤”；他还引用別人的話來說明农业

社用牛比土改时整地主还厉害，又要馬儿好又要馬儿不吃草。对肃反問題，他說：“肃反存在有問題，对肃反的遺留問題应重視，須組織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复查。”

程千帆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这个材料，是根据武汉大学政治学习委员会办公室所提供的材料选編的。

第一 丑化、污蔑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挑撥党群关系

一、4月30日写的“从同志談到紅色专家”一文（本文发表在“文艺报”1957年第7期）

发表在本刊第3号的“同志”是一篇好文章。它反映了党内外人士大家都具有的迫切愿望：“培养起一种崇高博大的同志之爱”。

但徐懋庸同志代表大家提出的这个愿望，并不是沒有受到阻碍的。过去如此，現在也还不能說完全不是如此。要培养这种“爱”，仍然需要一番努力。

目前，“人人相見呼同志”似乎比較习惯了。但这习惯的养成，也有它自己的一段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解放初期（在某些場合，一直到現在），我們这班所謂“高級知識分子”，是被党内外人士称为先生的，这表示尊敬，同时，也表示疏远。換言之，即孔老夫子所謂“敬鬼神而远之”是也。以先生称党外人士的党员們，虽然不一定“讀孔孟之書”，但却在“行先王之道”，有时不禁使神經過敏的人发生“內諸夏而外夷狄”之感。

謂余不信，有事为証：大概是在1950年，在我所工作的那个学校里，在某次集会上，一位化学家对一位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党员說：“你平常穿得随随便便地，就这一点來說，我們倒是同志。”这句话当然缺乏“高度的思想性”，但也沒有什么恶意，然而这位领导同志却登时勃然大怒了。他正言厉色地訓斥說：“同志是个很

严肃的名詞，不能随便乱用。”于是，化学家扑了一鼻子的灰，群众則面面相覷，哑口无言，大概是在1955年，在我們学校的一次新党员入党的支部会上，当那个被审查的人通过以后，一些党员当时就向他祝賀，說他今后是个同志了。这就使我們这些来宾先生不能不被迫承認：我們并不是同志，在許多場合，先生和同志这两种称呼，是非党人士处境的非常灵驗的温度計。如果忽然你是同志了，那么你大概被認為是对勁的，如果忽然你又变成了先生，那么，你就赶快作思想准备吧，大概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大小总得出点事儿。

然而，时代終究是愈来愈进步的，党对知識分子团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愈来愈被党内外人士所拥护，中国六亿人民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終于排除了那些狹隘的宗派情緒。毛主席“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出，又更进一步地照亮了每个人的思想，我相信，徐懋庸同志所譴責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概不久总該逐漸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

但有許多陈旧的或不明确的概念仍然在社会上流行，有些东西，对团結到敌人脚跟前的方針政策來說，仍然存在着抵触，对于发动全体人民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來說，仍然是一种障碍，有待于繼續研究改正。

例如：“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提法，显然就包含了另外一个概念，即广大的非党人士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在当初，这个提法，或許有某种理由，而在今天正繼續使用，就显然是不科学的，不合于事实的。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主要是决定于每一个人的革命实践，而不是决定于他有无党証。沒有党証而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战士，何止千千万万，难道他們倒是普通材料制成的，而刘世吾、韓常新倒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嗎？且不說这个提法不科学，不合于事实，就算真是如此，在中国六亿人口中，只有一千多万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其余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我看，将这个事实記在历史上，也不見得多么

光荣。

当然，我們絲毫不怀疑工人階級以及他的战斗先鋒隊——党在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自吹自擂的提法，多多少少使人感到有些宗派主义的排他性。这，在今天的革命形势下，不能不是一个过了时的概念，沒有加以保留的必要。

从这里，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个名詞：紅色专家。这个名詞在辞典里还找不出。因此不能知道它的“定义”。推想起来，可能包含下列两个有区别的意义：第一，指持有党証的专家；第二，指力图以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从事工作，来为人民服务的专家。

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想，現在中国的紅色专家是不少的，这个观念也是能为大家所接受的。但是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也是那一位不許非党人士称他为同志的老党员，曾經在我們的学校里对党员发表过他非常著名的演說，大意是勸勉青年党员們努力爭取做个紅色专家，这是很好的。但同时，他又非常精彩的說：那些旧知識分子，即使进步，也不过象半老徐娘臉上擦胭脂而已。当然，这位老党员現在也进步了，决不会再說这种怪話。可是，从报纸上所討論的“先专后紅”、“先紅后专”、“专紅并进”等問題看来，所謂“紅”、就是指入党。那么，紅色专家，显然是党内专家的同义語了。

把专家分为党内的和党外的，并没有什么毛病。但把党内专家称为紅色专家而将党外专家归之于×色专家或无色透明的专家，却有問題。

我們知道：紅色，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与白色相对的。紅色代表无产階級，而白色則代表資产階級。

在中国人民中基本上已經只有工人、农民、劳动知識分子这三类人的今天，在全体知識分子已經以自己的知識来为工农服务

的今天，我們有什麼根據認為他們是非紅色專家呢？這樣的區分，除了削弱他們的積極性之外，又有什麼其它的效果呢？

以有無黨証來區別一個人是否紅色專家，和以有無黨証來區別一個人是否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樣，是不科學的、沒有事實根據的。我們都知道：高爾基、魯迅、郭沫若以及其它許多的人，並不是共產黨員，但却是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名符其實的紅色專家。

黨員在任何時候都是人民中間的少數，否則黨就會失去其戰鬥先鋒隊的作用。但馬克思主義者卻可以是人民中間的多數。如果不用黨証來區別，則紅色專家也必然會逐漸成為專家中間的多數，黨當前的迫切任務之一，則是促成這兩個多數的早日出現，而這，又是和徐懋庸同志所提出的“培養一種崇高博大的同志之愛”的工作有關聯的。

凡是一切可能使黨群關係不正常的消極因素，在今天，都有加以克服的必要，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和更迅速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加強社會主義建設。“不賢者識其小者”，我們談的問題，也許並不重要，看法也許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但無論如何，這些問題是存在的，它需要解決。

為了祖國，為了世界上進步人類，讓黨和非黨的全體人民，更加親密的團結起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向社會主義社會大踏步地前進吧！

二、5月10日在中文系小組會上的發言●

黨委領導是制度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如×××，×××是教授黨員，他們領導的系應該問題很少，但實際上問題很多，這就說明是制度問題，民主黨派只是陪襯伴賭起不了什麼作用。

上海有人提出取消黨委制，這是好的——他們想把工作搞好，不是想把工作搞壞，等到群眾不提意見就完蛋了。

● 這次會議當時沒有作紀錄，這些言論是與會同志會後整理的。

領導上應該明確一個東西，在學校里應該依靠專家教授來搞好學校。

（胡國瑞先生說：“文件政策下來，只是要我們體會，並不是要我們提什麼意見”，程千帆接着說）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黨與非黨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共產黨應該認識這點，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也，非共產黨之中國也，如果中國共產黨把全中國人都趕到維吾爾自治區，你共產黨也活不了。

（李格非同志參加小組會，程千帆對他說）今天在座的有五個群眾，一個黨員，就是李格非沒有打中領導的痛處。×××、×××、×××、×××入黨以後六親不認，凶狠無比，×××為貪污作偽證，現在仍居要位，由校長辦公室主任轉為經濟系副主任。

×××品質惡劣，是鑽進黨的。××，人家請他吃飯，他大擺架子，帶三支盒子炮跟在後面。××以前在中文系當系主任，拿老教授一樣的最高級工資，就因為他是黨總支的書記。業務上並不突出。要他當系主任，是不恰當的。

二區有個共產黨員×××不准人家查火查清潔，說什麼共產黨員沒這套。群眾叫他家作十四號，說他是小徐懋庸。有些黨員幹部一個人住八間房子，對群眾卻把得緊緊的。省政協某常委說，×××的行為（指搬房子）是卑鄙無恥。就請李格非同志轉達給他知道。

什麼問題，黨內可以爭論，一到群眾中間就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共產黨有兩種是非，一種是黨內的，一種是群眾的。

在武大入黨的人，人們並不向他學習。我對×××的入黨是很有意見的，為了培養他入黨，指定他為先進工作者，並替他偽造材料，他當時新文學史稿還沒有出版，就說出版了。黨要捧什麼人，就要為他搞什麼名堂，選先進工作者是活見鬼，要就和清朝一樣，欽賜文正公，現在分明是賜的，還要說是群眾選的，善

良的人选上积极分子自己也感到惭愧。

助教没有一个不是党团员，群众没有一个，程一中留下来是作样子教育群众的。助教都是党团员，群众没有一个，这是壟断知識。

三、5月10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宗派主义的种种”一文（节录）

.....

整风运动是否深透，第一要看党员是否能起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往往有这种情况：党内原是有争論的，到运动来时，就团结一致对外，反而为官僚主义者辯护，上海有些学校教員在一起談話时，听说党委書記来了就说紅开了，不吭声，这就是宗派主义的結果。第二要看低級人員是否敢起来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在武大教員中，有一种是大喊大叫的，有一种是以沉默代替抗議的，另一种是問多少說多少。这一次，应当都发动起来，学校有个总务长，是党员，他的爱人的薪水提高得不合理，有人反对，在肃反时，就说他反对总务长的爱人，就是反对党，对許多事，比較低級人員敢怒而不敢言。

党群矛盾的几个基本原因，是很多非党知識分子还拖着资产般小资产般的尾巴，一下难以去掉，而在运动中党员性急，在他們是恨鉄不成鋼。然而群众思想确实一时扭不过来，这中間往往发生矛盾。1952年武大思想改造时，徐懋庸說：“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决不意会着一个月內不能提高一大步。”我就因为两星期內不能提高一大步，把我們撤职了，其次，党群之間彼此不了解，党员功臣自居，自高自大，几个月前听说农学院一位教授講了摩尔根学說，被責令檢討，檢討如果通不过就不許講課了。有的老教授迟到五分鐘也要通报。解放后，党员有些特权。听说××同志原在省委有多吃点肉的特权，到武大任党委書記后，自动放弃了这个特权，大家很欢迎。这种特权不仅对于干部不利，而且对青年思想也产生毒害，我有一次在德明飯店招待外宾，进房間去休息，卫生員說：“今天是首长的孩子在洗澡，你过一下”，我只有

在会客室等待，我还亲耳听到某部长一个九岁的孩子說：“××电影只有我們能看。”把孩子养成了一個小貴族，黨員都應該象刘真同志那样以身作則，許多矛盾就易解决。

再談談政治上人为的不平等待遇問題。当时，对于某些具体問題，党内外是可以有区别的，群众沒有必要而且也不应当知道党内一切問題。但有些事不仅不合理，也不策略，不聰明，如傳達一个报告，傳達的内容完全一样，却要分党内党外两次傳達，又如我校选助教，选留学生，差不多是党团员包干，群众連5%也沒有，是不是說群众的政治水平都很低，低到連当助教，当留学生都不行呢？其实过去所选的留学生和助教，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往往倒是很差的。在一点上，至少不是大公无私的，最近已有人提出留学生公开考試。

有人說，斯大林也这样說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反过來說群众就是普通材料制成的罗！当然党员是无产階級中先进分子，但也不能說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說大多数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差不多。反过来看，群众水平一般低于党员，但也不能說，不是党员的人，就沒有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如高尔基、魯迅、郭沫若，他們都不是党员，但都是轟动的革命作家。再一种是所謂“紅色专家”，“紅色”这个概念毕然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紅色专家也就有白色专家，这象什么話，我認为这种說法有排他性。

.....

关于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我建議：一、在全国範圍內对知識分子的改造經驗總結一下，總結出一些規律。我認为改造知識分子，用粗暴的那一套是不能解决問題的，1952年把我整了一下，整得我抬不起头来，只問业务不問政治，对我來說結果并不是无产階級思想加强，而是資产階級思想加强了。可以總結一下大学校长、院长对待知識分子有哪些成功的地方，在我看来，中山大学的校长馮乃超同志的办法是成功的，徐懋庸的办法是不成功的。

二、党应该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掌握住这个思想规律，对他们思想改造就容易了。如清高、好发议论，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搞古典文学的喜欢尊师重道，正因为如此，在运动中叫学生骂老师，我们受不了折磨；再一种是爱面子，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们要求党内同志对待我们，象对待党员一样细致。

.....

四、5月16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还要鸣？”（节录）

.....

关于党群关系问题。大家都要拆墙，我认为拆墙首先要明辨是非，武大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假积极分子帮倒忙”。有些人对上阿谀逢迎，对下欺压，这种人甚至鑽到党内去了，这样就使群众与党的距离更远。根子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在于徐懋庸同志过去说：“投共产党之机，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久了就可以弄假成真。”这些上拍下压的人，因此，在每次运动中，都很活跃，给党的工作反而带来损失。群众总结了这批假积极分子的入党术有五条：（一）三年不提意见；（二）一切“体会”领导意图，察言观色；（三）常跑人事处接近当权派；（四）重点走一人门路；（五）通过亲戚，或夫妻关系。去年有一位品质很坏的人，领导为了准备吸收他入党事先伪造材料，硬迫群众选他为先进工作者。结果此人不但未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使党的威信低落，连党内都有意见。这种人被认为靠攏党，许多正派人就不敢靠攏了。我希望党明辨是非，当然，武大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好的，我这里所说的只是一小撮投机分子的情况。他们是群众所最不喜欢的人。

最后谈谈民主党派在学校中的地位。我是前几年加入九三学社的；居然有人把这个民主党派当成商店，问九三学社是否是公私合营的。群众不了解这个组织，报上宣传得也不够，“人民日报”谈到某些人的模范事迹，只提他是党团员，从不提是民主党派成员。有一次开省政协会，有外地委员问：“中国有共产党为什么还有其

他民主党派。”我正要說明，有个干部拉住我說：“不必說了，因为一下說不清楚。”为什么不讓我說明白呢？1953年在朝鮮慰問，有位領導同志竟要我不要對朝鮮同志說中國有民主黨派。……

五、5月16日給“學習簡報”的一封信（見“學習簡報”第二期）“簡報”登載我的談話和我的原意不符。

“學習簡報”編輯部：

“簡報”第一期第四版所登載我的談話●有××在“業務上并不突出”一語和我的原意不符。

我是說：××的政治水平不高業務也很壞，根本不配當中文系主任。他當主任，乃是武大中文系的耻辱。試舉一個例子。有一次開會，××忽然引了幾句“呂氏春秋”，將音樂的樂，念成“洛”，將“闕”字念成癸。連最普通的學識都沒有，還不如一個學生，除了憑黨員的特殊以外，還憑什麼作主任呢？

此外，這篇報道還暴露了這位“作者”對官僚主義的回護。誰不知道是總務處某些阿諛逢迎的人出些壞主意逼迫劉老將房子讓給了×××副校長，座談會上談得很清楚，為什麼在報道中連×××的名字都不敢提；×××的名字又不是封建皇帝的御諱。×××副校長來校後，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這件極不漂亮的事，群眾眼睛是雪亮的，不會冤枉他。“作者先生”用不着為他打掩護。

希望這封信在下期刊出。

此致

敬禮！

程千帆 5月16日

六、5月18日在中文系學習分會上的發言（記錄）

席魯老的工資先公布的是三級，後來決定的是四級，這對魯老是個侮辱。（周）大璞，要是我在你的地位，就一定要據理力爭，

● “簡報”第一期第四版所登載程千帆談話原文為“程會昌先生提出江樞以前在中文系當系主任，拿老教授一樣的最高級工資，就因為他是黨總支的書記，業務上并不突出。要他當系主任，是不恰當的。有些黨員干部一個人住八間房子，對群眾却扣得緊緊的。‘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眾作的，以後徐懋勳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都是悄悄的搞。待遇太不公平。”

要不然我就要摔紗帽。这次席魯老提意見就必然提到你。

学校党委有沒有决心？照我看，还没有决心。比如我說的是“××业务很坏”，“学习简报”却改成“业务不突出”，至于×××，連他的名字都不敢提。为什么这样改，我要追求責任。×××，你如果有党性，就用不着背黑鍋，也要声明。到底是誰改的！現在群众已經起来了，要玩花样是不行的！

党内有些問題我們要求处理，不能群众对党员提了意見，他們以后照样搖搖摆摆，毫不处分。

党成了党员的亲娘，群众的后娘。

七、5月20日在学委扩大會議上发言（部分記錄）

解放后入党的大多数都是群众不喜欢的，如中文系发展×××，党内党外都有意見（刘真同志說这不合事实后，程千帆馬上說“我保留我的意見”）。

我不同意刘真同志的一句話，認為好象党员不爭鳴，就是馬列主义不爭鳴，中文系存在的問題不是新老問題，而是新新問題●，希望党委会团委会加强教育。×副校长的問題，中文系很不滿意，解决的方式是應該讓刘博老再搬进去，只有如此，才能平公憤，但刘老是謹慎的，他不愿多惹麻煩。

这次整风除了違法乱紀的外，一般不处分，这从党内言可以这样，我也是反懲罰主义的，但有些党员，如×××、×××是不是可以重新安排一下，以平民憤。

八、5月24日在九三学社武汉市筹委会召集的武汉大学、制图測繪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組会上的发言（部分記錄）

过去民主党派一向是裝飾品。运动中的体会，民主党派不仅要爭鳴而且要爭主。

刘真的报告（指6月23号体育館报告）是不容易的，六个民主党派联合召集會議，請党委参加，应向面上发展，简报上可以点名批評，公开人事档案等問題。

● 指中文系青年助教之間的矛盾。

(休息時記者問他：武大人事檔案公開了嗎？他說：劉真已宣布人事材料給每個人看，報告後歡聲雷動。)

武大黨委是團結的，因為他們有組織性，但是內心不一樣，因此，有些場合是互相維護，包庇。

我們說×××的愛人是夫榮妻貴，劉真說這太諷刺了，我們舉出過去的历史情況，黨委同意了。

應鼓勵黨員爭鳴，不是整黨員，而是共同除三害，這樣可以減輕壓力。馬列主義是對別人講的多些，對自己就受到了局限性，因此，要向黨員反復表明自己態度。不對黨員進行人身攻擊，就可以減輕壓力。

要支持群眾正当要求（如夫榮妻貴，行政部門一個黨員，要把黨員稱號送給別人，群眾不滿）要據理力爭。可以擴大民主黨派作用，作黨的助手，如果問題發生爭執，可以向上級黨委反映。如華中師院要支持學生開肅反追悼會，學校黨委不同意，結果派代表到省委，省委批准了，開了一天。

第二 否定历史运动的成績，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5月10日在中文系小組會上的發言（部分記錄）

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什麼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

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眾搞的，以後徐懋庸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却是悄悄的搞，待遇太不公平。

有人說人事處簡直是警察特務機構，我們幾十歲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們十几歲的小孩子手裡，今後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寫不同意。三反，思想改造時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群眾為什麼不可干人事工作，為什麼非黨團員不可。

二、5月17日在中文系小組會上的發言（部分記錄）

人事制度的材料問題，這是個缺席的判決。我就知道有對我誣蔑的材料，這是我在一次會上看到的記錄。這，我以後調動了工作，怎麼辦呢？土改中我幾次被表揚過，可是徐懋庸就是不承認。我建議：工作調動時，要公開材料袋，同意或不同意，可以當面談。

徐懋庸初來時還好，後來變壞了。據說，當時孫祥鍾、張瑞瑾與周鯁生不對，於是凡是周鯁生時來的人都認為是周鯁生派來的。那次思想改造是一次宗派鬥爭，這是把政治鬥爭庸俗化了，歪曲了這次運動。張勃川來了宗派並沒十分發展，但現在是否還存在，黨委值得研究。

三、5月20日在學委擴大會上發言（部分記錄）

人事處是清一色的黨員，現在這沒有鳴起來，互相包庇。這次學習只牽涉到具體問題，對於高級的問題，如民主辦校的問題，人事制度問題（體制問題），也應該解決。凡黨外人走進人事處，就是有特務嫌疑，受到心靈折磨。

每人工作調動時，應該把自己的材料看一下，由雙方簽署意見，對其中某些不同意的可互相保留。

四、5月24日在九三學社聯組會上的發言（部分記錄）

反三害揭發了許多問題，有些是屬於思想問題，但有些是屬於根本性問題。

學校制度幾變，校委制，一長制，黨委制，但都是黨在領導，肯定黨是要領導，但是這樣領導是走群眾路綫，依靠人民力量，還是關在房子里自己轉？

黨委制是否存在？有黨的委員會我們不能干涉，但如何來吸收大家工作，把黨委與民主制結合起來，這就是如何領導的問題。

教授委員會不能起積極作用。

非黨員是否能夠體現黨的領導？我認為是可以的，馬克思說：“理論一掌握了群眾，就變成了物質力量。”如果說只是有黨証的人

才能領導，就否定了馬克思的指示，所以要能解決問題還要从認識上解決問題。我們歷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就去搜家，結果只道個歉。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憲法規定人民權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沒有公布，人民無權，憲法沒有保證，這是肯定的違法，是不能保障憲法的實現的。

（休息時有人問程千帆，“文匯報”登載了流沙河對“草木篇”的意見，程說：流沙河是個人主義者，“草木篇”那麼短的詩，是不容易反映出政治立場和階級立場的，並且舉了例子說明這個問題。這段話，不是原話，但是是這個意思——附注）

人事工作全是黨員，人事處、科變成了獨立王國，加上腐朽，變成了黑暗的王國。系主任要查學生的檔案袋不行，一定要黨員去查。人事處有一個科三個科長兩個幹部，一個科只有兩個科長幹部。他們犯了錯誤別人無法監督，而他們可以隨便處治人，使人身加上了暗影，食欲缺退，工作不起勁。

人事工作幹部應該是德才兼備，不一定非是黨團員不可。

五、5月31日和6月1日在中文系教工大會上的發言（部分記錄）

知識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象對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改造、改造，什麼時候才信任我們。

肅反時有些青年人當時的態度粗暴，這些錯誤可以原諒，不能容忍的是在這次運動中，還有借機報復陷害無辜的嫌疑，當時公安局帶手槍逮捕了圖書館專修科兩個教員（其中一個上校特務），但×××說，武大敵情嚴重，還有更隱蔽更高級的反革命，現在才開始露頭，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以後烟消雲散，沒有了。這只可能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容忍還有超乎上校的特務存在，沒有查出，一種就是×××胡說。原來×××，×××，×××等是準備把法律系系主任×××當作最大的特務來狠狠地整一下的，為什麼要整他呢？×××是一個很有威望的教授，前後担

任过副秘书长，副教务长，法律系系主任，在工作中常常不同意宗派主义的作法，选人民代表时，他虽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却得了很多票，这就犯了宗派主义的忌，为了陷害他，就组织人伪造材料。例如×的太太骂李校长这个老先生好拐等等（×的妻子是江苏人，不会讲湖北话）。这也算是×的反革命理由之一，幸而上级了解他，没有批准。×、×等人曾两次写信给市委，市委没有批准，否则，×就要当成反革命来整了。×××不是反革命，你一定要动员人家写材料，人家不好不写，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以两面派的办法对付之，即白天写了材料，晚上又去告诉×先生。所以谁写了材料，写些什么，他全部了解。

六、6月5日在中文系小组会上的发言（部分记录）

×××说有的有搜查证，有的没有，那么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纪？要给我们说明白，或者公布一个法，就是任何公安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任何人家去搜查，那也好，我们好守法，或者给我们选择职业的自由，让我们迁地为良。

七、6月12日写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见“长江文艺”七月号）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这么一种现象，无以名之，名之曰：精神世界里的级别。

请允许我预先声明，为了“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我不得不向亲爱的读者说明白：我从来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对于小资产的平均主义，也久已不感兴趣了。因此，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为实施这一制度而必需存在的级别，例如有中央一级的部和部长，也有省一级的厅和厅长之类，我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我所要对之发一番谬论，不是这些。

使人感到吃惊的，乃是这种应当在政治上存在的级别也侵入不需要它存在的人类精神世界里，并且顽强地盘踞在那里，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活动。

在我們的文艺界里，不知道是誰規定的，但确实是为大家所默認的，有大作家，大編輯，有小作家，小編輯，有不大不小的作家和不大不小的編輯，而凌駕于他們之上的，还有所謂权威作家和权威編輯。

如果說，这些权威，大、中、小等各种級別能够根据他們經常的劳动成果而随时加以合理的調整，使其有形的劳动和无形的級別相适应，倒也罢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如象有一种不成文法，如果他被認作是权威了，就永远是权威，遇事是权威；如果不幸而归入了“小”小輩，那么，除了偶然的幸运外，那么就是永远是小，遇事是小，在算定了終身的命書上，做小伏低便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六朝时代距离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了。但那个时代的門閥制度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却仍然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具有高高的、或較高的級別的人，的确是值得人“艳羨”的。

他們有的是“正确”的化身，虽然参加过，并且領導过反对以資產階級立場、观点方法研究“紅樓夢”的斗争，但在不久之后，又写出了可以与“群芳开夜宴图說”比美的考証賈宝玉害过斑疹伤寒的名文，而不自覺其为自己所曾經大力批判过的思想的追随者。

有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尽管所写的書出版之后，出版社曾經接過1700封批評的信，然而却沒有一封可以发表出来。如果万一泄漏了天机，可怎么好呢？沒有关系，还可以將載有这种批評的杂志全部收回銷毀。

有的乱搞男女关系，已經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但在缓刑之余，依然逍遙法外，高步詩坛，吹着自己“美妙”的蘆笛。

有的是被压制的新生力量，但一登龍門，身价十倍，就不仅对自己多年受教过的老师摆出一副独家經理馬克思主义的商店老板的面孔，向之貫輸馬克思主义ABC，而且还以婆婆的身分將另外一些新生力量作媳妇来加以呵斥了。

諸如此类。

反过来，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倒楣。

这些现象，吸引着一部分人去追逐着那种高的較高的，尽管是无形的级别，当然，也招致了更多的人去反对它。

可是你不要以为这种现象百分之百都是坏的，它还能刺激文艺科学的发展哩。由于这样的被提倡，被容忍，我们至少发展了一門原有的科学，那就是“文坛登龙术”，此外，又建立了一門新科学，那就是“文坛名单学”。

要給“文坛登龙术”和“文坛名单学”勾画出一个輪廓或者下个定义，不是我这种在精神世界里级别极低（甚至还没有级别，只是未入流）的人所能胜任的。因此，我希望一些对这类学問有研究的同志們来参加“爭鳴”。

很长期以来我们都热心于討論世界观与創作方法，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重大問題，这完全是必要的。但还有許多不合理的，也可以說是腐朽的东西，在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我們却没有大張旗鼓地，大声疾呼地去揭发它，反对它。这种无形的级别也正是其中之一。难道它不是阻碍我們前进的絆脚石嗎？

个人崇拜的精灵，去你的吧！現在是我們向你告別的时候了。

第三 指揮右派分子，四处放火，向党进攻， 把整风运动引向錯誤方向

一、5月8日在学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看来领导上有决心把这次学习搞好，所以大家任劳任怨。但我表示怀疑是否领导上有决心把这次运动搞好，领导上自滿过早，如职工学校。登东西要从历史性出发，編委会有太上編輯主任●，“夫妻商店”●就不能提？党员为什么不敢面对现实？如譚崇台作周鯁生貪污美金报告，为什么現在不敢講出真实情况呢？总之，党员有消沉情緒。

(2)党委会有意与无意要掩盖宗派主义，戴（銘巽），李（崇淮），是元老，对他們怀疑，任何非党群众要受到怀疑，这是排

他性。今天第一次战果①是不好的，連基本事实都未搞清。

(3)很多同志不滿意陈洽卿在报告中提出的群众要追查签名②，这是党推卸責任，是武大的一块遮羞布。如×××同志关于房子問題，也是这样。党不應該推卸責任而應該勇敢承認錯誤。

二、5月23日在中文系教工大会上的发言（部分記錄）

（当天有几个中文系三年級同学到他家，要他轉达几点意見，他（指程）就在大会上作了傳達）第一，同學們对×××副校长占住刘博老的房子表示抗議。第二，同学反映武大师生关系不正常，有的同学到老师那里去，老师先要問他是不是团员。这显然是肃反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第三，同學們要求明年分配毕业生工作时要有教授参加，不能只由人事处来分配。……同學們感到中文系問題严重，非常苦悶，青春在此虛度了。他們要求改进工作，以有利于后来一代的同学。（見“学习簡报”第七期）

三、6月4日在报刊联络站所举办的“运动往何处去？”的座談会上的发言（記錄）

第一，自从同学大鳴大放后，运动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學們很英勇，今后运动不能忽視这个力量，有人看見过漫画中諷刺，覺得似乎有問題，我認为目前运动进展的很健康，与历次运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有理智，也很有节制，虽然个别地方看来有点膿疮，但是主流是正确的，同學們絲毫沒有錯，不要气餒。

① 报刊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宣傳的陣地，有許多来稿要請党委看看，我們認为这是完全應該的，刘真同志在一次报告中也說过他是党委分管簡报的。但是程千帆就抓住“从老牛拉破車談起”（“学习簡报”第三期，內有許多对党委委員的人身攻击）一文大肆攻击党委說“为什么不登”！“簡报有太上編輯主任”！

② “夫妻商店”就是漫罵×副校长与其爱人×××的，程千帆在会上說：“提‘夫妻商店’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提‘夫妻妻貴’也沒有什么了不起”。

③ 在“鳴放”中，党委作了一个合作社签名問題調查报告，在报告后，到会的多数同志表示滿意，而程千帆大为不滿意，故意歪曲群众意見。

④ 指陈洽卿同志所作合作社签名問題調查报告。

第二，运动往何处去？往解决矛盾的地方去。目前群众很积极热情高，做法很正直、英勇，领导走在后面；某張大字报上写××同志是保守牌牙膏，这很对。有很多问题由于某种原因不便向群众宣布，领导在唱双簧，先拿一套试一下，如果能通过就算了，不能通过就出第二張牌，例如合作社签名问题，其本质在宗派主义，相信不学无术的人，反对正直的老教授，这次先由陈洽卿作检讨，看来很深刻，但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问题，群众不满意，張希光只好出面解释，他的这次讲话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流畅得多，可见事先有很好的准备。又如对×××夫人问题，两个二年前我就向王任重提过，在群众的意见提得没办法的时候，党委才决定将她调到党委会，这一来群众又愤怒起来了，昨天下午才不得不调到卫生科，这也是一套把戏，关于党员福利金问题，昨天宣布全部退掉，这是唯心主义的工作方法，有困难的人就不应该退；而有的人，如×××，×××（四年升十一级）就应该退；我对刘真同志为首的党委会是信任的，但觉得他对有的问题也处理得不漂亮，我以为党员应该真正与“三害”作斗争，很多党员是深受群众爱戴，而有的党员对别人是 $n-1$ 甚至 $n-n$ ，对自己是 $n+1$ ，对人是馬列主义，对自己是馬虎主义。

第三，我们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大家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假使党能更好的领导建设就要对坏人坏事作斗争，对不合理的政策、制度要加以改革，几年来民主生活很不够，徐懋庸统治时代的武大是“无声的武大”，我们提意见是没有用的，××继承了他，不理睬，如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五年计划可以四年或者三年完成，徐懋庸走后，××继承了他，积习未改，至今仍有×××这样的小徐懋庸，今后，应当有一个民主传统，党才能更好的去领导人民。

四、6月5日在中文系小组会上的发言（部分记录）

这运动不能同肃反比，因为那是敌我矛盾，但是否可以同“三反”思想改造比呢？现在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不是敌人，“三反”

思想改造时我们是敌人么？到底是以前严？还是现在严？老实说，现在的群众很好，比以前好，现在的运动是健康的。可比者不比，而不可比者对比之，这很不对。

刘真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自由么？

关于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问题，马列主义教研室陈隐若是教条主义，在我们生活里有这样的情况。杨普瑞踢人七脚，陈新蔚，张金煌写信给我说在运动中被打耳光等，就是实在的事实。这人权、民主不是成问题吗？但这个口号被路透社、法新社知道了不好，可以换一个说法，我觉得要用新的口号来代替旧的口号，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提法是对的。我们说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不等于说它没有缺点，那个旧口号不是压下去就了事，应用健全的新口号来代替。

五、6月7日在民主党派联席会上说：“让他们停吧！●再不行，民主党派也来个全师而退。”

又说：“要是帮助党整风，学委会便可以改称‘帮委会’。”

六、6月8日在中文系学习分会上的发言（部分记录）

帮助党整风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客人，主人请我们吃馒头，你却要吃面，主人要你提三大主义，你却要提争民主，主人自然不高兴。

群众在整风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做客的，这象主人出门，请客人看门，也好像请人炒菜。党请我们帮她洗脸，我们却全身洗到了，一直洗到脚，这当然不合规格。主人要你提三个主义，三个主义以外，你就不要多嘴。我们这些

● 指右派分子煽动大学报停刊这回事。

人在迷魂陣中積極地鑽了一個多月，現在比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痛心的是我的講義沒有寫，現在有三條出路，一條是繼續幫助黨整風洗臉，一條是將來幫助黨整風，一條是自動退出，我現在還沒有決定，將來是要自動退出的。

七、6月14日在中文系小組會上的發言（部分記錄）

“人民日報”說工人發言了，這帶有宗派主義情緒，黨對我們黨外，如果說現在是工人發言了，那我們以前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在鳴，好像我們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這我不服，我覺得我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我們每個人不能說自己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八年來我們在黨的教育下應該是有了進步，否認這點就否認了黨的教育，今天我們需要黨對知識分子政治上的信任。

八、6月16日在“學習簡報”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

一月多來，整風有提高，一月多來在報紙上出現了逆流。發表的意見，希望大家指正。黨發動整風，希望大家向“三害”作鬥爭。黨指出這個問題希望改善黨群關係，這個運動是史無前例的。運動進行了一月多，我們感到主流是健康的，絕大部分意見是與人為善，由於各人生活領域和氣質不同，故意見不同，有人激昂，有人溫和。這並不是意見單純，有人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要注意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反革命分子至少通過這二方面：（一）有人說黨有功績而遭到攻擊，如盧郁文。（二）如有人尖銳批評黨的錯誤，就接到恭維的信，我也接過，水生研究所所長也接過。有些右派分子以反社會主義言論來擾亂我們，“人民日報”“社論”上說有人說是否在“收”呢？怎樣來把別有用心和善意的言詞區別？只要有區別，就不要顧慮，大膽地放。（一）自己是否走社會主義道路。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是以資本主義道路來代替社會主義道路。只要劃清界限就可以大鳴大放。（二）這些人是口頭上說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走社會主義道路離開黨的領導是不行的，如章伯鈞要搞政治設計院，這是脫離黨的領導，若把這二界限劃清，他們頭腦就會清醒。

这些发表反动言論的人，是老早所謂靠攏党，但为什么現在出現这些言論？这說明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我們要求他們表明态度，赶快認識錯誤。我認为反三害是更为認識社会主义，对党提意見不是削弱党的領導，而是加强党的領導。整风中我們又受到一次教育。一、党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有創造性。二、思想改造过程艰巨长期，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設，头脑也更清醒，抛弃書呆子气。

九、6月28日至7月2日的部分言論

敌人中有本事的也要爭取他，吳开斌已作了檢討，你們（指研究生报刊）要帮助他認識錯誤①。

我說的話都是很全面，要断章取义說我是右派分子，那我只好承認②。

我是关門家中坐，禍从天上来③。

附：程千帆历史簡介

（节录省人代会第一届第五次會議秘書处整理材料）

程千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武汉分会筹备委员会宣傳委员会副主任委員，出身于“世代書香”之家，1936年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在大学讀書时即与C.C.分子苏恕誠、李永懋、高明等关系很密切，曾担任过C.C.主办的反动刊物（大道旬刊）的編輯，1935年夏天，C.C.分子为了扩大反共影响，曾組織过一次“南京大学生江西考察团”，程千帆自費报名参加到九江、南昌、瑞金等地去欣賞国民党的剿共偉迹，事后还曾写文章对蒋介石匪帮大加頌贊。1936年秋金太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在1938年到1949年曾追随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統局局长叶秀峰，做他

① 要×××同志轉告研究生吳代芳同学时說的。

② 向中文系席老教授說的。

③ “長江日报”揭露他以后，向席老教授說的。

們的私人秘書。程千帆與C.C.從1938年起一直到1949年共計有16年的深厚長久的關係。這就使得他在腦子裡扎上了反黨的根苗。幾十年這個根苗就一直在他腦子裡生長，一解放前不久，他曾罵共產黨與國民黨是狗咬狗。但剛一解放，他却表現得特別積極進步，事事左傾，迫切要求入黨，當然這只不過是投機而已，他曾私下說過：“只有入黨，才能掌握實權”，入黨不成，又在“三反”思想改造時受到了批判，於是，與黨就更結下了深仇大恨，可是他表面上却是偽裝進步的，他自稱為紅色專家；在會上，在文壇上，招搖撞騙，幾年來，居然攫取了種種要職，迷惑了不少群眾，他自己也就忘其所以了。

直到這次大鳴大放中，他的真面目才算徹底的暴露了出來。他惡毒地攻擊黨的領導，他說黨與非黨的關係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他說我們黨有兩種是非標準，對黨員是包庇，對群眾是虐待，說什麼黨成了黨員的親娘，群眾的後娘。他要取消高等學校黨的領導，他說民主黨派是陪嫖伴賭，他攻擊黨的積極分子，說他們是吹牛拍馬的小人，他提出入黨要五術，想割斷黨與群眾的聯繫。

他反對社會主義革命，他誣蔑我們過去的五大運動都是“捕風捉影”，是“違法亂紀”，他罵思想改造“三反”的成績“偉大個屁”，說思想改造是一場宗派鬥爭，肅反是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把憲法踐踏成了一張廢紙。他公開為胡風反革命集團辯護，他硬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這個公式已經過時。

他崇拜美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誣蔑蘇聯和我國連民主的形式也沒有，他說中國農民沒有民主的要求，黨員可以隨便違法亂紀。他反對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他說人事處是警察特務機關，是封建的黑暗的腐朽的小王國。

他指揮右派分子向黨進攻，他不但在武大校內大放，而且在校外到處煽動，企圖通過整風把黨搞垮，他被右派們稱為武漢市的反黨炮手，武漢大學的右派元帥。

陆华柏的右派言論

- 一、4月24日在华中师范学院邀集的一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载于“湖北日报”）

人民内部矛盾的形成，很多情况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另一方面，是群众看问题片面急躁，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个是非问题，但是是非问题的判明也是很复杂，为什么？就因为常常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有时，领导上强调是，群众认为非，领导上自以为是；群众心里不服，在过去群众心里虽不服，但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口服。有些同志自以为嗅觉很灵，从提意见多的人身上嗅到反领导、反党、反革命的气味，谁吃得消？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但在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脑子里，歪曲地反映为对抗性矛盾了。对抗性矛盾就照对抗性矛盾办，粗暴作风随之而来。这样，则有可能真的逼成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了，提意见的人本来是一股热情，就转化为“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就形象点说：“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久而久之这样的同志心里怀有恨意。这一“恨”就有对抗性了。我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很重的领导同志处理之下，是很容易逼成对抗性的。有时，倒是由于群众看问题还全面一点，经受得起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领导的“考验”。

提意见的勇气，我本来很大。从理论上我知道党是欢迎批评

的。但是，我在几年以前被两度扣过“反领导”的帽子，不免大吃一惊，我作过检讨，但是说良心话我对不合理的事有意见，但绝无“反”意。以后我说话注意得多了，但是意见还是有，不过放在心里。有时还把意见写在纸上，自己看两遍然后烧掉（怕麻烦）。我为什么被逼不成“对抗性”呢？一来究竟矛盾不十分尖锐；同时，我不断地读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和报章杂志，还有，从解放前几年起我就有这么一个信念：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动摇的，我由于不满现实，赞成和平、民主，遭受过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而且我也没有出路，生活颠荡穷困，所学不能施展。因此我就一直勉励自己：不能动摇，跟共产党走肯定了。因此，解放后我无论受过多少气，只是有些消极、自卑感、主人翁感不强，尚不致转化为“对抗”。现在听过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可以说是使我“心花怒放”，我一定要好好深入地学习这部活的马列主义的哲学。

我再谈一下音乐界的“百花齐放”问题。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和非虽然纷歧错杂，但终久总有结论；文艺上的百花齐放，恰因人民有多种多样的爱好，不会最后变为“一花独放”，而是变为“万紫千红”，后是允许多种多样而不是一个样，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是可以从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中尚可容纳各种流派而且个人风格。有人说，“你有个人风格是个人主义”，这样说是不对的，不能把大家的曲子改成差不多一个样。目前音乐界对萧友梅、刘天华、黄自等已故作曲家还应深入研究，吕驥过去认为新音乐只从“五四”开始，以前的不认帐了。以后有些人又把冼星海变成偶像，不对也算对，我们应该把传统看成是完整的，不能把以前的都抹杀掉。百花齐放要创造条件，比如专家演奏，要有会场，还要组织听众。象马思聪就被重视，我们这些卑微的音乐家，就只有投靠无门，我们如有著作，要经过繁琐的审查，侥幸出版也只出一版，售完也不印了。有的编辑还乱改，把意大利音符多数改成单数，弄得作者啼笑皆非，对于艺术实践活动，重

我是省文联和原来市文联的音乐部长，可是有职无权，刚担任市文联音乐部长时，很热情，想好好搞一下，一看才知道不过是要我挂个名，就灰了心，推选我当省文联音乐部长时，我就无动于衷了。

四、5月18日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 发言（摘要） （载于“长江日报”）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党与非党的矛盾，这是个客观存在，不必讳言，矛盾自然是两方面的問題，我认为现在党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只谈党员的問題。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为什么党群关系紧张？我看属于党员的，有这么一些問題：

第一，党员同志没有从思想上真正尊重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过多地抱着消极态度，虽然解放七八年了，他们一提到知识分子，总还是在想“旧”知识分子“留用”人员，资产阶级、历史复杂的人……等等。他们不相信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他们不能正确的估计知识分子思想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相反，现在应多抱积极的态度来看知识分子。

第二，某些党员不懂团结知识分子的规律，不懂得适应知识分子的特点来进行工作。高级知识分子大致有这么一些特点：

1.重视被信任、受尊重，胜过物质待遇，我亲眼见过一位领导同志在某系主任情绪不好时说：“下学期加你一級薪水”，这位系主任事后告诉我他认为这是“侮辱”。

2.重视学术、事业，胜过名誉地位，人们只看到知识分子的名位观点、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知道有些真正有学问的人，他最重视的是他的学术和事业。

3.敏感。

4. 容易接受馬列主义而不是不容易，某些党员同志往往不明白这一点，硬压高級知識分子听那些質量不高、照本宣科的大报告。

5. 耿直、坦率。

6. 不能容忍不合理的現象。

7. 自由主义傾向。

第三，某些党员在业务上外行。知識分子中党群关系不好，这也是一个原因。一般說，高級知識分子，业务內行，政治外行；而党员同志，政治內行，业务外行。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僵局，不利于团結。所以，两方都应补足缺少的一面。

第四，历次政治运动，党员同志以“改造者”自居，伤害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某些党员同志专橫，缺能，粗暴，气量狹窄，护短，歪曲辯証法——对也对，不对也对，左也对右也对（所謂“永远的正确”），甚至发展到权貴思想，老爷作风，使得党群矛盾更形尖銳。

第五，在知識界，假积极分子和幼稚的积极分子使得党群的矛盾更为复杂。某些领导同志，老干部，敌我界綫分得很清楚，警惕性也高，但对于人民內部的真、假、是、非問題，干部的真积极、假积极，是缺乏判断的。某些环境里，給知識分子一种感觉：“小人得势”。有两类干部：一类是有意識的假积极分子，拍馬屁、逢迎领导、乱汇报、欺上压下；另一类是不自覺的，幼稚的积极分子，教条主义，鷄毛当令箭，缺乏分析問題的知識和能力，宁左勿右，到头来也是乱汇报，增加緊張，問題的严重是这两类干部往往受到信任，其結果是真正的或自認為“有骨气”的人裹足不前甚至消沉灰心。

我对这个改善党群关系是乐观的，但也并不覺得是很容易解决的，党群之間有距离，有墙，有沟，都应当从团結的愿望出发，面对面开步走，拆墙，填沟；党员的步子应走得更快一些，劳动的热情更高一些，这就会影响群众的态度。

五、6月6日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座談会上的发言

(載于“長江日報”)

大放大鳴搞了四五個星期，在華中師範學院一度形成混戰局面，放的人又被人放；放的人，又被人放，主次不明，是非混淆。對非黨系主任，非黨教研組主任及某些教師、職員炮火也十分猛烈，聽說有一個血壓高的系主任，已經進了醫院。還有一個教研組主任被群眾斥為“政治騙子、經濟騙子、學術騙子和黨的奴才”。我說有些人固然自作自受，但也有些人其實是代黨受過。特別是涉及肅反工作，黨應注意到這件事。

我們音樂系，據說學習分組是根據這樣的原則：把認為接近系主任的一些人編在一起，把認為對系主任意見大的一些人另編在一起。這種組織形式，就使人感到運動的矛頭光是對准一個非黨系主任（是不是出於黨的布置，我鬧不清楚）。當然，我們做系主任的也歡迎整一下；但不一定每個非黨幹部都願意這樣。黨群關係，先整群，後整黨，我看不妥，群眾這樣搞，黨應表示態度。

象我這樣的群眾，叫做自身難保，怎樣幫助黨整風呢？

不過，我还是要提點意見，群眾一起來之後，就很难保持“和風細雨”，因為群眾過去從來挨的都是“狂風暴雨”，實在不習慣，我認為風雨是根據氣壓高低和雲的厚薄這些因素決定的。氣壓太低了雲太厚了悶得很，就要下場雨，氣壓就是民主生活，雲就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我想說一個單位，群眾鳴放起來，風是幾級，雨是幾大，這恰恰就是氣壓計和寒暑表，而一場風雨，必須要讓他下個夠，雨過才得天晴，矛盾解決了，才能團結得更好，才能前進。我自己雖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我仍然認為風雨應該吹夠，下夠。我是贊成大鳴大放的方針的。

怎樣办好高等学校？我不贊成黨委退出學校。

我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我承認高級知識分子學識淵博，有才能，有經驗，會分析問題，會出主意，會想辦法，對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很大作用，他們是國家的財寶，應該受到尊敬和重視。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承認高級知識分子有不少弱點：容易脫離實際，較為自私，文人相輕習氣很重，愛鬧不團結，不負責任等等；個別的人並且作風不正派，工心計，愛燒陰火，愛搞小圈子。我承認解放後，我們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某些意識、作風仍然或多或少殘留着，這也是事實。

我認為，黨委在高等學校作為領導核心而存在，是必要的，是必不可少的。

我過去在福建音專、湖南音專等高等學校當過十幾年教授，飽受過宗派傾軋的痛苦，那時大家把精力用在勾心鬥角的人事糾紛中，學校當然辦不好。解放後，這些陰影收斂了很多很多，但也不能說已經完全消失。

我，作為一個非黨教授，系主任，本着我多年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憑着我的良心，我應該說，黨委不能退出高等學校。

但是我這樣說，並不等於說目前黨委領導高等學校沒有問題，正相反，問題是很多的，從現象來看，是的，在舊社會也好，新社會也好，高級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壓抑一般說來是差不多的。在舊社會的高等學校里，我們遭遇到的是黑暗政治，黨棍，學閥，宗派幫閥的壓抑、打擊和排斥，當時較為正直的人，只得到青年學生的愛護可以說是唯一的安慰，大多數高級知識分子是用十分興奮的心情迎接解放的，然而，幾年來，在高等學校里，舊的統治換了新的統治；從現象來看，國民黨的老爺換了共產黨的老爺，高級知識分子受到的壓抑、打擊和排斥差不多，甚至過之。有學問的人，從前多少還受到一點尊敬，現在都沒有了。痛心的是青年學生也瞧不起你了。同事之間，朋友之間，淡漠、冷酷，比舊社會還要厲害，其結果就是普遍的灰心，消沉，造成這種局面，和高等學校中黨委錯誤地執行知識分子政策和學校中黨員（特別

是領導同志)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完全分不開的。

從現象來看舊社會高等學校的統治集團和新社會高等學校的領導集團好象差不多。因而引起人們懷疑：是不是黨委退出學校還要好些？

我不是這樣看這個問題，舊社會高等學校統治集團以及那些宗派幫口在本質上是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他們壓抑、打擊和排斥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較為正直的人）是必然的，是不可改變的。新社會高等學校的領導核心——共產黨，在本質上是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他們壓抑、打擊和排斥高級知識分子，是一種暫時的錯誤，是沒有必然性的，是可以糾正和改變過來的。事實上共產黨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早就具有團結高級知識分子和把高等學校辦好的願望，並且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同時不論想辦好什麼事，沒有核心領導是不行的。因此，我認為黨委不能退出高等學校。問題在於黨委的領導思想、作風必須好好整一下，必須下決心整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必須擴大民主生活，發揮群眾（包括民主黨派）的積極性，必須倚靠有學問、有經驗的老專家、老教授。只有在新的基礎上大家團結起來，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努力工作，這樣才有辦好高等學校的可能性。

六、6月16日在中國民主同盟湖北省委擴大常委會上的發言

（載於“長江日報”）

百花齊放一定會有鮮花和毒草，不應看到毒草就激動，我反對章伯鈞的言論，但對這種言論不應該壓，應爭論，劉勁查陳新桂的歷史有壓的意思。如用教條主義來反對修正主義就把盟內搞亂了，應用正確的言論來和他爭論，要他放棄自己的錯誤意見，沉默是錯誤，咒罵也不能解決問題，對盟內的問題也應本着整風精神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處理。

附：陆华柏的历史簡介

(根据省人代会第一届第五次會議秘書处所整理的材料)

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武汉音协副主席，对外文协理事，武汉艺师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三級教授，湖北省民盟委员，艺师民盟支部主委陆华柏是一个言行上一貫反党，作风上专横独断，业务上投机取巧，生活上下流无耻的老右派分子和典型的坏分子。

早在1939年对日抗战时期，陆华柏反共反人民就已“才华”毕露了，当时他为了紧紧配合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在“艺术战线”上，陆华柏有恃无恐的在桂林国民党标准反动的“扫蕩报”上，对党所领导的新音乐进行了疯狂的“扫蕩”，在他发表的“所謂新音乐”一文中，对共产党恶意誹謗，对新音乐痛加詆毀。

“五四”以来，明目張胆，公开对党所领导的新音乐进行宣战的，只有陆华柏一人，也只有他这一篇空前絕后的“文章”，这一件事震动了当时的全国音乐界，同时也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統治者的“备加贊揚”。“扫蕩”有功，理应“犒賞”，于是陆华柏的“音乐”得到了伪教育部一笔为数可观的“文艺奖金”。陆华柏在“感恩”之余，对他的“一个領袖”，蒋介石肉麻的大作其“頌歌”，大概見他的“領袖”反共反人民反得“操劳过度”，于是用“庄严的感情”譜出了“血肉长城东海上”“白了元戎发”！正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反动头子桂系大軍閥白崇禧在湘桂“指揮”着他的“大軍”背对日寇狼狽潰退之际，陆华柏的“才华”又来了，蒙着良心写了一首所謂“这一仗打得好”的“捷报”歌。把“小諸葛”（即白匪）的“英明指揮”烘托得絕妙神奇。只到解放后，他还得意的对人說他这首歌当时立即傳遍了前綫后方，大大鼓舞了軍民的“抗战情緒”，并說白匪还特別悬賞光洋一百块，請这位不署名“音乐家”前去領賞。

正当蒋介石“号召”十万青年十万軍，准备着一次更毒辣的反共高潮时，陆华柏又用他罪恶的音符，立即譜出了一些鼓动青年“响应領袖号召”的“从軍歌”，并且在福建永安用他那双罪恶的手指揮过万人合唱，唱的是十万青年十万軍。为了“鼓舞”蔣匪軍的“反共士气”，解放前夕，他在南京国民党后勤部大作其“效命領袖尽忠”的“雄壯軍歌”！

在长沙湖南音专时期，陆华柏認為是他进步历史中的“黄金时代”，从1949年一直吹到1957年，經常炫耀他当时如何“领导学生护校、保产，迎接解放，如何逃跑反动校长胡然。現象上确有其事，實質是因为胡然要解他的聘，他老羞成怒，恰好当时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工作，陆华柏見风使舵，往学生群中一倒，既报复了胡然，又表示了进步，一举两得，还有一“得”是見不得人的心底秘密：赶走了胡然把校长位置搞到手！

解放后，党对他真是寬厚不过，不算旧帳，不究既往，而且在物質上給予优待（三級高薪），在政治負以重任（人民代表），甚至連出版或演奏他的作品，党一直是面面照顧，处处支持，总期望他能在党的感召下改造自己，将功折罪，为人民作些有益的事，但陆华柏不仅不动于衷，反而以怨报德，对新社会百般不滿，就在“鳴”“放”前些时，他还恶毒誣蔑，当时在桂林地下黨員李凌同志等对他的反动艺术观点进行的严正駁斥是“圍剿”他，是党“鬧宗派”。并且恬不知耻的說，他其所以写“所謂新音乐”这篇文章，旨在维护“民族音乐”！（“维护”他白了发的“元戎”！“维护”他“元戎”的十万青年十万軍！）发展到今天，公然野心勃勃的指使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到处点火，煽动师生，向党猖狂进攻，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党的领导，妄想将昔日“威风”卷土重来，再度称王作霸。

章導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章導是廣東梅縣人，現任民盟湖北省常委、宣傳部長、民盟中南政法學院支部主委。中南政法學院教授，並擔任哲學教研室主任。他一直披着民主人士和教授外衣，進行反黨反人民的活動，鳴放期間發表了一系列右派言論。這個材料，是根據中南政法學院所整理的資料選編的。

一、誣蔑黨，反對黨的領導，企圖篡奪黨的領導權

章導傳播說：“老黨員是經驗主義，新黨員是教條主義，合起來是主觀主義。”

他說：“有人說過去黨員，吃苦在先，享福在後，現在的情況都是享福在先，吃苦在後，過去說黨員大公無私，現在看來都是大私無公。”

“老黨員所以取得群眾的信任，是因為過去參加黨是在艱苦環境中作了很大的奮鬥，但解放後的情況就不同了。解放後入黨的人是青年人認為黨有地位能夠提拔才入黨，這是以黨的光榮為自己的光榮，這是損害了黨的事業。”

他說：“有人說，象這樣的黨，叫我入我也不入，現在武大、民院、工院都認為黨員不好。人民大學葛佩琦的發言反映了一部分道理。”

章導說：“宗派主義是三大主義的中心。”

他攻擊黨的幹部政策說：“把入黨的視為進步，把不入黨的視為落後，這甚至已經成為一個社會輿論。提拔、照顧都是先看你是不是黨員。”

他說：“对党外人士安排不当，学校分配工作不实事求是，一切大权都掌握党员手里，民主党派最多安排一个副职，或无关重要的职位，这样就不能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按：老教授多半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他又說：“……旧法学教授立场、观点已根本改变了……。”

他說：“我院福利救济工作中有宗派情绪，不是以困难大小为标准，而是以干部的等级来决定，对领导同志则尽可能的帮助，表示讨好上级，对党员有些照顾情绪，党员和领导救济的钱就比其他人员多些，对群众不一视同仁，对下级干部也经常救济不多，对院系调整来的教师，没有给予必要的救济，或救济了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如果××是党员同志，我想问题就不一样了，每次救济发动群众评议，作得不够，总是人事处先提出名单（按：事实是事先从工会各部门委员会搜集上来需要救济的名单），我认为人事处已决定了的名单才拿出来叫我们研究，我就照例同意。”

（按：中南政法学院1954年临时救济，党员只占29.6%。1955年占32.1%，1956年只占24.7%）

章導說：“我們學校各級領導存在各種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而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呢？他說：“这与我院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即‘由于各个单位里面，党团员占相当的比重，因而各級領導就往往习惯于运用党团的力量……贯彻方针、政策和决议……問題也往往产生在这里，使各級行政领导同志习惯于‘坐堂問政’……产生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

章導傳播說：“毛主席已經考虑在高等学校取消党委制。”

他說：“我們學校的缺点是什么呢？是‘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缺点呢？他說：“我們學校三个院长和几个处长皆是党员，全院教研室主任科长級以上的位置都为党团员包办，形成‘清一色’，使老年教师的潜力和积极性不能发挥”、“一切都依靠党团办事”，“党委包办一切”，“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党手里。”因而形成“党政不分”，“束縛了其他組織力量的发挥”（民主

党派和工会——章导是工会主席），“限制了教学人员的积极主动性”、“不能发挥群众的潜力”。

他说：“党把学校工作岗位看成政权东西了，好象把这些岗位给党外人士，就是分割了他们的政权。”“最大的问题是学术委员会没有权力，党委会讨论以后的问题才交到学术委员会，这是形式主义……。”

章导说：“对党外人士安排不恰当……民主党派最多安排一个副职，这样就不能真正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而党内大部分又是外行，甚至一部分主任不懂业务，没有搞过教学工作，对教学他们是‘隔靴搔痒，指手划脚’，再加上不深入群众解决问题，对大学生的特点没有摸清楚，用的是中原革命学校的方法来对待正规大学的大学生，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没有摸清楚，认为历史复杂，难于信任。象这样怎能办好学校呢？”

章导提出了他的主张：“党委制在当前还应该存在，但它的作用只是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发挥教学人员的潜力，不能‘以党代政’不能‘党政不分’，行政领导应该有职有权，如果行政领导是党员，应该建立院务委员会，它可以组织一切力量。”

章导说：“院务委员会是在院长领导下的学校唯一的决策机构。”（院长必须不是党员，因为他說，我院的领导既是党委书记，又是行政负责人，所以形成“党政不分”。）

章导建议“在大专院校成立各民主党派联合办事处”，并且要把牌子挂出来，建立“民主党派党委会”。

他鼓吹说：“这次民盟都发了言，民盟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群众对盟组织的认识也不同了，很多人找我要求加入民盟，要求老教授支持‘鸣放’，大家有事不去找党，而来找盟组织。”他提出：“要在学生中和超龄团员中发展组织。”

他主张：学校应经常召开“党派联席会议”，通过党派的协商，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决定提交院务委员会（在往下他又强调了具

体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章导在“中南政院”发表文章说：“工会是全体教工群众的独立组织，它也有监督行政的责任……。”对党的领导只字不提。

二、否定政治运动成绩，造謠生非，为反革命减冤

章导说：“在高等学校里，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一切，只许赞扬，不许批评，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主观主义的否定一切。在领导方面，往往在各种政治运动告一结束时，总是说：‘成绩是肯定的，缺点是难免的’，或者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当然，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得出这个结论，谁也不会加以怀疑，可是具体到某一单位，或某一高等学校，情形就往往有出入，譬如‘三反’运动时，许多被怀疑有贪污的人，事实还没确证之前就被戴上了老虎的帽子，当着老虎来斗争，但结果呢除了极个别确有贪污行为外，大多数仅是大胆怀疑的对象。同样的，在肃反运动中，也有类似的事实，不少曾经是肃反对象的老教授对我说：他们仅仅是被怀疑的对象，经过几个月、半年、一年的集中管制，也只能证明他们是历史问题，或思想作风问题。”

章导说：“我院肃反中有许多人无辜的被斗争了，尤其老年教师有40%以上的人受到打击，平反工作到现在还未做，很多人非常不满。”

章导说：“武汉地区是有缺点的，而且缺点比较大……。我院存在的問題，其他高等学校也存在。”

三、恶毒地攻击人事部門

章导说：人事处是“閻王殿”是“制造不团结的部門”。他说：“人事处要么就撤销，要么就调有社会经验的人来作，要么就缩小人事处职权，只管档案材料，并使档案材料公开。”

四、仇視社会主义制度

章导非常拥护葛佩琦所謂“解放后的党群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誣蔑党和群众关系的言論，章导說：“以往是‘海內有知己，天涯若比邻’，今天領導与被領導之間也往往是‘相見不相識，相逢若路人’，‘相处七八年，愈來愈疏远’！”

韦卓民在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 召集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按：韦卓民系华中师范学院教授，这个材料选自华中师范学院7月13日“学习快报”)

我认为运动边放边改挖掘根源不够，建议座谈会从挖掘根源找出因果来谈，才有助于党整风。

高先生的发言我认为还只是增加了一些现象没有找到根源。

陈宣同志原是有病的人，我很同情他，据高先生所说，陈宣同志是宗派主义的牺牲者，我在汉口开了两天会，回家后看院刊（“学习快报”）才知陈宣先生逝世消息，我很有感慨，一个身体有病的血压高的、能力不大强的、但是好好的人，被宗派主义牺牲了，很可惜。

三大主义的根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什么呢？我想进一步追根。它表现在不信任某些人，而信任另一些人，因此就形成宗派主义、形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认为主观主义是三大主义最危害的是主因。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不从实际出发，1951年7月16日华大改制那时，×××同志把中原大学过来的×××等同志的情况，都替我作了介绍，与我说了很多知心话。但我不是搞教育行政的，坚决和×部长讲，我最好不继续任校长。×部长到北京去，我要求辞职。×部长说到北京开会后再讲，×部长回来后，说中央已确定了。我说为什么不把我的意思反映到中央。×部长说为什么依你不依我呢？那就只好服从组织。后我的确当了傀儡校长一年，傀儡到什么程度呢？×××任秘书并不甚

称职，我也看出他太不行，总是事情办好后送来我签字，我想为什么办好了还要我签字呢？后来我干脆把私章交给×××去办，这是我認識宗派主义的起头。

思想改造是培养某些人来搞某些人的，当时說“韦卓民无动于衷”，的确我的思想改造不是通过运动，而是通过祖国的建設蓬勃发展，才有成績的。我分析这次运动，使我感到領导上官僚主义是肯定的，宗派主义是不可諱言的，这都是从主观主义来的。1949年武汉解放，我們住在蔣管区都是被解放的，不是革命的；南下的同志是革命的，而我是住在蔣管区又在教会学校工作，就硬說我与反动派有联系，到底我是不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呢？解放区来的同志們以功臣自居，驕傲自滿，“沒有共产党就沒有中国”的歌子我觉得要有一个“新”字。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中国”这样歌子鼓励了一些人功臣自居，驕傲自滿。真是功臣还可以，但有些是解放前后才参加革命的，难道他們也是功臣嗎？以打游击的一套法宝来办教育办技术。是不是驕傲自滿呢？我看了几年了，但不敢講。五六十年我都是在学校。我是在学校中成长的，到工厂我看不出什么，但在学校，只要呆半天，就能看出問題。思想改造后，我是一脚被踢开的。两三年来，我从宿舍到校大門都是走大路，不敢走办公厅的小路。为什么呢？瓜田李下、各避嫌疑。思想改造后不久，我母亲病故，我未奔丧，因为我家在中山县，是边防区，我自避嫌疑，不敢回去。1953年7月初，我与郭主任說，希望回家一次。郭主任說：“你應該回去当时就应当回去的。”但当时我怕党不了解我，不敢回去，不是心虛而是不知道党相不相信我。

我不是研究教育行政的，对学校行政并无兴趣，不任校长，我更能安心，只希望党为我作出結論。我是相信党的，但不知党对我是否怀疑。1953年总路綫学习，因为我感激×××同志，思想改造时他告訴我，叫我只說帝国主义思想，其他都不要說，过去我无愧于己，解放学习后我觉得有愧于人民，并无其他，于是

就大胆說了对领导一些鷄毛蒜皮的意見。因之肃反中又說我不靠近党，与党有距离。我是有所不为的人，不是无所不为的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怎样靠攏党？“靠攏”对我說就是巴結，我們知識分子是不干的，應該說是相信党、尊重党、不怀疑党。而肃反借故整人，我肯定肃反有成績，不同意某些人的說法，說肃反沒有成績，我們全国肃反肯定了98%以上是好人，成績是了不起的，但成績不是我們肃反办公室搞的，偏差才是肃反办公室搞出来的。說到工資改革，有人問我滿不滿意，我們的二等学校至多的有二級教授，我没有什么不滿意，一个人实在是几級教授乃是客觀存在，別人給我那級，是意識形态，級別高低我何必管？

我問×××同志为什么肃反中，搞我？她說：“你不是对象与×先生一样是思想批判。”我問×××同志“李××是不是对象？”她說：“是的。”我說为什么对我的形式又与她一样呢？她答不出来。我問她：誰指示你要这样搞？她說：“是我搞的。”我說包下来不行！是思想批判为什么批判到一家人，使我十六天不能出門，嫖娼出門也要搜查，我一个亲戚从上海回来都要追問？

我不怕唯物，只怕辯証，因为情况全变。

党群之間的鴻沟是由革命先进和革命后进之間划出来的，从邏輯上講也是馬列主义。我承認有些旧知識分子是反动的，但也有共產黨員是反共的——如高、饒。因此不能把党与非党作为划先进与落后的界綫。思想改造后已五年了，肃反已两年了，不能总把我們看成落后。

现在超政治不好，过去不革命，只能超政治，这是洁身自好，而一些人不了解当时情况，把过去的超政治搞得厉害，这說明馬列主义水平太低，連A、B、C也不懂，不是主观主义是什么？

几年来把学校当軍队办，今天开会、明天开会，都是几个人，甚至参观、旅行也是这一組，学院千把教工，而我們互不認識，肃反后連过去認識的也不敢接近，因为不知道誰是不是反革命，馬克思主义談普遍联系、談团結，結果变得个别孤立。过去一个

阶段犹可言，但經過肃反后是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們却没有看出新的措施。学院党和我們都赶不上时代，我們应通过这次运动，天翻地复地翻出学院存在的問題，帮助党整风，好来大家一起赶上时代。

这个运动，依我看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找材料，摆情况。第二，是分析追根。第三，是坐下来大家清除根源，使党能领导学院健康地前进。三个阶段应该是互相联系的。照我看第二个阶段未搞好，要挖根。例如我認为宗派不是中原与非中原之分，而是以中原为骨干形成的一个宗派集团，这个根源要党在整风中才能真正的搞出来。运动中教育系現在还未动，而宗派最厉害。×××是靠近小核心最近的一个，1953—1955年每个老教师都有个青年教师跟着。黄溥先生教了几十年書，我不敢承認也不能承認黄溥先生会比青年教师×××差，为什么要×××来领导黄溥先生的教学呢？青年教师說：你們懂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思想改造中說的，过去的东西我都丢得了，就是有些东西不能丢的，一是宗教信仰，誰也不能摸我的，二是外国語，要我忘了也忘不了。現在又有用起来了。但，問題好象总是弄不清，是什么問題呢？材料还未归攏嗎？整个材料都能搬出来，就能帮我作个結論，現在我是安心的，因为問題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老教授現在教課很难，动不动說有反动的思想，否則說政治性不强，因此老教师講課不敢自由發揮，講課干巴巴的，不敢多講話。政治性不强是相对的，不是絕对的，这次揭发出来的党的领导有些地方政治性也不强啦。

外行人办学校是不行的，学校作军队办。只談口号，不講本質，例如“全面发展”怎样理解呢？宗派的鴻沟划得这样深，把学校搞得这个样子，太可惜！

旧社会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无所不为，一种人是有所不为；我是有所不为的人，天天汇报的是无所不为的人。

我所講的話是代表一般知識分子的，但党不了解，不具体分

析知識分子，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知識分子，光为他們戴頂帽子，学院的許多老知識分子就不能開課，积极性不能發揮，对教育事業是損害很可惜！

艾瑋生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艾瑋生系民盟武漢市委員會委員，華中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這個材料，是他在鳴放期間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摘要。

一、在華中師範學院非黨教授座談會上的 發言（摘要）（見5月19日“湖北日報”）

肅反後，領導給我作了結論，我也給自己作了結論，這就是：少說話，少做事，少來往。在這次學習前，我曾寫一萬多字的一封信，準備給毛主席，主要內容是說“得天下容易安天下難”。這次毛主席的講話，把我這個結論動搖了，使我精神恢復了一點，見人還能點點頭。我院不過是在初放中，為了更好地放，希望黨要做一次動員報告，不要再象×××副院長上次報告的那樣輕描淡寫。希望為了社會主義，黨員同志要勇敢地把手槍交給群眾，有這樣的決心，才算真正表明了態度。同時對於那些所謂積極分子，即中原大學的那批以改造別人自居的人，也要動員一下，解除他們的顧慮。還有一批過去被人認為是非積極分子的人，挨過整，不敢說話，這回應叫他們看到馬列主義，看到毛主席，不要使他們只看到院里的黨委，這樣他們就會感到心胸開朗，有信心有勇氣。

二、6月4日在中共武漢市委召開的座談 會上的發言（摘要）（見6月6日“長江日報”）

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是有懷疑的。“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的提法是不是不够恰当？因为“长期共存、互相監督”是对等的双方的平等称呼，不能以不平等的双方来平等对待。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地位有所不同；共产党是大党，民主党派都不大，小的怎么样来監督大的呢？这是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长期共存，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

以过去的事实来看，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比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这个文件上改几个字，象“之”字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拟定計劃民主党派是不参加的，党对民主党派是帮助指导的地位，民主党派是被帮助被指导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監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間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后，社会上出現一种新的形势，新的形势到来之后民主空气提高了，大家积极大胆的“鳴”“放”，提高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我們还没有一套經驗，通过这次整风，民主党派如何在扩大民主中发挥作用，这是值得考虑的問題。一定要长期共存，互相監督，如何作呢？这个問題也需要解决。

民主党派今后应该充分发挥他們的作用，他們不仅是参加施工，还要参加設計。要設計，就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不再是在会上举手通过，这样就加重了民主党派的責任。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階級领导的，国家的方向如何，建設好坏，我們大家都要負責，共同研究施政方針，共同来保証它的实现。自然，民主党派的地位也要改变，领导与被领导的問題，是不是平起平坐，把这个問題如何能明确起来。

在做法上应成立知識分子党，将民盟、民进、农工、九三等几个民主党派合并，成立知識分子的政党。这个政党是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党。目前有些单位民主党派成員多少不等，有的三、五

个，有的上百个，如果組織起来，他們会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反对前年大規模的肃反运动。我認为这次肃反运动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对新形势認識不清，我国有句古話“杀鷄焉用牛刀”，可是我們杀鷄确用了牛刀，結果是得不偿失。开展肃反运动我們是学习了苏联的，苏联肃反是在第一个五年計劃第三年，他們那时候肃反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一方面他們要求工业化，搞农业合作化，另一方面富农反革命作乱，公开的出报纸，搞集会，同时由国外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他們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如果他們不肃反，社会主义建設便不能成功。而我們中国呢？1955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計劃第三年，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前夕，国内稳定，宪法已經頒布，当时苏联是沒有頒布宪法的，我們却由胡风問題引起肃反运动，結果是得不偿失。我們頒布了宪法說明我們国家安定了，而苏联当时沒有，他們杀人是應該的，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却不是这种情况。再由国际局势来看，1955年亚非会議召开了，四外长会議召开了，中央宣布国际局势肯定的趋向緩和。所以說我們的肃反运动是錯誤的。

中国的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包办了，其实党员包办不了，一般群众也能运用馬列主义。但是当时却为这个肃反运动的錯誤决定作了宣傳，宣傳斯大林所主張的愈是进入社会主义边缘，阶级斗争也愈是尖锐，这个說法在当时苏联是正确的，而在我們却是錯了。我很沉痛，我是被关的，但是肃反并没有搞出我什么问题来。最近对我說搞錯了，可是又問我，难道你一点思想問題都沒有嗎，这样的說法我是搞不通的。

×××是搞思想工作的，但是他沒有摸清知識分子，可是帝国主义却摸清了。他們前几年就說知識分子要民主、要自由。我看今天的“鳴”、“放”，也就是开放民主，发揚自由，現在报上每天都“鳴”、“放”，知識分子是很愛看的，大家有了发言的机会。毛主席是英明的，如果不这样“鳴”“放”，我就不准备改变自己訂下的“少做事、少說話、少来往”的清規，現在我覺得我錯了，要

“鳴”要“放”問題就解决了。

上次大規模肅反的損失有三個：1.損害了中國五千年的民族文化傳統，使大家六親不認，朋友不能往來，師生見面低頭走過，象是不相識的生人。在土改時我鬥爭地主，思想改造時我領導學生鬥爭校長，肅反時使我被學生鬥爭，現在大家見了面也不敢說話。

2.使人們懷疑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有真正遵守憲法的誠意，學校黨委書記竟在大会上宣布逮捕人，這是違法亂紀。有個法庭搬到我們學校來，審判了兩個不能構成法律處分的案子，這簡直是兒戲。

3.抹殺了人的尊嚴，以“莫須有”的名義來鬥爭一個人，使人喪失了自尊心。

建議向被鬥爭錯了的人道歉，恢復他們的政治名譽，同時重新估價肅反的成績。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偏差是個別的，在我們華中師範學院是欺騙人的。

三、6月17日在民盟華中師範學院支部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摘要)(見6月18日“長江日報”)

艾瑋生重申了他的幾個論點。他首先談到肅反運動，他說這是歷史上的錯誤。他認為我國在1955年的情況和蘇聯在1930年前後的情況是不相同的。他說蘇聯在1930年前後，國內有布哈林等反黨集團，還有富農分子猖狂活動，國外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因此，蘇聯當時進行肅反是有必要的。1955年，我國國內只有胡風一小撮反革命集團，憲法公布了，在國外有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聯在一起，因此，在那時提出大規模進行肅反，是歷史上一個大錯誤。他說，他是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提出來的，如果別人不同意，還可爭鳴。

他談到四個民主黨派合併的問題時說，這個問題過去也有人

提过，理由有两条，一条是这四个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都是那么几个；另一条是发展对象也很难分。他说了这些话之后，还说了这样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四个民主党派合并之后，力量大。例如华中师范学院的民主党派合起来的话，就有一百多人。

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他说，他有所怀疑，也有所体会。怀疑的是，互相监督，有平起平坐的意思。可是共产党是大党，民主党派是小党，拿什么来监督呢？这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以前在发言中提出了改变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要求更正。但是他马上又说：这个矛盾现在他个人并未得到解决，仍然在矛盾中。然后，他说对这个方针有两点体会：一点是“不只参加施工，而且要参加设计”；另一点是在责任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分担。

吳联輝的右派言論

(吳联輝系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这个材料选自华中师范学院“学习快报”)

一、5月18日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 教工分組會議上的发言

1. 对整风的認識。

2. 对院系领导的印象和意見。

这次整风是一个光荣的不流血的革命,是关系着将来的兴敗,党国的存亡,爱国主义者都应劳神苦思。

爭鳴过去在我校,是被压制着,去年×部长說唯心主义不能講,是对馬列主义喪失信心的話。

我初来校,曾拋出磚,但未引出玉,我鳴以后,对我个人发生了不好的后果。

曾在西北,我認为重工业应重視,也应重視輕工业,連手工业也要重視,結果青年对我大圍击,結果我滚蛋了。

近来連篇报纸簡直是鬼哭神嚎,充滿血泪,是极严重的,党現在起来革自己的命,令人佩服。我校学术空气不濃,教条主义严重,新老之間有墙和沟,应拆毀。現在还暴露不够。

院刊我不滿意。①主要問題未找出,要害未打中。②老年教师痛快的話說不出。

鷄毛蒜皮掩盖重大矛盾,結果会混过去,这就是宗派主义。

院党委的动員,布置在假期,很多人不知道,問問几个人說

报告一般化，認識太落后。

学校簡直是衙門，层层級級，尽是行政干部。我們是一个警察国家，人人自危，大半都不敢真心相处，生命是苦的，不要算了，还有什么积极性可言。高教、教育部应負責任，衙門下討生活，誰不是官僚主义。

为开“巴黎公社”展覽会，为經濟問題，×主任說向总务长請示。总务处是为学术服务的，无請示之可言，官僚衙門习惯了。教条主义，听課說是檢查，是什么話！学术要檢查，成什么話！

我提出材料，說是資本主义国家的書。中国东西則綫装書不能看了。教条主义不搞垮，学术不能进展。

宗派主义：我来校后，提了几条合理化建議，当面是滿臉笑容，随后都告訴×院长去了，說人事处对我有意见，××見了你头痛，并說我（楊）不能帮助你，他們会找你說三天（可能是斗爭），我不怕。

官僚主义非一棍子打死不可，可是很难，三反結果搞成了反貪污。

新老教师之間，青年教师見那一个老年教师不好，就認為所有老教师不好，賢者尊賢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否則搞成了一个禽兽世界，学校不办好了。

知識无新旧，只有是非真理。

党委制与教授治校問題。尊重教授精神原則值得考虑（我亦非贊成教授治校），党与政将来权限应分清，校务委员会将来会成立的。領導上解決問題要及时，要主动。

我自己的問題，要解决，要院領導或教育部負責，来校后从院长，系主任……說了，結果不能解决，就是官僚主义。以前我有万多字写給党中央，前×院长跟我談过一次，×××部长說教育部犯了严重官僚主义，我很安慰。

教育部簡直是“欺人”騙我。輕許諾言，怎能主持高等教育司。

× 院长对我也輕許。

我离开西北师范学院，沒有到处工作，西北大学找我，西北师院搞我的乱，西北师院院长“某”是延安的老干部，怎能当院长。我的問題有人說不在高教部，在华中师范学院，我也相信，教育部是銅墙铁壁的官僚主义。

我現在要求很简单，希望迅速具体解决。我希望跟两个院长說一下（約我一个時間），究竟那里解决，否則工作搞不下去，生活更搞不下去。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但要紀律制裁，而且要賠償。

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思想顧慮，就是档案袋子临死本人都不知道，摆在人事处，有一天某人写一意見，装进去，本人那里知道，問題就出在人事部門。这次整风运动，这个問題要搞清楚，拿出来大家看看，不对的应当毀掉。

吃牛奶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大学教授到街上討牛奶吃，全世界都知道，今华中师院，我吳联輝教授，拿錢买不到牛奶吃。

华中师院有人用手段排挤我，可耻！不滿意。

二、5月19日在民盟湖北省委座談会上的发言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是否可以独立、平等、自由呢？我个人看法是可以的。一个人尚有独立的人权的存在，何况一个党派！言論是要有自由的。共产党在目前看来，包办不了，必須与民主党派长期协作。民主党派过去沒有起到监督的作用，为什么不說話呢？尤其是民盟过去貢獻很大，今后的貢獻更大，更應該互相监督。

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学术能够发展，学术的发展就是自由民主的发展，学术愈爭理愈明。什么是自由主义？首先要弄清这个概念，毛主席当时提出是指的作风而已；还

有一种解釋是属于經濟学上的。我們不能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中用自由主义的帽子扣人，思想就是要自由。大学必定是以学术科学为第一，并不是強調学术第一就是忽視政治思想，我認为重点应把学术摆在第一位，我不強調政治第一，要知道科学是没有階級性，科学是无国界的。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要明确什么是它的內容，必定还是保証科学的发展。我們进一步考虑政治思想崇高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是解放全人类的。党员就应该抱定終身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果不確定这个目标，以后偏差还会发生。学术科学也就包括解放思想，如学术科学得到发展，就是达到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

党委制問題如何解决？我不贊成党委、民主党派退出学校，因为学校也有政治生活，但不能妨碍学术研究。校务委员会应该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校务委员会应该是年高德劭的人参加，党是保証任务的順利完成，絕不能干涉行政，成立教授会，我却認为沒有必要，校务委员会是非实行不可。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但不是一党专政，其他民主党派也有責任。如果党不干涉行政，党在学校的活动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党是間接的，所謂党与群众的关系問題就不存在。学校最高领导是校务委员会，是民主的，校长那怕是一个傀儡也不要紧，无领导、无組織、无紀律的帽子实际上是扣不上的。

肃反問題等都是从人事制度上产生的。人事制度解决了，才能解决这些問題。人事部門做工作的，都是青年的党团员，怎么能审查清几十岁的老教授的历史。以前的經歷，他們还没有出世，怎么能够了解，再加上假积极分子問題，伪造材料問題，越来越弄不清，这次整风是否能够把档案袋子打开，不然材料背到死不能够搞清楚。有人主張这些材料完全廢掉。现在是人民內部的問題，肃反材料不能起作用。我从来不考虑材料問題，不管他們写些什么。通过整风，人事要来次大調整，尤其在大学里，要那些行政人員作什么？人事部門有什么必要。资本主义国家人事部門

也只是考勤工作，同时也有一定的制度規定，印好了的表格，犯怎样的缺点，就記一笔，还要經過自己同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超过资本主义。人事部門应该是年高德劭的老人主持，这是我們关键問題所在。毛主席說反革命是十个指头去掉了九个，还有极少数的，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們不能为少数反革命分子，使六亿人民的人权保障不顧，这不是民主。

教育行政問題，教育部自己肯定了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教育部几乎没有懂得高等教育的人。全国的教育問題，操在几个人的手里是何等的危險。这次整风是一次不流血的、光荣的革命，从1953年苏联专家就看出了問題，曾建議要改变对知識分子的問題，現在是新形势下的革命，这次整风的結果，是大批的調整工作，目前搞大学行政的連大学沒有上过，怎么能够知道管理大学。同时机构龐大，什么处长、科长、秘書，行政干部越多事情越多，用特务的手段对付人是不能解决問題的。所謂野火燒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次要大力精减机构，以調整安排如何来看他的整风成績。

工資改革是个极不合理的事，造成人为的分裂。口头上尊重老教授，做法上压制老教授，高教部是否言不符行。

三、5月25日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 教工分組會議上的发言

整风运动关系党与祖国的前途，我很受感动，今后高等学校应该怎样办？应从根本上全面地来考虑。

第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家爭鳴，百花齐放問題。

就全国而言，民主党派应长存，能不能监督，关键在于民主党派的平等和独立。民主党派代表一定的民主阶层，应有独立地位，我不愿加入民主党派，主要是民主党派現在尾巴主义，沒有独立性，民主党派不主动爭独立，自己要負責任，共产党最民主，不会压抑，民主党派是可以平等的，是可以有自由的，除非是反

革命。

“两百”提得很多，听说1953年苏联专家就曾向中央建议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始终未改起来。唯心主义可以让他讲，禁戏也让他全部开放。听说苏联至今还有保守顽固的教授存在，苏联对专家开明得很，我曾向领导上建议将一两百人的大班分成几个班，大家争鸣，竞赛。

第二，办好高等学校的原则，学术第一。外国各大学行政部门和干部极少，只有学术第一，才有学术自由，才有文化的繁荣。我说学术可以为政治服务，但政治不能迫害学术，但××就不同意此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胜德国就在于学术思想自由。

教授是个制度而不是个人问题。一个人磨练数十年，自然当了教授，尊重教授就是尊重制度，而不是尊重个人。教育学生应采取“导师制”带徒弟。让学生自由思考，但要严格考试，不达标，不能通过。我们现在师生经常不见面，考试时马马虎虎及格，这是误人子弟，我们应该检讨。大学里面应该可以出天才。大学里应该自由争鸣，师生都一样，思想问题不要随便扣上反革命帽子，要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环境，图书设备齐全良善，住食条件俱佳，若干年后自然会生长出大科学家。

师范大学应加强德育——政治思想教育，教育科学也应好好研究，学术研究应重视，师范大学不应办得太大，苏联专家强调不能大于三、四千人，华东师大要扩大到7000人，简直是胡闹，师大而外，应只办师专，快点造就师资人才，其余师院一律不要，省下的钱办综合大学。须继承中世纪的经院制度，学者讲学，田园生活清静而无为。

第三，结合实际，谈几个问题，我来院后放了一炮。不久×院长就說我“你为什么拥护党中央，反对教育部”，我当面承认。他的官僚主义被我的盛气凌人压下去了。教育部无人懂高等教育，我曾去北京请求解决问题，那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这次我还想去北京，参加教育部整风，该部只有几个年轻

的小朋友（党团员），在那里活动，什么也不懂。

校务委员会应成为学校最高领导机关，校长只应是个招牌，其他不应有任何行政机构。校务委员会由教授若干代表组成，此处不必非要教授会，因教授一般不应开会。

黄溥先生在报上说全国多数人主张党委领导高校，我不知道他参加过投票没有，我认为院长是中共派的，他就能贯彻党的政策，一定不能以党代政，抓权。党委主要进行教育，树立好的作风。应提倡学术风气，不能摆官僚架子。办高校有宪法、方针、政策作保证，党尽管放手，不必担心。由校务委员会治校，一切矛盾都可以解决。

在大学中应不存在党群关系，这是党自己搞出来的麻烦，学校学术上有什么领导不领导，只有行政观念看问题，才有领导被领导。

人事制度是个考勤工作，应由注册科、教务处执行。犯罪问题，学生已成人，可对法律负责，犯规则由校务委员会处理。肃反已经过去，历史问题应付之一炬。人事部门应撤销，出了反革命，公安部门来抓人就是了。人事干部年轻党团员多，他们不懂旧社会经历，怎能正确认识老先生的历史问题，把人事工作搞得那么神秘，妨碍思想学术自由。

这次整风，希望将不称职的调走。因为高校是学术机构，不懂学术的不必留恋此地。我们要考验党，对党团员工作调配情况如何，这是整风的结果。什么系三角，四角，一齐把它调出去。贪污浪费也应该查一查，因又过好多年了。建新校舍，花了好多钱，连×副院长都不知道，其他的人也不敢过问。学校应建立预算、检查制度。

工资问题麻烦，去年×副院长说“打了个大胜仗”，我说打了个大败仗。副教授与教授的级别拉的那么长，这就是压抑老教师。言行不相符，使大家成天比级别，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是非问题。

总之所述，三大主义俱在。

附带说明：1. 纪念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有很重大意义，但我校临时撤销，代之以解放台湾的报告，这是公开违反政策。

2.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批评与斗争，在毛主席报告中都存在着提法的分歧，应加解释。

3. 三大主义主要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教条主义是主要的，不应三者并列，而且漏掉教条主义。

4. 赞成增设地理系。

四、6月12日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工

鸣放大会上的发言

最近几天来看到“人民日报”社论，我有点意见。文章很好，但与平时党的作风不大适合，有点欠冷静，欠理智。本来过去我是喜欢读社论的，几乎每篇都读，但对这几篇却就不太喜欢。

即使有少数人说了一些不通气的話，于是说工人说话了，拿起棍子来。谁敢造反呢？可能有少数人有这种想法，这对党也有好处，敲起了警钟。

那几位先生的話。葛佩琦的話很滑稽。有个人意气。話过火，可批评，但杀鸡焉用牛刀？储安平的話有些失敬，当然不好。这是宪法問題。楊玉清的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价值。章乃器的話有問題。說法有文章，不應該。但在学理上可研究。資本定息究竟是不是剝削，要肯定。资产阶级的学說認為：剩余价值、利息是保証資本本身价值，不是剝削。“剝削”这个詞的学理是馬克思主义的最大武器，可宣傳，但在科学上不可以此作政治宣傳。在經濟学上有人批评过馬克思的“資本論”。剩余价值之公式，据说馬克思一直未研究出来，因此未得出結論。

社論說明民主空气很差，人类民主、进步是发展的。社会主义应更进步。应超过資本主义，这就是优越性。

我在英国經常到議會去旁听。鮑尔温就因“民主問題”在国会受到質問和辱罵。艾登为香港問題也受过窘。民主形式是有的，当然實質有問題。但有其风度。

我們应学习資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风度，何况整风是从团結愿望出发。（他接着講了一个故事，似乎是諷刺社会主义的——记录者补注）

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規律，为大家所有，不是某些人所能包办的，在英国美国也有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是社会的渣滓，应该唾弃，也不足为奇，但不能把思想問題看得过于严重，只要它的影响不严重。

今后唯一的問題是发揮群众的积极性，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积了40年經驗，欧洲一个政党的形成也要四、五十年。6亿人民的中国要花很大努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問題很大，要爭鳴，为偉大目标前进。

×××、×××昨天表明态度很英明，大概看到了副作用。

* * *

关于肃反問題，1953年苏联曾建議中国注意知識分子問題，但不知道到1955年为什么还要搞肃反？副作用不小。事过无法。今后不要以思想問題来怀疑人，不然，就是斯大林錯誤的繼續。

今天階級已根本不存在，但階級异已分子存在。要防止別人鑽空子。

反复整人是使人思想疲劳，太殘酷。在20世紀的今天要加以譴責！这很令人气愤！这是历史污点！把知識分子当地主来斗太粗暴。把反革命分子定为5%的比例，令人稀奇，我听了汗流夹背。把社会搞得个六亲不認。三大主义到肃反时发展到极点，近于拿破崙第三专政。

有些思想工作又作得不好，为什么取消紀念孙中山？政治必須結合业务，絕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党单搞政治是不务正业。古人說：“本立而道生。”

* * *

工資問題。這次調整應從積極意義來考慮。這是核心問題。我主張從寬，沒有萬分必要，不再降低，必須提高，一定要提高。過去我估計到這種工資辦法一定要失敗。世界各國是根據年資，今天我國要根據“德才”，“才”根據何在？評等級是自制分裂，這糟透了！糊塗至此！教授與副教授相差這遠，必然天下混亂，差錯百出，應根據年資升級，大刀闊斧的干，錯了再糾。全國只有3000個教授和副教授。加點錢又幾何？而軍隊幾多？工資幾多？為什麼要死扣住知識分子呢？毛主席他們的錢少，很感動人，真是社會主義者，偉大。這是他們不要，我們不能與他們比，他們是主席，總理。普通人的覺悟沒有那樣高。一個普通的泥瓦工人都拿100多元一個月，與我們比太不合理。以前我當助教拿120光洋，值人民幣幾百。今天拿一百多人民幣連牛奶費都支不起，必須趕快調整。

牛奶工人不給我牛奶（一個多月），我起碼輕了五磅，三位首長不能解決，總務處的威風之大可想而知。第一次大戰時，德國的一位教授到城里去討牛奶吃，今天在中國又發生了這種類似情況。

廖若平的右派言論

(按：这个材料系根据武汉师专整理材料选編的)

(1) 反对党的领导，企图取消党委制

1. 誣蔑党在整风期間迷迷糊糊，沒有力量。廖若平曾說过：“党的整风，主要是整党，在整风运动中，党员是被告，整风期間，党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是‘当局者迷’，因此，整风主要靠民主党派积极主动的行动起来。我們民盟今后要单独开会，由盟来独立的召开各种座談会，很有作用。”又說：“党在整风中被动是合乎規律的，党在整风中是迷糊不清的。党这次整风，是因为党内无力量，要借群众的压力来整风。”还在民盟盟員中传达省盟右派分子的指示說：“我們这样做是代表党执行党的政策。”

2. 強調知識分子与党的矛盾。廖若平对戴望峰說：“高等学校存在的問題很多，高級知識分子与党的矛盾大，高等学校現行制度（指党委制），必須有所改变。毛主席已經要民盟与九三学社草拟方案交中央討論，我昨天亲自听了汇报（廖在省盟召开的干部会上所听的汇报）知識分子和党的矛盾問題，不仅高等学校有，中、小学也普遍存在，而且矛盾很突出，也很尖銳。”又对高維岳等說：“××××学院在鳴放中省委派了干部去領導，結果大家哭喪着臉，象祭祀死人一样，什么話不講就散会。”說党領導的教育事业还不如国民党統治时期，廖若平对徐淦說：“在国民党統治时期，有錢、有人、有房屋才办学校，現在不同了，沒錢、沒人、沒房子，是以革命手段来办学校，这样怎能办好学校呢？”

3. 挑撥盟組織与党的关系。据張克栋揭发，廖若平在民盟內

部說：“黨對民盟是不重視的，事先不與民盟研究，一些事情僅是拿來貫徹。”對民盟支委李金聲說：“學委會主委副主委沒有民主黨派負責人。”意思是說黨包辦學委會，沒有讓民盟去領導。他提議增加學委名額，多吸收中年和青年教師參加，企圖改變學委成分，以達到篡奪領導權的目的。

4. 打擊學校黨委、領導，誣蔑學校黨委、領導是“外行”“不務正業”。廖若平對戴望峰等說：“我們學校領導力量真是不強，×書記是搞銀行的，×校長文化水平很低，×××校長有大專學校經驗，但他又不管事，只養下×副校長，但他是學工科的，不是學文科的，也只辦過中等學校，實行兩級制，他既不抓業務，也抓不到業務。大會，小會，里里外外，忙於開會，叫做不務正業。”又對徐淦說：“在大專學校工作是不簡單的，沒有搞過大專學校的經驗，就不會办好大專學校，我們學校除了文史兩科調來的教學人員外，可說都是外行，這樣怎能办好一个大專學校呢！學校領導一天到晚只知道開會，脫離教學，上上下下，不務正業，樓上樓下都是外行。”

（2）誣蔑黨的肅反政策

廖若平在湖北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肅反中最大的偏差不是個別人受到打擊、委屈，而最大影響是人的關係搞壞了。生產關係是基本的，但還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自然關係，使我們生活豐富起來，有人情味，人情搞壞了。對敵人要大義滅親，但滅親不一定都大義。”

（3）支持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右派頭子的言論

廖若平對高維岳說：“華中工學院民主黨派聯合會對儲安平黨天下的言論發表了同情、支持的公告，很好！很有力！”又對李金聲說：“李維漢部長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各民主黨派人士提的意見，有很大一部分是錯誤的，還待研究（指章、羅、儲等的

右派，反动言論），既然还有待研究，就是还没有研究罗，那么，怎么下‘是錯誤的’結論呢？”6月15日省盟开了一次扩大省委会議，这时“人民日报”社論已經发表了，会上批判了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論，廖若平却为他們打掩护說：“这显然是小資产階級思想的暴露，小資产階級思想要改造。”

附：廖若平的历史簡介

廖若平湖南长沙人，現年52岁。出身于資产階級家庭。父亲是长沙有名的大盛綢布庄的經理。廖于1924—1927年間在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从1928到1937这十年中間，他除了在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和长沙私立协均中学任教以外，还做过远东电影院經理，給电影院画大广告，負責宣傳和选片等工作。在1938年到1945年之間，他到过沅陵、衡阳、昆明、重庆等地。在沅陵，仍搞电影院；在衡阳和朋友一道，开过布力士鞋作坊；在昆明，他一家还做过藥棉紗布生意，做过衬衣买卖；在重庆，当过私立大公职业学校教員。1946年由重庆复員到上海。在上海时，他教書是正业，做影片經紀是副业，沒事在三馬路万沅湘綉庄（他家有股本）打牌。

从以上經歷可以看出廖若平在解放前虽然也教过書，但教書对他來說只是幌子而已，其实他从事商业活动許多年来从未間断过。由于他出身資产階級家庭，加上长期以来經營商业，因此，資产階級一套买空卖空，投机詐騙的技倆，在他身上表現得相当突出。

解放以后，經戴望峰介紹到湖北教育学院戏剧科当教員。不久又調进湖北教师进修学院任語文科主任，进修学院改成师专后，廖繼續任語文科主任。

1951年10月廖在教育学院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先后担任民盟区分部主委，湖北省支部委員，省政協委員，省文联委員。1956年又当选为汉桥区人民代表。

廖若平不学无术，在評定副教授学銜时，遭到群众否决，他

于是迁怒于党，說党对他的支持不够。去年評薪时，起初他被評为七級，不滿情緒更大。右派头子馬哲民曾亲自出面为他的薪資提級問題奔走营謀，廖于是对馬感恩，而对党愈加仇視。这次在大鳴大放中，他忠实地执行馬哲民的指示，在武汉师专燃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火，从廖若平的階級出身，思想意識各方面来看，可以說不是偶然的。

王一鳴的右派言論

編者按：王一鳴系民主建國會會員，武漢市工商聯主任委員，武漢市人民委員會副市長。這個材料，是武漢市委整風辦公室根據他在“鳴放”中所散布的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摘要選編的。

民主建國會會員，市工商聯主任委員，
武漢市人民委員會副市長王一鳴的言論

(1) 对“鳴”“放”及整風的看法：

“鳴”“放”得好或者不好的問題，關鍵不在黨外人士，而在于共產黨員愿不愿撤除障礙。而且不僅只在于態度和鼓勵，更要緊的是黨員大膽直率地提出幾件事來，說明這件事由于自己處理不當，造成了多大損失。這就不是一般地動員，而是真正的接受意見。

(在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5月22日“長江日報”)

(2) 黨的領導問題：

(1) 要求確定工商業的方針，計劃提出來要和工商界研究商量。因為工商業的事只有工商界知道得多，不和工商聯商量是吃力不討好的。

(5月22日“長江日報”)

(2) 共產黨員對工商業者不放手，喜歡代辦，如學習問題，教材、教師、教學時間都有問題，請領導幹部來講，時間上不一

定配合得上，有的語言不通，講的內容理論多實際少，不如組織一個講師團，訓練工商業者自己去講。還有些共產黨員主意已定了，却客氣一番，叫你提意見，提得不合意便說“考慮考慮”，直到意見和他的一致才點頭。黨員不點頭，事情就執行不通。如“武漢工商”講了一、二年不能出版，×部長一點頭，很快就出了。各局中層幹部到了工商聯都有“上方寶劍”個個“齊天大聖”，見官高一級。工商業者是劣等民族，他布置的會你得去主持，照他的意圖開會，處理問題。我要求取消各局的“上方寶劍”。有任務，市委、市人委同各局訂一個對工商界的方案，交工商界自己安排。

共產黨員有的把政治思想領導同官僚架子混同起來。如有一次統戰部打電話給陳經老，說明日有會找那幾個人來參加。問他是什麼事，卻不知道。我覺得假定是同其他方面無關的事可否就到陳經老家中去，我親自到統戰部去過，結果沒有這樣做，七十七歲的陳經老還是上衙門，我在這一點上搞不通，同×書記談了，×書記說這是不對的，但是對統戰部講了沒有呢？我不知道，我在思想上還沒有解決問題，因為對事情沒起到實際的作用。

（5月22日“長江日報”）

我在市人委會是有權的，但是由自己爭取的多，由黨員市長支配的少。因之推到局、到專業公司去，不主動的，就不能有權。

統戰部沒有統戰化而是衙門化，開會形式化，講話訓話化，公式化。搞統戰工作不到群眾中去，不敢下染缸去考驗，不到群眾中去如何搞得好的？儘管馬列主義讀得爛熟並不等於搞好了統戰工作。要和群眾打成一片然後在你思想的影響下不知不覺地同你“化”，這樣才打一百分。現在沒有做到。統戰有時管得太寬，不該管到內部去。如既濟水電公司董事會對於互助金作了決議，統戰部有意見，“八辦”去一個通知，說准代收，人家的決議就不作算。

工商界對“長江日報”大不滿意，是不是地方報可以不注意工商界的問題？工商界違法的事件同意大事宣傳，一般消息也應有相

当的篇幅。工商联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答应工商界的请求，给予了“两方寸”的地位。这是领导上的思想问题。是不是在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看工商界呢？请问他们对资方改造作了些什么工作？

(5月22日“长江日报”)

(3)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1) 资产阶级是否有两面性？

他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是有两面性。但是他说：“对于大企业中的工商业者有必要引导认识两面性，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便不必强求都承认两面性这个名词”。

他说：“我的看法不同于章乃器的观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存在着两面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否认不了的。不提两面性对工商业者没有好处。但是也不同意千家驹的那种看法，认为阶级存在、定息存在便是两面性存在的根据。不拿定息，有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的人也不可以说他是工人阶级。”

(2) 什么是两面性呢？

什么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性”与“消极性”呢？他认为一般是依靠资本加上剥削或者加上劳动来赚钱，赚了钱又想再赚更多的钱，这就是个带有普遍性的“性”。不是偶然的事物才可称为“性”。现在的工商业者做了许多事情合乎社会主义的企图，就是积极的一面。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行动就是消极的一面。他说，有些工商业者由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经济改组，工作对自己没有直接的利益，表现在工作上有的劲头不大，有的没有当家作主的观念，这就是“消极”的现象；由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物价管理上松弛一点，有些人便在自由市场上乘机乱价抬价，以劣充优，这也是消极行为的表现。两面性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身上一般都有，只是比重上不同。正好象大胡椒是辣的，四川的海椒比广东的青椒虽然辣得厉害一些，但辣性都是相同的。

(3) 有些人为什么不承认两面性？

他認為是這樣：一般大企業的資方否認兩面性的很少，但也不能肯定他們在思想上都完全想通了。倒是一些中、小戶工商業者多數不願意承認兩面性。他們不承認的原因大致有三個：第一是把“兩面性”同“資本家”等同起來，承認有“兩面性”就等於承認自己是“資本家”；而自己資本少，不能算資本家；不算“資本家”便沒有兩面性；第二是工人沒有兩面性，因為他們是勞動者。我們現在也在勞動，或者剝削很少，同工人差不多，也應該沒有兩面性；第三是同工人、幹部比工資收入、比勞動時間，好象也都差不多。工人幹部既然沒有兩面性為什麼我們又有？

因為這樣，所以他主張對大企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可以強調兩面性的問題，有利於對他們的改造。對於中、小工商業者，只要從實際出發，指點他們應該發揮那些好的方面，不應該做那些不好的事；讓積極的一面自然發展，消極的一面逐漸消除掉。不必非要都承認有兩面性這個名詞不可。

（對“長江日報”記者的談話，5月30日“長江日報”）

（4）企業內的公私關係：

還有些共產黨員充內行。下到企業不幾天，還沒有實際動手，就發號施令。發生了許多不恰當的處理，失去了威信。因為是黨員，別人不好還價；有時還了價，也不相信。因之要求黨員加強技術和業務上的學習。 （5月22日“長江日報”）

請問（編者按：這是記者問）他是贊同公方代表撤出企業呢還是不可以撤出？

他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這要分做幾種情況來談。他說，有的企業原來沒有公方代表，生產情況搞得也好，又沒有適當的幹部可派，就不必派；還有些企業公方代表和私方代表人員相處得不好，最好能調動一下。隨後他又補充了一句，有公方代表的地方一般的工作是好得多。（5月30日“長江日報”）

(4) 王一鳴亲自起草的武汉市工商联的工作方案：

工商界当前情况的分析和今后工作的意見

长江日报編者按：这是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員王一鳴亲自起草的工商联的工作方案，这里面充滿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触情緒和对党、政府的恶毒的誣蔑。为了使讀者共同来分析研究，特全文发表。为了保持他的原状，其中文字、語气一律未作修改。

工商业者的思想动态

(公私合营前就不分析了)在公私合营前夕，有劳資关系的苦不堪言，听到可以批准公私合营連夜填写申請書，兴趣是十分高的。至于合营后如何都沒有計劃。沒有劳資关系的小商販也为走到社会主义而十分的高兴，为公私合营商店、厂的发展所鼓舞，也是兴高采烈的。只有极其少的一部分頑固分子，或者技术高一等，利潤十分大的不愿意，这只占千分之几，不能概括說工商业者留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經營是被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压倒，是大势所趋，形成合营的高潮。合营以后来一个人事安排問題就发生了。

在解放几年以来，大企业的資方对生活方式大大的改变了，腐化的条件也沒有了，形成了正經人。安排在政府机构待遇可以滿足今天的花銷，而且少担一些心事。拥护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要求发展其所长，但是不給他的权少干一些事，只是不滿足沒有其他的心理。有講話的机会就要講，要求权的愿望不强烈。政府的政策了解得很清楚，不得已混就混。

走合作社的更高兴，脱离了資产阶级的范围十分痛快，业务正常的，工資收入有增加的，認為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由于干部的功利之心太重，对社員抓得太紧，失去了克服可能的可能，或者是同来入社的待遇減得太多，因之要单干；又由于合营后对于零星的协作沒有照顧，因之单干有可乘之机，这不能算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在待遇上生活的要求。这些单干户在总的主

流中只是曇花一現，將隨協作關係正常而消滅，他們決不可能形成一個資本家，穿兩套新衣服，上上館子如是而已，對經濟上不能起到什麼影響。管理的好很快就正常了，管理得不得法拖長一點。

在中型企業的，工作大半沒有脫離企業，仍然同職工面對面，有職有權職工橫眼睛，有職無權難過，有職無權在另一方面怕位置不穩當，對於工作權的要求是強烈的。公方代表水平高的業務熟悉的比較好處；業務不熟悉對於他們懷疑的不好處。工作安排不恰當，當下一等的人來差使是不滿意了。尤其本企業的職工，提到領導層關係更不好處，（不是全部的）。公方代表業務不熟悉，又不虛心，在工作上造成了損失，這就大大的不滿了。這層私方人員中部分的有的在合營後就想跳槽，馬上來一個轉變，變為工人階級。三年很勉強，七年不高興，但是他們有理解能力，也有一定的耐性，作報告就可以解決問題。這一方面的問題不大。而複雜的情況這層是多的，而在私方人員中他們的影響帶有中心性，對於他們的安定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他的力量發揮起來，大於經濟力的若干倍。在合營初期存在許多幻想，勁頭很大，半公家人的興趣也高，由於事情的發展許多不如理想，勁頭逐步的退落，不起勁也有屬於本質一方面的。

一般說來工商業者中什麼人最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呢？小商小販。小商小販合營是十分高興的，貨源有靠，生活一般不壞，只是他們在“五反”中受了一些屈。念念不忘。總以為我也是工人階級為快。這種願望不能十分批判他，對兩面性的承認抵觸很大，而抵觸的原因不外：第一無論任何人說兩面性總是強調消極性，而且擴大事實，兩面性說成消極破壞性，因此他不能承認，同時他們對提出優點時當公式，聽過了，在講缺點的時候就不入耳；第二，把兩面性同資本家混為一談；第三，同勞動所得，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同工人比較，教條主義者在這方面是十分愚笨的，不會利用爭取多數教育少數的方法。例如在攤販市場管理上不要

他們插手，所發生不只是他們不管的問題，而且發生副作用。對定息是十分厭惡的，李康年提出二十年大罵混蛋。

在公私合營的時候，合營的條件是成熟了，而政府的準備太差，幹部沒有訓練，而且有許多幹部在執行上暴露了缺點。在自由市場一開放，加重了他們的負擔，更是手忙腳亂，這些新事物的到來估計不足，這一筆賬沒有地方寫，糊里糊塗的寫一些在工商業者身上，這是他們不服氣的。

在無崗位的、學習又不多的資本家，三年是惶恐的，七年是毛主席的恩惠，拖個尾巴更好，二十年心中也有點動，理解是不可能。

現在發生一些什麼問題呢？

（這些都是個別情況的綜合）黨團對私方人員的態度私方人員不滿意；偏聽偏信，受了損失就喊起來，對跑龍套不滿意；誇張過火不滿意；對過去處理不平等不滿意；表揚不平等不滿意；敵對的對待不滿意；不協商不滿意；工作上不支持不滿意；另一等的差使不滿意；欽差大臣的態度不滿意。

另一方面看不起公方代表。主動把經驗告訴公方代表的不多，工作上看笑話，不負責任，怠工，比能力，比待遇。

以劣充優，在自由市場抬價，搶購原料。在職權上主動爭取的少，听候安排的多，不負責任的也有。

這一方面同資產階級的性質有密切的關係。

對於公方代表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的支持，這是私方人員所辦不到的一件事。業務上希望交有經驗的來搞；希望更換不能勝任的公方代表；未派公方代表的工作還不壞的不一定派公方代表。

政府對國營同公私合營對合作社應當一視同仁。除去多頭領導，除去三害。

修改階級優越感。用人不能唯政治條件論，應該用人唯賢，用人唯才。

修改對私方人員的安排純由照顧出發的觀點。

現在是解決矛盾運用一切有用的因素，在首長講話中、在報紙上不要製造矛盾。

領導上在未摸清底以前，不要糊里糊塗的布置工作，造成了損失。

私方人員有好有壞，不能一概而論。

要求在法律上平等，不能運用階級的壓力。

局長的講話不要成為訓話式。用無產階級的方式。

應當合併的小廠，還是合併，以免浪費。

不能說：處理私方人員是教育職工的好辦法。

工資的調整要求合理。

對工商聯領導上的意見

綜合為三大作用：收會費、派公債、處理違法戶（代表工商聯要求從嚴處理是公式）。

八面性：阿諛逢迎；巴結奉承；吹牛拍馬；捧上壓下；狐假虎威；張牙舞爪；假公濟私；捧紅踩黑。

注意大的，忽視小的，官僚主義、不深入下層，官味十足，毫無情感，不了解情況，簡單硬派，布置多、檢查少，批評多，幫助少，骨幹分子說對骨幹分子關心不夠，一般工商業者說只關心骨幹，公債的經濟任務越超額政治上的損失更大。

在這次代表大會的發言中提不出自己檢查的屬於自己的缺點方面的，這是個問題，因之也不武斷的作推論（我對“長江日報”上的推論也不能寫上）。

今后的工作方法如何呢？

武漢的工商業不是經濟的利用而是人才的利用。是個不小的隊伍，利用起來力量是很大的。主要矛盾在於：一方面工作的安排適當不適當。這是包括大、中、小的共同矛盾。同時在企业中忙與閑的比較這是令人難過的。

例如：厚老（注：林厚周）為什麼喊得厲害呢？對鄒亞農為什麼可喊呢？不是態度問題，而主要是工作超過了負荷能力。

从物質上和精神上来解决問題。物質上看来是容易些，而不是主要的，精神上才是主要，解决是困难的。同样生产力要允許他尽量发展，其他的問題迎刃而解（我就不再要求权了）。

1. 彻底了解工作安排是否适应放手利用他們的經驗，协商調动工作崗位。或者私方人員調出去，或者干部調出去（利用他們公方代表干什么的矛盾也要解决）。

2. 彻底了解工資情况生活情况。

3. 統計公私共事关系有問題的厂店（不是多数），予以分別解决。

4. 支配社会活动时间，提高社会活动兴趣。

5. 表揚評选先进生产者逐步的平等。

6. 批評不必夸大，处理一律平等。

另一方面：对經濟比重大的，启发他認識消极的一面，推动自我批判，鼓励主动的爭取工作权，貢獻他一切才能。由于有条件，知識比較丰富，有一些技术才能必須在思想上十分通暢，效力是很大的。他們多半安排在高一些的位置，无论如何不能讓他离企业，或者三分之一的時間也好，否則脱离实际，又变成一般的干部。参加企业工作是为了搞好工作。

对于中企业的私方。他們的实践知識丰富，許多是經過艰苦的創造的，他們以前受了不少的大企业的气，对他們的滿足是要紧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多半能够克服困难。批評与鼓励清清楚楚，以誠相見。重視他在工作中他自己提出目标，而他提的目标不会低于他的能力，因之公方代表、工商联予以政治上各方面的支持。至于生活上只要是关心就行，不能够达到他的要求，經過彻底的摊牌他就滿意了，他的积极性就会起来，他們有这一股勁，他們在增产節約上有一套。

在以誠相見中，可以体会到以前对公方代表是有許多敷衍的情况的，公方代表对他們耍手段是最笨的办法。

对于小商小販。有許多毛病，也有許多好的事例。对他們专

从鼓励出发，提出好的事例来加以鼓励是十分必要的。本来他們就不是资本家，在任何講話的場合必須把这一个絕大多数的地位作交代。某些會議不要耽誤他們的時間来开会。就利用他們本身好事例作为学习講座教材，可以保証出勤，組长由他們自己选。交給他們面广的任务他們是可以保証完成的，教条先生少同他們見面。

在小商小販批評不起絲毫作用。由于批評的人不能同他在各方面来比較，他能說、能跑、能吃苦、能耐勞。在工商联領導层一些錯誤或随时发生的不正确的处理，随时提出更正；在代表会中提出的問題，应綜合提出解答在“武汉工商”发表。使工商业者知道領導上感觉到了那些缺点，今后的动向如何。

今天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进步是制度的优越。人的积极性沒有利用，人的积极性充分的發揮，有很大很大的潜力。

在学习方面就要同上面的情况結合起来。

在学习方面对分組应以時間为主要的一項，必須尊重工商业者的业余时间。在教材上面应灵活。在教师方面、宣傳部門、政协掌握中心，交工商联統一布置。各局的要求也把計劃先交宣委会討論，以免打乱。

几年来的宣教工作就沒有头緒，宣傳部、政协委員在檢查总结、支持，工商联的学习不能脱离支持的。

学习的目的是提高爱国主义精神，增加对生产上的兴趣。工商联有推行政策、法令的任务。但必須有系統的布置工作。工商联不能成为各方面的下一級的綜合派出机构，这样的看待它，它并不能发生派出机构的作用。要由各方面来联合支持，使它有一定独立性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今后說来工商联的領導层，对于党領導是有一定認識的，在工作上可以放手。工商联形成一个綜合派出机构，不起作用是一个浪費，工商联一方面同各級的工会发生联系，請他們对工人宣傳贖买的意义，不念旧恶，从今天的效果出发。在另一面教育私方人員如何发揚爱国主义精神，在

增产节约上贡献力量，解决可以解决的实际困难，说明应办而不可能办的原因，分析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用亲切诚恳的态度，和风细雨的说理。

在办法方面：起草一个文件由正副主委讨论，讨论综合以后，再整理，请各区、各业、会内科长以上的干部讨论再付诸实行。为共同掌握的中心。

我们不分析研究，不针对不同的情况来布置工作效果就不大。我们不能满足已经有的效果。而是要消除社会制度同工作方法的矛盾。尽量找出一般的情况，尽量照顾特殊情况，要工作轻快，效果宏大，辛辛苦苦，工商业者没有受到益处，对社会的贡献不大，苦劳不是上策。这是我的偏见，而我提出的意见又是偏见之偏。只先统一原则，然后统一认识。

还有一个今天不谈的问题，我们如何在大企业中插上手，是工商联的一个重大的关键，工商联的苗头就在那一块。

(原载6月23日“长江日报”)

李蕤的右派言論

第一部分：在大鳴大放中到处点火放毒的作品和書信的一部分

編者按：这里选編了李蕤发表在“长江文艺”和“桥”刊上的两篇毒草。“注意脚边的小草”一文，是借处理“談‘鞭打’”这篇文章为题，公开的为毒草辯护，对党的領導、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进行了恶毒的誣蔑和攻击。“談‘嗅覺’”一文，李蕤用了一种异常曲折的笔法，隐藏着要解除党的政治思想武装的企图，此文对党的領導的誣蔑和攻击，更为阴險毒辣。

一、“注意脚边的小草”（見“长江文艺”6月号）

在我們的生活里，存在着許多不够諧調的事，它湮沒在复杂紛紜的生活現象中，往往不能为人所立刻发现。但如果把它抓出来，放在画面上，人們就会觉得不对头，值得認真思索。

譬如，現在要是有一个画家，画这么一幅画：一个大城市里，到处东一簇西一簇人們在开会，大家忙得滿臉流汗，商量着讓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連最高的領導也在洗耳聆听，摄影記者和速記人員也把每人的声音笑貌一一记录下来，熱鬧得象赶大会一样。但是大家脚边却躺着一棵小草，它是被人踩踏得奄奄一息，半死不活。它是誰踩死的？为了什么？她到底是鮮花或是毒草，还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和关心。

这幅画，就在我們的面前。

关于这幅画的前一部分，我就不去說它了。“五一”节后，从上到下，都为“春风不度武胜关”而着急，于是會議就多起来，报館就忙起来，解除一切顧慮呀，要大胆的放，大胆的鳴呀，拆墙呀填沟呀，……大家愉快地忙碌着，在許多座談会上許多人都倒出心底里的話，这种盛况，真有点象胡国瑞先生說的“鶯弄舌、燕爭泥”，它告訴人說，真正的春天就要来到了。如果把這些座談会比作风，这些风可真算得“惠风和暢”，参加会的人，当然也就有“如坐春风”之感，每一个会是一陣春风，十个会就是十陣春风。这些会合到一起，总之可以称之为“催春”、“催花”，武汉既然“春迟”，这样用陣陣的风来“催”使它脚步快一些，这实在是千該万該的事。我自己就是东奔西跑到处参加这些会的人，虽然有些埋头創作的人見面諷刺几句，虽然为这誤了家里的工作，同志們說“你再这样到处开会我們就向你搞大民主”，但我并不失悔，我衷心拥护这些会，感激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听鳴”并“催鳴”的領導同志們。

現在說的是这幅画的另一部分，就是，在大家兴奋熱鬧之际，應該看看我們的身边，替脚边的小草解圍。因为它是一頁書，对于我們認識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有很大的用处。

我說的是刘真的“談鞭打”。

这篇文章，是一篇小小的杂文。在这篇杂文里，作者总共說了这么一点意思：張士貴把薛仁貴的功劳上到自己的帳上，張士貴很可恶，尉迟恭鞭打張士貴是應該的。今天我們的生活里也有張士貴这样的人，需要有更多的尉迟恭。

这样一篇杂文，思想性有多深，艺术性有多高，很难說。但是，它有生存权，总是不容怀疑的吧。第一，誰也不能說張士貴这样的人很好，新社会應該提倡。第二，我們的社會，确有不少的張士貴，如果說压根一个都沒有了，所有的干部都是百分之百的馬列主义者了，那么，整风、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就是无的放矢了。不論这文章的水平高低，总得承認作者說

的是好話，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好話。

但是，这棵小草，却遭受了非常坎坷的命运。

这篇稿子投在“湖北日报”，文艺組是主張发表的，但报社更高一級的領導却判了它的死刑。构成死刑的罪状多得很，据說計有：1.湖北省全省丰收，这篇文章里竟說到某区委领导下减产。2.全省农村干部，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省里領導正向农村干部致敬，而本文竟把区委干部比为張士貴。3.推广粳稻，是上面决定的，不能由区委負責。4.根据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論：“哲学上共同事物才可以对比，不同事物不能对比”，“区委”和“張士貴”不是一个事物，放在一起比喻是严重錯誤的。5.区委書記是党的領導，批評区委，就是批評省委，就是对党不滿……。仅仅这五条，真已經可謂“五花大綁”了。

自然，如果仅仅不用，倒也沒有什么。任何一个报刊，都有选择取舍的自由，問題在于这样的罪名恰不恰当。据說，为这么一篇文章，还联系到作者的思想問題（她对农村的看法），联系到支持这一篇文章的編輯。特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这篇文章被判为“有原則性的錯誤”，成为“整风”中的教材，这当然就使支持这篇文章的人，也陷入沉重的压力之中。

从毛主席亲身为王蒙的“組織部新来的青年人”解圍后，这棵小草和支持它生存的人，命运有些改观。但据說，領導是这样講的：“这篇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时不发也是对的，現在看么，扣的紧了一些，現在看也可以发出来批判么。”这就是說，一定要挖苗絕根的兴趣是沒有了，表示要对这小草“大赦”了，但它还是个“待罪之身”。至于拿紅笔判它死刑的人呢？“当时也是对的”，“現在”当然更“对”得很了。

那么，从这篇文章的处理过程中，我們的領導同志，到底接受了些什么呢？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能分析这篇文章的本身。但是，它的命运确实使人联想到很多問題。那就是某些領導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

对文艺性能任务的理解的問題。在他們看来，整个农村干部既然好得很，那么就不許批評一个具体干部有張士貴作风；在他們看来，上級决定向干部致敬的时候，連小說、雜文、詩歌此刻都一定得一律脫帽致敬，好象吹东风的时候每一棵小草都必須頭向西才行，正象孔夫子說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而在我看来，这种想法，便是主观主义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它要复杂得多，全省农村干部好得很是事实，有个別干部有張士貴作风又是事实，从政治观点出发此时此刻需要向全体干部致敬是正确的，从作家接触生活感触到某些区委的作风需要鞭打同样應該被容許。总的說来，都圍繞着一个崇高的目的，那就是歌頌新生的事物，揭露腐敗的事物，有时步調完全一致，有时殊途同归。用个庸俗的比喻，同是为首长服务，司机在首长出門的时候開車，而炊事員却在飯厅做飯，打蒼蠅，如果忽視其各有职守，硬讓炊事員，司机，保姆在同一时刻作同一的活計，只会使大家瞠目結舌。在“瞠目結舌”中侈談“齐放”与“爭鳴”，那可真是“緣木求魚”了。

毛主席在宣傳工作會議上告訴大家，真正使他想到要召开一次宣傳工作會議的，还是看到北京“圍剿”王蒙的事。在几次會議中，他鮮明地表示了对陈其通、馬寒冰文章的态度。这样就通过具体和个别，使人認識到一般性的真理，照亮了人的思想，打开了人們的顧慮。因此，座談会是要开的，問題都翻出来是必要的，但必需进一步，从已經揭发的事例中，找出教条主义的附着点。否則，如果长期停止在鑼鼓喧天的熱鬧上，上上下下，都异口同声斥責教条主义，但是說來說去，教条主义的尘埃誰身上也沒有，那样終有一天大家会一齐打呵欠，又在原状上安靜下来的。

我热情欢迎“催春”“催花”的鑼鼓声，爆竹声，愉快的笑声，但在这声音中我要发出一声呼喊：

“注意我們脚旁的小草！”

二、“談‘嗅覺’”（見“橋”第3期，華弓是他的化名）

人有嗅覺，不僅很重要，而且着實很幸福。靠着它，人不僅能辨別出香和臭的不同，而且它能使你在同是香味中，又辨別出桂花的香、玫瑰花的香、香油的香各自的不同；臭水的臭，鮑魚之肆的臭，臭豆腐的臭也不一模一樣。如果一個人是天生的“聾鼻子”，穿過桂花林和行經大糞場都一樣，其痛苦、乏味實有不堪設想者。

在紛紜複雜的生活現象中，也一樣。如果一個人對生活沒有嗅覺，聽到的話，看到的事，遇到的爭論，對於自己都不過是過眼雲煙，嗅不到這樣或那樣的气息，那樣活着，和沒有活也差不很多。

而在政治鬥爭中，所謂“政治嗅覺”，就更重要。在尖銳複雜的鬥爭中，不少並非“聾鼻子”的人，也往往會患“傷風感冒”，被敵人攻入陣地，在文藝戰綫上，思想戰綫上，這樣惊心动魄的事例是有過的，不少的。

嗅覺，它是生活中尖銳的哨兵。正如人不能沒有鼻子一樣，戰鬥中不能沒有哨兵。邊防的哨兵靜夜守衛，一片落葉，一聲鳥叫，他都要全部神經緊張起來，因為他面對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落葉、鳥叫的背后，往往確實就有“敵情”。

然而，僅僅憑嗅覺，是不夠的，再靈的鼻子，還得有眼睛來幫忙，否則便會鬧笑話，甚或出亂子。

過去，我曾碰到過這樣一件真事：一位老詩人，他經常在靜夜聽到有輕微的“突……突突……”的聲音，他初而疑，繼而斷定，必是附近有敵人的電台了。他深夜冒着風雪，報告了公安人員（這老詩人的精神多麼可敬！），公安人員漏夜趕來，听听、問問、觀察觀察……，最後，笑着說：“老先生，特務在這裡吧？”抓住他桌上的熱水瓶。原來那“突……突突……”的響聲，是從熱水瓶里發

出的。他屋里每夜有一瓶热水，也就每夜听到这响声。

再說一遍，我敬重这老詩人，他的政治責任感是感动人的。可是，如果他再加上細致观察、分析，难道不更好嗎？

自然，上述的例子，对象是热水瓶，只鬧了个“笑話”，还无关宏旨。仅凭“嗅觉”，“出乱子”的事也是有的，象画家梁永太、柯华两同志的遇难，就是令人痛心的事。他們原本可以活下来，替国家做很多事情的。

这說明，在严峻的敌我斗争中，只凭嗅觉，也是大大不行的。而在处理人民内部問題上，在学术討論中，如果只靠嗅觉，对自己的嗅觉过分信任，那样，它的有害成分，便会大大增加。

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上，在对待学术討論的問題上，我建議，應該把全身甲冑、荷枪实彈、怒目向前的“嗅觉”，穿上便服，轉业为和藹忠实的傳达。

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特别是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对待学术討論，对待百花齐放和百家爭鳴，却仍然过分信賴自己的嗅觉！

“他問作品能不能揭露官僚主义，問題的本質不在这里，他嘴里問的是这个問題，心里是排斥歌頌光明！”

“他問旧生活能不能写，怎样写？明明白白，他問的是这，心里是排斥写新生活！”

“他提出質量應該提高，誰也不能說不要質量，可是这是問題的表面，他心里是反对普及！”

“政治艺术标准的統一，那还用說，問題不在这里，他提統一，心里是在排斥政治！”

諸如此类，每一問題，只消一“嗅”，就“嗅”出对方心之可“誅”了。既然随便一嗅便嗅到对方“心”之“可誅”，哪里还須思索、分析、討論、爭論呢？因此，他的眼睛、大脑、嘴、鼻，都靠着嗅觉的守卫大睡起来。

其实認真說，这样的“嗅觉”，实际上已經也失其为“嗅觉”了，

因为，嗅觉的存在，本来是由于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事物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气味存在，才需要它来辨别的，现在它既然否定一切异于自己的东西存在，只能嗅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就是最好的气味，一切异于自己的都成为一模一样的“臭”，那和没有鼻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据说，香獐子因为有一个宝贵的肚脐——麝香，因此它总是把鼻子凑到自己的肚脐上，一边嗅一边呼呼地睡眠，遇到危险不能脱身的时候，赶快把肚脐噬掉。“噬脐莫及”的典故，据说就是古人对香獐子的讽刺。可见，香獐子虽然确实有个香的肚脐——名贵的麝香，但是，只认为自己香也是很可怕的。

而人，在复杂的生活里，在探索真理的途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事业中，每个人自己，就很渺小，正象长江里的一个浪花，也许今天在前面，明天又落在后面；也许这件事看对了，那件事却看错了；也许真理九分在你这里，而另外一分却在和你不同意见的对手那里，谁也难说自己的肚脐就恰恰是“麝香”。因此，要齐“放”，要争“鸣”，在大放与大鸣中竞奇斗艳，让芳香、清香、异香……在比较和辨别中出来。而把自己封成“真理的化身”，只凭“嗅觉”便下结论，是非常可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意识，最好是一一直说，使人了了分明，不必先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这话讲得真好，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力的忠告。

前些时，发表的“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陈其通、马寒冰等担忧放和鸣会“天下大乱”的文章，也是过分信任“嗅觉”而产生的。结果证明，“嗅觉”中有不少“错觉”。但是，这些同志拿起笔，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世，毕竟也是参加了争鸣，从辩证的观点看，他们的文章出现，经过批判，客观上对继续“放”和“争”也有不小的贡献，自己看错了，也有就正的机会。这毕竟算“一一直说，使人了了分明”了。因此这并不可怕。而更

可怕的，在于有些居高临下的人只信嗅觉，只靠嗅觉，又不肯写文章，不肯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世，只通过行政命令来下达。“嗅”对了，自己是胜利者；“嗅”错了，自己又没有抛头露面地争，随时一摇身子，又是胜利者，这倒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当然，我丝毫无意贬低“嗅觉”的重要性，劝人变成“龔鼻子”，只是說，讓鼻子裁決一切并解决一切是不行的。鼻子应该成为一个又敏銳又忠实的传达兵，和眼睛、手、嘴一齐活动起来。这对于久已习惯发号施令的人、自以为已经“无产阶级化”的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三、給姚雪垠的两封信

（按：这两封信，是8月13日由姚雪垠亲自交出）

① 5月27日信

雪垠兄：5月25日来信收到。你給黑丁的信，已轉給他。

武汉的“鳴”“放”，勁头不大，“五一”之前，这里基本上是按兵未动，后来默涵同志来了，传达了主席出京游說与对“人民日报”的批評，才开始动起来，但动得有些懶洋洋的，“文匯”将了一軍，称为“春风不度武胜关”这样才开了些会，但也多止于上层几个人，但顧慮也未真正解除。上面是“外热内冷”，群众是“外冷内热”，真正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揭出来，还得有几个闖将。

作协分会，至今还没有召开一次座談会，邀請作家提意見。前几天，已有些青年提出質問，大約这个礼拜要召开几个会。机关的整风，馬上要开始，但是，严格說来，有些走过場的味道，王淑耘学习后便請了病假，前些时韓柏村也被批准要看病，“听鳴”的領導，实即只剩我們的主席一人，而能提出意見的作家，如你如苏鷹学沛，又都在下面，原来根本没有想到把大家請回来。这哪里象个整风的样子？前天大家提出意見，讓王、韓、李都回来参加整风，并建議誠摯的約你和其他不在家的同志回来，还不知

道你能回来一趟不能。

下月，省和武汉市召开宣傳工作會議，市委准备邀你参加，我們希望你能回来看看，发发言。你在“文汇报”写的文章，和在“文艺报”上写的“打开窗子說亮話”都看到了，文章写得很好，但似仍有未尽意。話再“亮”些也无妨，这不是对人而是对事，把矛盾揭发出来，对党的事业有好处。

“长文”辟出一栏，讓作家鳴鳴不平，是完全可以作到的，前些时，編輯部曾跑出去作了好些訪問，但談的多是一般性的拥护放鳴的表态，沒有发，这两期发了些杂文，但还不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你首先給刊物写一篇吧，最好比給“文艺报”上的更坦率一些。

“五一”以后，我也东跑西顛，开了几个座談会，发了一些言，对于武汉市文艺领导的教条主义，压制批評，缺乏学术討論空气，某些党员濫用党的威信，主观随意性的对待文艺問題，作了些揭发。对至今被奉行着的“文艺为生产服务”的庸俗社会学理論，也提出相反的意见。下月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我也准备再談一談。我觉得武汉市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一二个文艺领导干部，自己既不談出，又覺得“朕即党国”，如你所說的“代党立言”，把大家都看成“被改造者”，只有他們是“改造者”。有人指出，他們一身象赵树理小說中三个人物（胡涂涂，常有理，惹不起），这一点如果上級不認識，他們自己不認識，工作便决难有起色。

全国作协的座談会，茅盾的发言我很贊成，今后全国作协也好，分会也好，恐怕应该更多偏重于“学会”性質，作家輪流做工作，而工作主要是組織大家研究、活动，解决作家的共同福利，而不是封定某些人为“领导”，这是改变工作的关键。

吳奚如同志，下星期便搬进分会来，老作家多了，外行的干涉和胡說便会相对的收斂。从这个角度說，我希望你一年仍肯回来几次，大家一道，把这个摊子整理得有头緒些。

你如今“自食其力”，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实在令人羨慕，对于你來說，今天是你思想感情“春暖花开的时候”，有积淤，尽管

傾吐，傾吐完淤積，就一心一意的創作。我目前的處境，心情，都和你不大一樣。一方面，我和你一樣，有一肚子苦水，另一方面，分會的許多問題，自己“廝身”於所謂領導。又不是沒有責任，這種一脚門里一脚門外的苦惱，你是可以想見的。

河南的宗派主義，較之中南，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最近我想向河南的黨委提提意見，我覺得你也不妨談談，只要從幫助黨的事業出發，什麼問題都是可以談的。

盼讀到你的信，盼給刊物寫文章。

握手

梅深●

5月27日

你給黑丁信中對李冰和王淑耘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只是還太簡單了些。整風即要開始，如不能回來，至少也寫封詳細的信對機關批評一下。

② 6月4日信（摘錄）

.....

分會的整風，已經展開，上星期五、六，召開了兩個整天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主要是邀請作協外邊的人，給作協提意見的，會開得不錯，重大的問題，差不多都搬出來了，一向居于統治地位，誰批評就是反黨的×××的“為生產服務”，成為眾矢之的，他的示范作品“揚子江邊”“糧食”受到許多人的指責。頭一天會，王采的發言，首先指出武漢的文藝領導是抹殺文藝特質，以政治口號代替現實主義的，他揭發了從×××到××的宗派主義。當天以江云的發言最為深刻，她率直批評××只看領導眼色，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與勇氣，指出他把“聽話”作為最高的黨性，要求下邊的幹部也以“聽話”為唯一美德，而這種唯唯諾諾，卻正是沒有黨性的表現。應該說，這正打中××的痛處，因為在他看來，他的缺點，正是黨性太強、原則性太強才產生的。

● 梅深即李義。

这两天的会，大家对于动机不純，虛报成績的“培养新生力量”作了有力的揭发。大家都为沒有很好的团结老作家，特别是对你和老田的冷淡，表示憤慨。你可翻讀一下“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从总的方面談，文艺界已經解冻了。

机关里，今日起开始进入整风。领导和群众的冷热，恰好是鮮明的对比。……整风之前，老韓、王淑耘，紛紛“抱病不去”，更引起群众的不滿，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前天党組才作出决定，把他們拖来。这一次大家（群众）决心很大，但是几个党员领导同志，却还有些“奉命整风”“公事公办”的味道，而沒有認識这是党发动的广大群众支援的对他們的改造运动。这当然也很自然，他們从来就是以“改造者”自居的。

.....

我完全同意你繼“打开窗戶說亮話”之后，再写文章，不妨結合更具体的問題，揭露一下那些人的嘴臉。更欢迎你把这文章寄到“长江文艺”来。你不必有任何顧慮，从現在看，你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过于尖銳而是太温和了。可是，官僚主义病入膏肓，不用猛藥，是难以奏效的。

最近，在群众的感染与教育下，我也准备卷卷袖子，扫掉身上的暮气，写些文章参加战斗。

你能回来么？如能回来，便太好了。

第二部分：在大鳴大放中各次座談会上的发言

一、4月間在“长江文艺”編輯部小整风會議上的一次发言

我認为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勇气还是主要的，但也要有环境、勇气、规划、安排和条件，毛主席說党内90%的人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抵触，可見这問題还是严重的。

“江淮文学”上发表了陈登科的“爰”后，宣傳部长、組織部长，都找陈登科談話，陈登科做三次檢討还过不了关。又不讓陈去北京参加會議，而“江淮文学”編輯部却因为发了这篇稿件領導上追查每个編輯的历史。四川“紅岩”圍攻“草木篇”，武汉也并不是“晴朗的天”。

我內方外圓，与編輯部的同志思想尙可見面，与黑丁尽量避免接触思想尤其文艺思想的不統一。特別到北京去开会思想不統一，但他还要尽量說服我甚至一直到下两点。有时我甚至想全盘托出，赤裸裸地談出来，那怕談翻了做到思想見面后，通过思想批判做到真正的一致。但左右顧慮还是压抑下去了，結果到年終檢查时，就撞車啦。

在領導工作上我是不被重視的，淑耘公开說，只要黑丁、俞林同意，李蕤通不通都无关紧要。因此我对工作不大抓。

二、在4月30日“长江日报”邀請的部分学术、工程、文化界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

(見5月4日“长江日报”)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象一陣温暖的春风和及时的春雨，全国各地，卷起“繼續放”、“繼續鳴”的热潮。人們期待着这陣春风雨，也迅速吹到武汉来。由于盼望的殷切，于是就有人埋怨脚步太慢了，甚且有的人叹息着說：“春风不渡武胜关！”

要說“春风不渡武胜关”，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春风早已到了江南，去年陆定一同志的文章，就是一陣春风，在这春风吹拂下，許多多年輟笔的老作家又拿起武器，自己深心里感到是“枯树逢春”。許多重大的文艺理論問題，也掀起了討論的热潮。在創作上，題材千篇一律，主題狹隘單調的現象开始有了改变，題材主題漸漸广闊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也漸漸出現了。

但是，为什么人們会感到“春风不渡武胜关”呢？这就是說，“乍暖还寒”的低气压还是有的，不利于“繼續放”、“繼續鳴”的无形障碍还是有的，天气还不是万里无云，还不是风和日丽，人們心上还籠罩着一层虽然很薄但却驅散不开的湿霧。

陈其通等四人怕天下大乱，要“压住陣脚”的文章，圍剿“組織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由于“草木篇”对“星星”月刊大張撻伐的文章，……虽然炮火已經停歇，但是，它留下的火藥气息，还没有完全消散。而这些，显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作为思想說，这些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尽管这一思想表現出来的形式不同，但它却同样是“百花齐放”中的一陣霜冻，百鳥啾啾中的一陣枪声。在这一时期，有些人就为了“怕头上落下七頂帽子”忧心忡忡，有人为写过一篇理論探討文章担心到自己的下場。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发出“但愿春常在”的疑虑，也是并不奇怪的。

因此，要貫徹“大放”、“大鳴”，我觉得首先是扫除妨碍放和鳴的消极因素，創造春光融融的环境。

要創造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关键在于領導。第一个是，真正認識现实情况的变化，階級情况的变化，思想上轉过弯子来。而这弯子并不是那么容易轉的。有人提出“放社会主义之花，爭馬列主义之鳴”，“力爭鮮花，避免毒草”，表面看来，是何等正确，但經過批評之后，才明白这說法本身就是“毒草”。因为說來說去，仍是一家独放，一家独爭，而今天的“放”和“鳴”却远远比这寬闊，就是除了反动思想以外，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都容許放，在放中競賽、分析、批評。而仅仅这一点，許多人的思想便轉不过弯子来，但是不准自己認為不健康的東西露头，不准許它出現，又如何算是“齐放”呢？又如何能細致加以分析呢？如何保証不把本是香花的東西誤認為“毒草”鏟掉呢？第二，就是要从思想上，和大家站在一个平等的立脚点上，面对真理，这也并不容易，許多同志，特別是位居領導，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同志，往往不是站在群众的中間，而是自以为凌駕于別人之上，把自己看成“改造者”，

別人看成“被改造者”。把自己預先封為“無產階級戰士”，把和自己看法不一致的看為“思想有問題”，這思想如果不扭轉，就很可能考慮到在爭鳴中自己也有和別人互相滲透、互相借鑑的好處。魯迅曾說：“自己到底是什麼思想，什麼意識，最好一一說出，使人了了分明，不要先指着自己的鼻子說，唯我是無產階級。”這話很深刻，在今天，就特別重要。最近在各地的討論中，許多人都提出“拆牆留綫”的口號，我是十分贊成的，因為“牆”對牆里牆外的人，都沒有好處，而綫（是非的綫，真理的綫）如果成為大家共同注意的目標，那就會促使大家細致地探索、研究。誰也不甘心把自己停滯在綫外。

當然，以上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同時，更重要的，還須要我們每一個人有信心、有勇氣。信心和勇氣，也不是凭空產生的。它產生於對現實的認識，對藝術工作者的時代責任感。一個真正的作家、真正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是沒有什麼可以使自己恐懼的，一切的猶豫和顧慮，多半由於我們自己心裡沒有“底”。認識不清，自然稍有風吹草動，就惶惶不安。因此，在目前，認真的考慮一下，我們藝術工作上的許多問題，對每一個藝術工作者都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三、5月11日在湖北省文聯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談‘鞭打’歷險記”很有趣，說明藝術中的許多根本問題在武漢並不是解決得很好，如藝術的性質、藝術與政治的擺法許多人還不清楚。對藝術有許多庸俗社會學的、教條主義的理解。幾年來我認為“藝術為生產服務”的提法值得商榷。毛主席提出：“藝術為政治服務……影響人的精神……”也有直接提出“藝術為生產”，藝術是“上層”，它不是一頭碰在經濟上的。市裡有些提法太狹了，好像畫毛驢一定得寫上“送公糧”才站得住腳。現在“百花齊放”與為工農兵服務的關係，現在對藝術方針的提法與毛主席

“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中的提法有所不同，哪些不同，都值得研究，有人反映延安座談会上的講話过时了，我看沒有。現在只抓艺术标准的思想也很抬头，党对这些重大的文艺思想抓的不够，沒有及时地組織研究、討論。

(2)“放”了也要“爭”才行，但武漢市的文艺批評空气很差。如“买猴”的拉鋸战是一陣风吹过来，一陣风吹过去，却沒有对作品作过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据說“人艺”与“长江日报”之間也有“墙”，若不能开誠布公，把批評当家常便飯，那“爭鳴”就困难了。

(3)要求党员带头“鳴”“放”，不然难免責为“永远保持正确”，“常有理”，不要專門等人家說錯了出來糾偏。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内可不可以怀疑？“文艺报”提出可以。学术与政治划分开就好了。党员也抛头露面就好办了。

(4)時間問題。我們这些人要多讀些書，文艺是細致、复杂的东西，但我們的理解往往簡單。有些文艺領導都快变成文艺界的“紳士”“会精”了。实在說有些仗現在我們已打不了，我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感到本錢不足，希望少开会，多学习。

四、5月15日在中共武漢市委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談会上的发言（見5月17日“长江日报”）

武汉文艺界的空气比較沉悶。怎样打破这种沉悶的局面呢？不能光向領導要底，應該象織布一样，你一梭，我一梭，織出一片春光来。我觉得現在就可以提出些具体的問題来爭一爭。不怕事情小，有时小事情也能說明大問題。

例如“湖北日报”处理刘真的杂文“談鞭打”的問題，在报社內部就有爭論。这篇杂文的遭遇是很值得注意的。我看这篇杂文写得并不坏，可是听說至今它还停留在这样的地位上：“現在，讓它放出来是可以的，然而它是毒草。”其实这篇杂文有什么“毒”呢？它不过批評了一个区委書記。湖北省农业生产有成績，不等于沒有

一个区会犯錯誤；应当“向县干致敬”，也不能說下面一个“張士貴”作风的人也沒有了，为什么不許写杂文批評呢？这实际上反映了某些同志对文艺的看法；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的看法。这个問題是可以大大爭論一番的。

又如，現在有人認為工人們演出“旧剧”（我認為应当說是民族戏曲）“不結合生产”，非常忧虑。我由此联想到几年来流行的“文艺为生产服务”这个提法。文艺最終当然也可以起到“为生产服务”的作用，但它毕竟是极为复杂的，它要感染人，震动人的灵魂，它不是直接反映生产、直接“为生产服务”。例如一个工厂厂长看了“十五貫”，感到主观主义不对，回去改进了領導作风，这当然是有利于生产的，不能說因为“十五貫”是“旧剧”沒有直接配合生产任务，便應該輕視它。

在这个問題上看法是有分歧的，党内同志听說也并不一致，可是一直沒有展开討論。

譬如，奚如同志剛才的发言，其中有一些我就不大同意，如果有机会，很好討論一下，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武汉缺乏自由討論的空气，大家和領導同志也常見面，問寒問暖，态度很好；但好象有一种看不見的隔膜，都不大接触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我認為，武汉市过去基本上沒有“爭鳴”的空气。

我举一个例子。关山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篇談国画的文章，我是看不出有什么錯誤的，陈方既却写了篇文章大張撻伐。可是等到开展反胡斗争以后，說陈方既有嫌疑，于是他指斥关山月的文章也就被否定了，但直到如今，問題的是非仍然沒有弄明白，不是就問題談問題。

姚雪垠写了一篇研究“儒林外史”的文章，后来有人批評他，“长江文艺”編輯部就連忙作了檢查，并在社論中把姚雪垠罵了一通，我很不同意这种做法。

千帆同志提到“文艺报”批評“不能走那條路”的問題，說“长江文艺”不敢反批評，其实，作协开过座談会，很多人写了文章，送

給当时的中南局一看，通不过，当时認為“文艺报”是上級刊物，而且当时正反对分散主义，怕为这扣上对抗领导的帽子，結果就把大家的文章寄到全国作协党組了事。

在党群关系上，我也認為有墙有沟。談到這個問題，我想談談两个名詞的概念。从整体說，“党”是偉大的，“群众”也不是渺小的，可是一到具体就不同了，說某某人是黨員，就意味着很进步，而說到群众的时候，却往往說“这个人什么也不是，是个群众”。就意味着这个人是落后的。同是一名詞儿，含义便不同了。在生活中，似乎一些人已变成了蝴蝶，另一些人还是毛虫。且不說蝴蝶都是毛虫变的，而且黨員也未必都是蝴蝶，非黨員也未必都是毛虫，这条綫是很难截然划分的。

很多运动收获是很大的，但有些东西，如主观随意性、宗派主义也有些滋长。例如“长江文艺”編輯部在肃反以后討論改进刊物，談到創作問題时，提出應該提高作品的質量，有人就說这是“強調艺术特質”，“強調艺术特質就是胡风思想”。在道路已經扫清，創作事业应当正常发展的时候，这样扣帽子有什么好处呢？

天保同志談到领导干部的孩子問題，我也有同感。譬如育才子弟学校的電話，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要保密，实在是莫名其妙。另外，我們武汉的观礼台上，年年有人带小孩，我觉得也很不好。观礼是大典，不是赶庙会。北京的观礼台，我从来沒見過有人带小孩，毛主席这一天也是严肃認真地站在那里，我們有啥权利把孩子大娃小放在观礼台上，每年通知都說不准带小孩，但每年都有首长带。这样做对孩子沒有好处，只能讓他們从小养成“小贵族”心理。

另外我想談談“鳴”和“放”的障地問題。大家对“长江文艺”提的意見，我誠懇接受。現在刊物正在着手改进，杂文、創作都有意識地从半开門到大開門。有些文章，是可能引起爭論的，大家有空也可以看看。不过“长江文艺”現在也有困难。它担負着北京“文艺报”、“人民文学”、“剧本”、“譯文”、“文学研究”……等七

八个刊物的任务，可是篇幅却减到62頁，这就很难編得好。希望增加篇幅或者增办刊物。我同意增办一个戏曲刊物。

最后談談時間問題。文艺界的領導同志，游泳在會議大海里的時間多，讀書、拿筆的時間少得可憐，好象农村中的“穿袜子”干部一样，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有人批評我們是“常有理”。而“常有理”又因为我們“糊涂塗”。再加上位居領導，所以又是“惹不起”。這批評是尖銳的，必須从这狀況中摆脫出来。

按：“長江日報”登載李蕤的發言后，李蕤看到其中“奚如同志剛才的發言，其中有一些我就不大同意。”這句話很不滿意。于是在5月17日趕快向“長江日報”寫了一封公開信來聲明。并借此对党報工作提出了指責。信的全文如下：（載5月19日“長江日報”）
長江日報社編輯部：

对于你們5月16日第一版發表的文艺座談會的新聞報道，我有一些意見。

新聞不是詳細記錄，當然沒法子發表每個人發言的全文（也沒有必要），但它應該“摘”出會議的主要內容，如果涉及個人的發言，也應盡力摘出那個人發言的“要點”。

而你們這個新聞報道里，我覺得是處理得很草率的。譬如我的發言，你們是這樣寫的：“作家吳奚如發言后。作協副主席李蕤說：他的一些論點我不同意，有機會可以爭論。”根據你們報道的，我那天座談會的發言，主要是不同意吳奚如同志的論點。并且當場送上挑戰書，準備和他爭論了。

但事實哪里是如此，我那天的發言，主要是批評武漢市沒有學術討論，沒有批評，以及党群關係不正常等等。談到這問題的時候，順便提到吳奚如同志的發言有些我不同意，如果在自由討論的氣氛中，討論討論會有很大收獲。這只是隨便舉例，說明迫切需要學術討論。可是，你們的新聞中舍棄全部發言的實質，抓了不相干的片言只字，給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

正因为这样，那一条新聞的标题和整个內容也是不很相称的，題目是“打破情面，暢所欲言”“尖銳批評党不重視文艺領導工作”，內容却是些鷄毛蒜皮的小事，許多讀者都反映“标题危言聳听，內容平淡稀松”。然而會議并不是这样的，是新聞沒有以高度概括真實地反映出座談会的氣氛和主要的內容。

由于这件事，还使我联想到其他一些报道。譬如5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記者谷声灝的关于武汉文艺情况的报道，許多便与事实不符，把程云的名字写成“陈云”，說他“很凶”又沒說誰講的，什么事情上表现他很凶。有的事張冠李戴，把張三說的話放在李四头上，这样的潦草不負責的作风是不好的。因为，不真实的或者过于片面的报道，往往不能有助于問題的澄清，反而会增加混乱，不能帮助“拆牆”而会无端又垒出新的“牆”来。

为了进一步改进我們的新聞工作，所以写这一封信，希望你們公开发表。

敬礼

李 蕤 5月17日

五、5月4日在中共武汉市委文教部 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发言

(一)市委对文艺战綫的領導問題。1953年我来到武汉很長時間不知哪位市委書記或哪位市委委員具体分管文艺，一会儿听說是孟老管文艺，一会儿說是在曾惇，又說是在李部长(李衍綬)管。最近才知是市委文教部和文教党委領導我們，但一直沒有人找我談过話。武汉文艺界領導上是存在問題的，既有教条主义，也有庸俗社会学。在本地区文艺政策方針是有分歧的。如：(1)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問題，口号沒錯，从第一次文代会以来，就提出文艺为生产服务，这种提法，我看有問題，意見有分歧；(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为工农兵服务的問題，文代会上就有分歧；(3)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問題；(4)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問題，1954年第三次文代会上，有人認為毛主席的話已經过时了，现在是只要政治不要艺术；(5)专家和群众的問題，专家是什么地位，新生力量怎样培养；(6)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等等問題，还未充分展开討論，以求得解决。总的說来，几年来党对文艺思想的领导是不够的。

(二)关于文艺批評問題。由于领导如此，文艺批評就“鳴”不起来。大家并不是沒有意見，背后談起来，意見很大。据我了解党内意見也很大，俞林与黑丁的文艺見解就不一样。“买猴”(相声)問題，全国有爭論，我也是不大贊成“买猴”的，但在开始时，“长江日报”文艺組內部通报上說，“买猴”是好作品，×××不同意是因为他自己是馬大哈；但反胡风斗争开始后，“长江日报”文艺組又有另外一批人写文章說有很多好节目不介紹，为什么要推荐“买猴”，这是政治問題，是別有用心的；去年“百花齐放”的政策传达后，“买猴”过了关。武汉又反过来肯定×××反对“买猴”是馬大哈。任何报纸、杂志都沒有很好地分析这个作品，所謂“胜利”和“失敗”，就是随着风走的，这样始終是拉鋸战。

我們这里沒有教条主义，沒有庸俗社会学嗎？可是沒有批評，批評是很“認真”的，如把“張羽煮海”硬和“柳毅傳書”捏到一起，有分歧，但也沒有展开批評。說明领导上不抓文艺思想。文艺界的矛盾，一个是上层和中层的矛盾沒有解决，一个是文艺思想沒有通过爭鳴达到团结。

(三)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視不够，还表现在对創作环境的安排。如房子問題，我被列为高級知識分子，但我住的房子等于在大街上，房子下面是个胡同，釘鍋的、补碗的，整天叮叮当当，家屬、孩子，几十个孩子吵吵鬧鬧，任何人可以不經過传达，直接到我房子里来。作协其他同志的房子則更糟，有的人半截床鋪到屋門外。解放八年来，武汉建了不少房子，大区撤消为什么不把协会的房子解决一下，作协等于工厂，沒有生产車間，別的地方的作协

幫助我們叫。去年去北京開會，參加周總理召開的座談會，總理也問起作協的房子怎麼樣，說他到武漢來時，是要和省市負責同志到作協來參觀參觀。現在撥了錢蓋房子，有了經費又無材料，結果財經上浪費，什麼時候排上隊？

六、6月3日在中共作協武漢分會黨支部處理一個黨員錯誤問題的支部大會上的發言（摘錄）

××關了一年另五個月不讓他們見面，這是什麼理由呢？我在舊社會里坐過牢，老婆孩子也可以公開接見。在今天社會里處理××的問題，我們不讓接見，這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官僚主義，把歷史問題弄清楚也主要是從這個出發，有人說××什麼都完了。到最後恢復工作時他和××談家庭問題時還要叫他們在辦公室里談。對於××和×××的問題根本就沒有考慮，這官僚主義是嚴重的。會議上有些領導同志不來，這又叫什麼整風呢？沒有聽××的控訴，而實際上××的檢討中也是有控訴的。

七、在作協機關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一部分）

從大家批評我的作客思想談起，解放前過着奴隸式的生活，那種生活給我帶來很多烙印。解放後如枯樹逢春，過去什麼話也不會說（只會寫寫文章）。現在學會了在各種會上發言。總之，有許多意見想談談，到中南這幾年總的覺得“忙”、“亂”和“空虛”，我的作客思想固然由於我本身弱點很多，但更重要的是把我安排到不適當的位置。剛來武漢時，我並無作客思想，也愿干預生活，也從未把自己看作“民主人士”。但以後遇到很多問題使我有了猶豫：第一，武漢市提出“文藝為工人為生產服務”的文藝方針問題，我一來武漢就聽到一些情況，覺得這種提法不對，連“工人文藝”編輯部都反對，但一直不能討論。第二，中南文聯時對社會主義

现实主义的討論，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問題有一些理解，我觉得不对。当时在中南好象只能反对脱离政治，不能提文艺特質，一提就是资产階級思想。把文艺战綫上的两条路綫的斗争割裂起来看，明明是不对的但不能討論，給我的压力很大。第三，对培养新生力量問題过去我們做了不少工作，但如何培养这中間一些具体的做法和看法我觉得有許多問題，但不能提出意見研究，一提出問題就成了思想問題，給人們压力很大。黑丁同志打电话請示北京，好象对这个問題不容絲毫的怀疑。实际上对培养新生力量工作中的缺点避而不談，只強調成績不看其中的困难和矛盾。当时我提出一些改进意見，反而变成反对培养新生力量的方針，只有使人望洋兴叹了。作协党的領導同志一般的对我很尊重，都是禮賢下士的，但一涉及文艺上的重要問題，就不考虑我的意見，沒有平等的討論的权利。这几年如果說大家有些不和气，主要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順便給市委提个意見，最近除了市委王岩同志和我接触外，过去一直沒見市委关心过我們。这使我想起中南局时代，那时党的領導同志經常可以接触，×部长抓的很紧，遇到問題就解决，但也抓出过毛病如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受到“文艺报”的批評問題。但能够和他們常在一起討論問題，我所以愿意从河南到中南来就是因为受到这种鼓舞。但中南区撤銷了，情况就大变了，市委沒有管，至今还不知道市委是什么人負責文艺工作，只有大区剛撤銷后曾部长曾来看过一次。

到中南来时，祖春同志問我对黑丁有什么意見，我說沒意見。他說絕不会的，日子长了就会有意見。我对黑丁的意見主要是文艺思想問題。和黑丁、淑耘同志是有观点的矛盾。如檢查刊物，刊物上发表“一封信”、“生命与无畏”等作品是有小资产階級思想，但不能因此就說整个刊物受到资产階級的侵蝕，我認为这种提法不恰当，但黑丁和淑耘同志一定要这样看。其次我提出刊物发表了許多灰色平庸概念化的作品，要注意作品的質量問題，淑耘同志不滿意，好象这样說就是对淑耘同志本人有意見，不尊重，这

就使人感到很难处。另外在看稿的問題上，我沒有看到許多稿子能加以選擇的机会，只能点头，只能看大家說用定的稿子。由于这以上种种問題，使我产生了作客思想。

肃反运动中，我不知道組織上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当时黑丁同志搞省市的工作，淑耘同志搞机关工作，我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只好自己写写文章。当时机关内部工作我不能做，外面的报告需要人做，我就去。在反胡风斗争中我还写文章反对他，但一“肃反”了連用文字进行斗争的任务也不給我了。我觉得肃反运动中党的群众路綫很不够，是有問題的。

关于我的組織問題，現在虽然已經在支部通过了，但我有些意見还想提一提：过去河南的郑克西等人曾給我提出所謂“反党反革命小集团”的材料，黑丁同志掌握的有分寸，并未斗争我还讓我工作，这一点我很感激，但仅仅不斗争我是不是就够了呢？有些問題我想借这个机会談清楚：河南省文联唯一的党员牛运仓作风极恶劣，包庇恶霸地主父亲，农民写检举材料，郑克西等这些团员都把这个材料交給牛运仓本人，把牛运仓个人看成党組織，这叫什么跟着党走。“三反”中揭露这些問題，牛調走了。牛在省文联时包办一切，我作为副主席是没有什么权利的。此外，郭箏廉的問題，鎮反时我們作了許多工作，她交代出自己是一个軍統特务。在省委处理她的問題上，当时我胆子很大替她承担下来，說她的問題都已交代了，牛运仓硬說她是現行特务这是錯誤的。現在想起来都有些心惊，在这个問題上不知河南怎么看，河南的肃反应该檢查，他們当时打了不是90%至少有70—80%，当时黑丁同志在处理我这个問題上很慎重，到市委談，我感謝。但我觉得这个問題也应该从宗派主义情緒去考虑，我觉得这里也有宗派主义情緒，是河南和武汉的宗派主义相呼应。

齐克下去了解情况，首先带着收集錯誤的态度去了解情况，这就是明显的宗派主义表现，好象一切党外人士都有問題。还有李季的詩“謝謝你的手风琴”的处理問題，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下来后对李文他們講，竟說我是串連群众反对党組決議，可那次会誰告訴我是党組会？說我无組織无紀律，很多人批評我，我到現在也不服气。老实說，从那次以后，我不敢再和別人接近。我現在带着对青年人負罪的心情說，肃反时×××到我屋里去，我很害怕，把門打开了并且严厉的說：“×××，你来干什么？”就这样以后还是有人要追問。另外何南丁的“檢驗工叶英”发表时我提出了意見和批評，这样是否增加了河南的宗派主义情緒。現在我要求組織上給我看河南写的关于我的材料，在反胡风斗争中白天作报告，晚上写文章，过去也作了很多工作，結果忽然变成反革命头子，真使我吃惊。这一天我想来想去不知怎样做才好，后来想想还是談出来好，把材料給我看，我也决不会去和誰記仇。如果組織信任我，就把材料給我看。另外，肃反时阳云和林焯一年多沒見面，这連国民党时候也不如，国民党时候坐牢，老婆、孩子、亲戚朋友还可以去看看，我們却根本不能接見任何人。机关肃反，这边党組織我觉得是受河南宗派集团的影响的。

組織上对我很照顧，很客气，但离推心置腹还有距离，我参加市人民委员会，担任各种代表，但这对我没什么作用，我不希望做官，倒希望党能多給我讀書的时间，写作的环境。我开会太多了，随傳随到，大家說我一步步成为文化紳士，我很痛心。根本沒时间抓业务了，以后不要再給我做统战工作。

对机关工作我提几点意見：（1）改变机关化，成为学术团体。（2）稳定机构，过去人員忽多忽少不好。（3）充分发揚民主。

机关机构选賢任能，不要主觀随意性，換人添人經過會議討論不要随意。大家說层次太多，如編輯部全体都是編輯，不要那么多层次。机关工作人員确定下来分工明确。机关民主空气淡薄，过去沒有自下而上的批評，发揚民主从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发揚学术問題的民主，这点青年同志如周勃、叶櫓、宋謀瑒他們之間爭論的面紅耳赤，但感情依然很好，这点我們領導不如他們。学

术討論應該充分發揮自由思想。另外，是否可以考慮機關每月開一次大會，大家在一起提提意見，使意見不至於積壓，過去有些問題是領導做錯了，有些是上下不通氣造成的。（下略）

附：李蕤的歷史簡介 （根據作協武漢分會材料）

從歷史上看李蕤並不是象他自己所說的是進步作家和進步新聞工作者，而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說革命話不作革命事的投機者。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1927年在偽汜水縣黨部黨務訓練班受訓三個月後，並留縣黨部宣傳部工作。1938年秋在國民黨13軍（張軫部）政工隊任編報組長。1939年在國民黨“陣中日報”工作，在這裡參加國民黨。1941年被捕出獄，此後又擔任國民黨西北經濟策進會視察員。1947年6月第二次被捕，由於經不起考驗，表現了對敵人的妥協和投降，出獄時寫了“對國是意見”的文章，發表在6月29日的河南“國民日報”上，內容是誣蔑共產黨，為國民黨作了反動宣傳。

1948年河南解放前夕，當時國內形勢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國民黨就要垮台了，李蕤拒絕去解放區，但他倒過頭來跑到了上海投靠了蕭乾，參加了“第三路綫”所辦的刊物“新路”的編輯工作。

1948年河南解放後，黨信任他，叫他負責河南省文聯的工作，在這裡李蕤和蘇金傘拉攏了一批政治、歷史上有問題、和政治思想落後的分子，其中，有歷史反革命分子，有反動軍官，有叛徒，有壞分子等等。他們把持了省文聯和開封市文聯，對省文聯黨的組織和黨員積極分子，進行了排斥和攻擊。

1953年李蕤調到中南作協協會（即作協武漢分會的前身）任副主席及“長江文藝”副主編之職。到作協武漢分會這幾年他採用了兩面派的手法，從表面口頭上，或他寫的文章里是說些擁護黨

和社会主义的话，但在背后具体的对待武汉市文艺界的领导、特别是对待作协武汉分会党的领导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采取打击与破坏的态度。

姚雪垠的右派言論

第一部分：姚雪垠的几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編者按：这里所选編的几篇文章，是作协武汉分会右派分子姚雪垠1957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的一部分。在“創作問題杂談”、“打开窗戶說亮話”这两篇文章中，正如姚雪垠在鳴放中的两次发言一样，是以反对“三个主义”为幌子，瘋狂地、全面地否定了党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領導，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方針，反对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对武汉以至全国文艺界的現狀，进行了恶毒的誣蔑和攻击，并进而提出了資产階級“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張以代替党的文艺方針，企图从思想基础上、政治方向上、組織領導上全面地摧毀党所領導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資产階級文艺的复辟鳴鑼开道。在“蘆沟桥礼贊”一文中，他竟喪心病狂地对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蔣介石，进行了肉麻的歌頌，更充分地暴露了姚雪垠的反动面貌。

一、創作問題杂談(載1月10日“文汇报”)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来，文艺界和学术界呈現了空前的活跃气象。当然，这种活跃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爭鳴，还需要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很多努力。現在，就几个有关繁荣文学創作的問題，我談一談自己的粗淺感想和看法。

对于作家生活的看法問題

作家应该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这一基本原则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我不打算重复大家早已听熟了的话。我打算谈的是，我们这几年来对待生活的看法上所存在的一些偏差。

有些同志把生活的范围狭隘化了

1951年我回到河南以后，常听到一些年轻的同志对我忠告说：“你虽然对旧社会有相当丰富的生活经验，但那种生活经验已经沒用了。你虽然在写作上有一套技巧，但从前的技巧也都是资产阶级的技巧。”（实际上我的旧生活经验和写作技巧都非常缺乏。）关于技巧的说法，一听就知道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关于旧日生活无用的说法，乍然听起来仿佛有些道理。今天经过了天翻地复的社会改革，加上新事物不断涌现，单倚靠旧的生活经验来看现实，正象是看过了时的日历，确实不成。但如果說旧的生活经验完全无用，或轻视旧的生活经验，显然也是十分错误的。这是机械地把生活经验划分新旧，割断了生活的纵的关系，不承认生活永远是历史的运动过程，前后承接。把生活机械地划分新旧，把解放后的生活从历史的奔流中孤立出来，这是形而上学的认识事物的方法。

老作家在旧社会生活得久，不但不应该把这一点看做是他们的包袱，反而应看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是他们的财富。这种财富正如其他知识一样，是没法用金钱购买，也没法通过任何捷径获得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源泉看，并没有阶级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立场来对待和运用生活经验。青年作者从旧社会带来的旧东西比较少，这是可喜的地方。但由于他们的生活知识少，便不容易把握和反映较为宽广和深刻的现实。他们可以开放鲜艳的花朵，但往往枝叶单薄，花瓣简单，开了一朵两朵就把蓄积的力量使尽。一个青年作者要真正变为成熟的作家，不但需要在

艺术修养上步步提高，也需要通过长时间蓄积丰富的生活知識，为着概括較大的历史现实，为着塑造更丰满的典型形象，任何作者不仅要懂得今天的生活，而且要懂得昨天的生活。对昨天生活的无知，本来是个缺点，而几年来却有不少青年作者竟然以此自豪。

不重視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經驗

几年来，不但許多青年对老一代作家所具有的生活經驗很不重視，而且有些領導創作的同志对这个問題也缺乏明确的認識。由于不重視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經驗，在分配創作任务时往往把老作家和青年作者一例看待，一例要求；既使老作家不容易發揮潛力，也使青年作者担負不容易担負的創作任务。反映当前的生活最重要，这一点沒有疑問。但是，由于曾經片面地強調反映当前生活，好象只有当前生活才有用，只有当前生活才值得写，于是老作家有許多可写的題材不敢写，又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自己的生活經驗。这种現象，也是形成几年来題材狹隘的原因之一。

李劫人先生正在写辛亥革命前后的生活，这是老作家利用独具的生活經驗發揮潛力的一例。其实，老作家不但写历史題材有其特別有利的条件，就是写目前的重大題材也有特別有利的条件。比如写长江大桥的建設吧，青年作者的长处是較容易同青年工人和技术員打成一片，而老作家則較容易理解有丰富生活經驗的专家 and 老工人，較容易理解更多的、更繁杂的、形形色色的問題和人物。除这之外，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經驗与知識基础的老作家，他可以从民国初年茅以昇企图建筑长江大桥的时候起，縱目数十年的历史变化，給这个现实題材以非常寬闊深厚的背景。再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題材，青年作者对于资本家的过去生活，对于他們的思想、感情与性格，很难了解深刻。可是老作家一閉眼就会想起来許多过去經營工商业的亲戚、同乡、朋友和熟人，二三十年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历历地呈现目前。

以上所談的，目的在使大家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重視生活的縱的關係，不要把當前的生活孤立起來；一點當前的生活，往往缺乏真正的深度。第二，對於那些有較多生活經驗的老作家，要給予應有的尊重，幫助他們利用這些生活的資本，發揮更大的潛力。

關於體驗生活的一些錯誤做法

這幾年，在布置作家下去體驗生活時，一般領導同志很少認真研究各個作家的不同條件，常常把問題停留在一般的號召和督促上。作家之間，不僅有着年齡、經歷、修養、生活習慣和體質強弱種種不同，也有各人特長的不同。不把這些問題全面地充分考慮，往往在下去生活後會發生新的問題，不能夠實現所預期的收穫。比如：硬讓一位熟悉北方農村的作家下到南方農村，讓一個寫抒情詩的同志長期蹲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小村莊里，讓一個生活經驗和一般知識都很欠缺的青年下到有宏大歷史背景和複雜關係的地方，或者讓一個具有較多的社會知識和較大的概括能力的老作家蹲在一個範圍極小的活動天地里，都不是妥當辦法。

對於深入生活，也曾流行過兩種片面的指導思想。第一是擔任實際工作問題。作家下到生活據點，當然最好是能夠擔負點實際工作。但是不應該把這作為唯一的生活方法，以為不如此便是不肯艱苦深入，便是漂浮在生活上面。作家應不擔任實際工作，是要根據作家本身和生活地點的許多具體條件決定的：有時有適當的工作可以擔任，有時沒有適當的工作可以擔任；有時擔任實際工作對創作有利，有時就未必有利。許多同志曾經不研究實際情況，憑着一個抽象的原則，也就是憑着一個死板的教條，坐在上邊遙遙地指導下邊的生活。許多搞創作或搞編輯的同志也同樣以某人是否擔任實際工作為衡量其生活是否深入的唯一標準，這不但形成輿論的壓力，並且作為檢查作家思想時的重要根據。在這種硬性的指導思想下，有些作家在生活據點中忙於秘書工作，

有的忙于管伙食，有的担任了领导副职，“捆绑”在办公桌或会议上，但对生活的收获并不大。就领导同志说，这样的指导方法实际是官僚主义加教条主义。

第二，是深入一点的问题。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好；可是整年整年的呆在一个村庄或一个小工厂里，算不算好的生活方式呢？我看也不见得。过去，为着反对前一种偏向，便强调地肯定了后一种生活方式。古语说，“阅千剑而后识器”，对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看的人多，经的事多，才能对生活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是相辅相成的，生活的天地过于狭隘，往往会使人变得孤陋寡闻，目光如豆。片面地强调深入一点，忽略了点与面相结合的辩证关系，这种指导思想是给作家“划地为牢”，也是主观主义在作祟。

最后，这几年，我们思想中的公式主义也同生活互为影响。比如，我们下工厂，事先就计划好找先进生产者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的题材（领导和编辑部也时常提出来这一类的具体任务），有这种计划原无不可，可是它常常变成公式主义的死框框，套住了作家的生活。于是，尽管我们生活在极其复杂多采的现实中，所看见的却往往只限于这一点，对其他失去了敏感，失去了探讨和追求的兴趣。几年来我们产生了那样多千篇一律的、大同小异的工厂题材和农村题材的作品，大概都和这种生活态度有多少关系。我们不应该拿一个框框去套取生活，不应该让一个简单的公式、一个死板的主观意图限制了我们在生活中的创造性活动。不是吗？

可见，下去生活，也需要反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需要思想解放。

对作品的看法和态度

我们对待作品，有许多偏向是应该赶快纠正的。

第一种偏向是过于求全责备

任何作品，都为它的形式，它的作者的才能，生活，处理题材的着眼点等等条件所拘限。一篇比较成功的作品，如果用鸡蛋壳里挑骨头的态度去推敲，也往往可以挑剔出一些毛病。如果我们处处“求全责备”，将有很多花朵不能开放，即让开放了也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何况，我们“求全责备”时所持的尺度是不很准确的，往往带有教条、公式和偏见。例如这些年来，因为我们知道了性格刻划在现实主义美学中的重要意义，于是处处拿是否创造出典型人物去衡量作品，对短篇小说和对长篇巨著作同样要求，如果在一篇小说中看不见完美突出的人物形象，就认为它是篇失败的作品。其实近代许多优秀的和伟大的小说作家，他们所写的短篇小说实在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刻划了鲜明的人物性格；有的人物性格不突出，但故事很动人；有的既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动人的故事情节，然而反映了现实的侧面。如果单拿写出人物典型一个尺度去衡量，契可夫和莫泊桑都有很多短篇要落选，而奥·亨利和法郎士的短篇更要落选。

第二种偏向是乱扣帽子

我们的文学战线上某些青年同志，其中有搞创作的，有搞编辑的，几年来常喜欢拿一些不恰当的帽子扣到别人的头上，给创作事业带来了很坏影响。例如，动不动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批评作家，而这句话简直成了一句金箍咒，使不少作家下笔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写爱情，不敢写温暖的友谊，不敢写私生活，不敢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敢在作品中流露点浪漫色彩。解放后几年中文学题材的狭隘，作品写得干巴巴的，原因虽不完全在此，但与此颇有关系。

另外有些同志听说自然主义是不好的，而实际对于自然主义一词的概念并不清楚。如果一个作家确有自然主义倾向，当然应该帮助他进行纠正；可惜这些同志们是只喜欢粗线条的文学风格，只喜欢简单的描写，遇见文笔细腻写法就称之为自然主义，表示反感。且不说描写细腻和自然主义是两回事，就让对待真正的自

然主义也未必应该一笔抹杀。左拉是众所周知的自然主义作家，我看我们今天的作家还没有一个人写出象“萌芽”、“娜娜”、“小酒店”等那样感动人心的作品，在我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深度也远不能和左拉的深度相比。我明白自然主义的严重缺点，我也不同意今天的作家走自然主义道路，我说这些话，是有慨于近几年有些青年同志用极简单的教条对待文学创作的复杂问题，强不知以为知，人云亦云，听风是雨，随人起哄，给作家乱扣帽子。

由于几年前苏联曾提出过文学要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一理论，于是在我国到处流行着本质论。作家写一个生活的细节，看作品的人并不管这一个细节有助于烘托性格，烘托气氛，往往简单和粗暴地指责说：“这不是本质的！”一篇原稿，经过大家提意见，指出这不是本质的，那不是本质的，作者只好忍痛删尽枝叶，独留枯干。庸俗的本质论对我们的创作不是带来好处，而是灾难。

由于几年前在苏联批判了无冲突论，于是我们也懂得了无冲突论的不好。接受苏联的这一斗争经验是好的，但不能作为帽子随便乱扣。作家描写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每一个短篇小说里所表现的矛盾都是尖锐相对的，或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这样写，不一定就是“让棋”。我们有不少同志往往把苏联作家反对无冲突论的文章中的一些话生吞活剥，死搬硬套。不分别形式和题材，硬拿一个尺度去衡量一切作品，这就是教条主义。有教条主义存在，便有许多不合理的清规与戒律产生，便阻碍百花齐放。

第三种偏向是禁忌太多

我在前边提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那顶帽子时，已经说出来一些禁忌，而实际上曾经流行的禁忌是多得多的。例如，曾经有些人看见作品中描写革命青年在兴奋时滚出热泪，或一个共产党员在月光下回忆起童年和故乡，都要给以“严正的”批评，理由是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流泪，不能想家。另外，作家们把写领导人物的私生活看做一件冒险的工作，认为很容易被批评是歪曲了领导形象，于是

作品中的領導人物便只能談工作，講教條，規行矩步，四平八穩。寫工人農民也有許多禁忌，動不動就受“嚴正的”批評，說是歪曲了工农形象，甚至還要追尋作者的不良企圖。這一股歪風，近一兩年來雖然有了好轉，但是還沒有徹底地加以糾正。有些人不象過去那樣的态度蠻橫，而是用較為和平的口气說：“難道貧农对合作化也會動搖么？”“難道工人也會發生這樣的不好行為么？”或者說：“這樣的情形在現實中是有的，但不是本質的。”我希望在“百花齊放”的方針指導下，這種歪風能徹底肅清，一切有革命良心的作家都感到百無禁忌才好。

第四種偏向是太看重作者的名字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對待作品。宗派情緒和關門主義，人人皆知其可惡，我在此不必去談。根據作者的名字取舍作品，不一定是宗派情緒，也可以是崇拜名人的思想在作怪，也可以是由于碍情阻面，怕得罪熟人或名人。幾年來，許多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有名作家所寫的壞作品，同時一定有很多好作品因為作者的名字不响亮不能順利發表。今天，為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為開展創作競賽，一定要廓清這種庸俗的、偏狹的作風，給所有作品以平等發表的機會！

根據作者的人來對待作品，在批評方面也產生一種很壞的風氣。這種風氣是離開實事求是的原則去分析作品，從先入為主的成見出發。這裡產生了几種現象：第一種是對某些人只有頌揚，不敢批評；即有批評，也是拂皮搔痒，聊資點綴，以表示文章寫得全面。對另外一些人，苛求過甚，缺乏與人為善，熱情幫助的態度。第二種現象是對某些人的平庸或失敗的作品盲目推薦，而對另一些人的較好作品取冷淡沉默的態度，不敢或不愿給以公正的推薦。第三種現象是對某些人錦上添花，對某些人落井下石，不論歌頌或批評，都是起哄。這第三種現象最為惡劣，有時簡直敵我不分，企圖使被批評的作家永不翻身而後已。

批評方面的不良風氣，必然給創作事業帶來了許多危害。幾個月來，這種不良風氣，已經引起全國文藝界的注意，已經遭

到了批判。但是这些风气的根子相当深，必須繼續同它斗争，才能肃清，而且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

第五种偏向是乱加删改，态度粗暴

編輯同志对稿子应该有删改权，但在运用删改权时必须尽可能地慎重和虚心。这几年，有很多編輯同志所表现的态度是过于粗暴的。例如，过去某省日报曾约我写过稿，往往几千字的稿子被删得只剩下几百字，而这种大刀阔斧的删改态度不仅对我一个人的稿子如此，对别人也有同样情形。删削后的稿子同原作面目全非，令作者哭笑不得。我还遇到另外的情形，原稿中紙烟的“烟”字都被編輯改成“煙”字，不知他們根据什么理由要取消“烟”字；一篇稿子中用了些历史典故，經編者紅笔一删，有些地方接不上去，有些地方接上去成了笑話；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所用的方法本来在古典小說中是常用的，但由于編輯同志只喜欢看老解放区和目前中国的名家小說，感到那样的开头不入眼，紅笔一揮，几百字去掉了，小說的开头有单刀直入之快，但无摇曳多姿、前后照应之美。

第六种偏向是机械地看生活

有些同志讀到一篇作品后，不問作品是否反映了现实，首先奇怪地問：“他下去沒多久，仅仅凭着一次訪問，怎么就可以写出作品呢？”或者說：“他只在火車上同人家談过一次話，怎么可以写小說呢？”于是就怀疑了这篇作品的价值，甚至責备作家的創作态度，說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道路，是玩弄技巧。这种指責有时也可能指責对了，但有时也完全不对，只能表现出我們对待創作过程的認識简单化，表现出我們的无知，如果一个作家平日蓄积了較多的生活經驗，他是可以凭着短期訪問，凭着一席談話，写出象样的作品的。这种过程毫无神秘之处，也决不違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原則。

第七种偏向是編輯工作的原則不够灵活

这里，我只談两个問題。第一，我們有时为响应某种号召，

或想集中的表现某一方面的生活，大力組織和发表这一方面的稿子。就一般道理說，这工作有时确很需要，毫无可非議之处。但問題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常不惜发表許多味同嚼蜡的、毫无艺术味道的坏作品，这就值得考虑了。今年春天，“长江文艺”上发表过不少工业方面的特写，其質量連象样的新聞报道还不如。味同嚼蜡的作品既不能艺术地反映现实，也不能感染讀者，更无助于文学上的百花齐放。

第二，一本刊物象一个小花园，須要避免单調，使花色尽可能繁多一些，因此編輯同志最害怕长稿子，害怕它把別的花盆挤得沒处摆，这心情，这苦衷，我全明白。但是，也不要把問題看得太机械。登一篇質量并不坏，能够吸引讀者的长稿子，我看要比登几篇味同嚼蜡的稿子好得多。硬說讀者不喜欢稍微长的稿子，是沒有根据的，是主观主义在作祟。

二、打开窗戶說亮話（載“文艺报”1957年第7期）

最近期来，不管在科学研究方面，在戏曲、話剧和电影方面，大家对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問題都在紛紛地发表意見，但是在文学創作的障地上却显得有点沉寂。是不是作家們都不感到有什么可“鳴”的“不平”了？我看不是这样的。在文学創作的障地上也存在着很多相当尖銳的内部矛盾：有些問題已經解决了，有些还没有解决；有些已經被揭开盖子了，有些还没有揭开。在私下里，几个搞創作的朋友坐在一起，可以发許多牢騷，可以針針見血地談出来許多令人气愤的不好現象，然而在公开場合，却仿佛是“西部前綫平靜无事”。过去有人說我們的文坛有两个：一个是公开的文坛，一个是私下的文坛。这种現象，在今天依然存在。存在这种現象，正說明有矛盾，有問題。

为什么大家在背后談論的問題很多，而在公开的場合談得較少、很少、甚至干脆不談呢？我想，这原因虽然不一，但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在許多文艺机关或团体里长久以来缺乏民主生活，或民主空气过于稀薄。在过去几年中，确实有些同志因为好提意見，好“爭鳴”，受到打击，在运动中成为“重点”，給他們的帽子是“一貫反领导”，甚至“反党情緒严重”。当然，这些被整的同志的身上也有其他或大或小的缺点，但是在挨整时候，人們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对待他們的真正毛病来整，而是深文周納，借題發揮，把他們喜欢“爭鳴”的积极方面也当做严重的罪款之一。即讓平常他們所“爭鳴”的仅是文艺理論問題，而且确实打中了某些领导同志文艺思想和理論的弱点，但是在运动来时，原来是正确的批評也会一变而为“反领导”的罪款。这好象封建时代，臣不能議其君，子不能議其父。在新社会，同领导同志作理論爭鳴也会給戴一个“无組織、无紀律、对抗领导”的大帽子，怎么能使大家毫无疑諱，暢所欲言？

今天的情况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几年来某些文艺机关和社会上曾經存在过的違反民主生活原則的現象仍然在起着影响。有些人怕将来遇着机会重新被整，他們認為“出头的椽子先烂”，不如暂时把許多應該說出来的話忍在肚里，不鳴或少鳴。有的人說：“現在正在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火候上，鳴一鳴不平沒人敢給正面打击，但是你会在別的时候或別的問題上招一些不如意。”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当然是要不得的，并不是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他們只顧“謹小慎微”，而看不見整个社会的和党的利益。但是，今天要着重批判的还不是这种“謹小慎微”的态度，而是糾正那种違反民主生活原則的不好現象。这需要一方面有人敢于提出問題，敢于批判，而不要仅仅在背地发牢騷，另一方面，文艺部門的领导同志要学习“禹聞善言則拜”的精神，勇于接受群众意見，勇于檢查自己在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这样一来，那些有話不敢公开談的同志們也就无所顧忌了。

二

在文艺领导方面，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往往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互相結合。现在我随便举出来一两种官僚主义的表现谈一谈，对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留在后边再谈。

官僚主义第一个常见的表现是不关心群众生活。例如以我所知道的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来说，这几年在工作上是有效果的，但官僚主义也是严重的。武汉分会创作同志们所住的地方，环境非常坏，不要说不能够静心读书和写作，连睡觉也时常会成问题。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可是一年一年地拖延着不解决。我们决不同意作家们的生活应该过得比一般国家干部特别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作家是精神劳动者，他们象科学家一样需要比较适宜的工作环境，房子不在好，只要环境安静，光线充足就行。当然，象武汉这样的都市，房子问题确实相当紧张。但是暂时为作家安排十来间房子，决不会没有办法，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武汉分会领导同志和武汉市委都有官僚主义。他们看见现实中存在着问题，天天听见作家提意见，他们也常常表示同情，但是没有积极地采取措施去解决。至于住在作家宿舍中的作家们，一日三餐都极不方便，领导同志更是从来不去考虑。有的作家说，因为领导同志们都在机关中有小家庭，有女佣人烧饭，所以他们不能体会住在作家宿舍的同志们在生活上有多么不方便，据我看，这种背后的指责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有一个很光辉的道理，就是做领导的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替群众解决困难，叫做“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武汉分会内部的成员并不多，可惜领导同志设身处地关心大家生活的时候太少了。

又如去年全国普遍地调整工资，但武汉分会的专业作家们的津贴却被冻结在两年前的水平上。武汉分会的专业作家从前在评级上有些是偏低的，有些有负担的作家并无积蓄，常有寅吃卯粮

的情形。从去年全国調整工資以后，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有相当上漲，这就使那些暂时写不出作品或正在写长篇作品的作家們在生活上更加緊張。关于冻结津貼，事前事后，都沒有向作家作任何說明。尤其有趣的是，正当要进行工資調整的时候把作家們的工資赶快改称津貼，这样名称一变，过了不久，凡拿国家工資的同志除調整工資外还拿到几个月的补发工資，作家因拿的工資名曰津貼，既不調整，前几个月的工資当然說不上补发了，这就給人一种印象，好象組織上的着眼点是在找窍门少給作家一点錢，而不會考虑应该如何照顧一般作家（有一部分相当穷的）的生活和情緒。

对于上述冻结津貼的問題，我有以下三点不成熟的意見：第一，这样作法似乎不一定符合党在去年春天所宣布的知識分子政策；第二，即讓符合党的知識分子政策，也沒有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問題；第三，作法上实在生硬。

再如关于专业作家自給的問題，中央的精神当然是为着刺激創作繁荣。在中央宣布这个办法的同时，也照顧到多数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又理解到中国知識分子的性格特点，所以再三囑咐作家們不要勉强，不要客气，在考虑后認為自己有困难时还可以繼續拿津貼。这样的态度才是审慎与关怀的态度。可是，武汉分会就不是这样办。武汉分会的作家們在去年十二月中旬接到一紙通知，上边象鉄板釘釘儿似地說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后来实际实行是从四月一日起）专业作家要一律自給，并附了若干条办法，最后問：你有什么意見？中央精神的另一部分，在这个通知中一点也看不見。既然沒有第二条路可走，作家們当然只能在轉业或完全自給（包括临时貸款維持生活）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尽管大多数作家都沒轉业，但是其中有些人确实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感到沉重压力。

象上述两件事情，武汉分会的領導同志們本来可以处理得很好，只是因为一向养成的主觀主义的工作作风，不习惯走群众路

綫，結果并不很好，其他例子还有不少，不必舉了。好象他們唯恐不能首先完成上級号召，眼睛向上看的過多，向下看的過少，也許有人看見我談這些問題會說我的靈魂庸俗，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發着銅臭。但是請實際一點，不要站在高枝上說風涼話。作家也是普通的人，不是超人，也有妻子兒女，也要吃飯穿衣，正因為我談的是實際問題，這些話才說出了不少作家心中要說的話。請恕我說句笑話：我还不曾見到哪位自命為最無產階級化的同志帶頭減薪呢。

〔昨天我遇到一位武漢分會的同志，談到機關里存在的嚴重問題。我們的共同看法是，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民主空氣，形成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隔閡和矛盾。同志們提到武漢分會時不是感到溫暖，而是一種相反的感覺。我想，不管什麼機關或團體，只要有官僚主義存在，只要缺乏民主生活，團結都是有限度的，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必然是突出的。〕●

三

官僚主義第二個常見的表現是採取行政命令和過於簡單化的方法領導創作。

文學創作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精神勞動，它所牽連的問題是多方面的。要了解某一個作家在創作方面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並且知道如何使他發揮長處，克服缺點，這事情已經夠難。倘若領導的是許多作家，其困難當然更大。要使領導工作做得比較好，必須第一，領導同志精通業務；第二，領導同志走群眾路綫，多與作家談心；第三，每年最好能抽出一定的時間下去生活，避免根據舊的生活經驗和從書本上得到的死教條去指導創作。

關於領導同志應該精通業務，這問題我不打算多談。作為文學部門的領導同志當然應該精通，起碼應該懂得文學業務。但是

● 這一段系“文藝報”編者遵作者囑在發表時刪去了。

在解放后由于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太快，并不是每个领导同志都精通或懂得业务。不懂就应该虚心学习，不要打肿脸装胖子，误认为自己既是领导，就是真理的化身，可以对一切问题乱下指示，代党立言。事实上，几年来有些并不真懂文学创作和戏曲艺术的文化局长和文联主任直接抓创作组，抓戏曲改革，固然也有成绩，而另一方面也给工作带来了不少损失。一个被领导的作家如果不虚心，直接受害的是他自己；领导同志如果不虚心，影响的范围就大得多。党和国家派你担任组织领导或行政领导，不等于党和国家认为你在文学业务上就是专家，可以不必再虚心学习。担任了领导工作就觉得自己一切都比你领导的群众高明，正是从旧社会传下来的官僚主义思想在作祟。

几年来，有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不大明白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尽管他们本人也搞过创作），没有时间也没有虚心加紧学习，也忽略了走群众路线，常常主观主义地以简单化的方法领导创作，在工作上出了许多偏向。对于每个作家的特点不加充分注意，对于每个作家正在进行的工作情况不够了解，常常大轰大掣地作一般号召，一般要求，就很不好。例如在1954年以前，有些领导同志非常强调写快板之类的通俗作品，就把党的文学事业理解得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首先写通俗作品，否则就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有的老作家过去曾写过好作品，也写过失败作品，搁笔多年，现在希望重新写一部比较有分量的作品，他不但会被大家认为有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而且说他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嘲讽的口吻说他“企图打翻身仗”。每年都有几次检查思想的机会，每次检查思想，那些写不出快板之类作品的同志总得做一做自我检讨，替自己扣一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而实际是在言不由衷地说话，心中并不服贴。我们首先肯定，作家确实应该为群众写通俗作品；尤其在前几年，更应该写。但是，第一，必须通过作家的自觉自愿，不能勉强；第二，每个作家都有最习惯的武器，不能让大家拿一种武器作

战；第三，企图写有分量的作品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果这种企图符合人民利益，它就是革命英雄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由于上述领导思想和方法过于主观主义，过于简单化，就使得一部分作家不能够发挥积极性，不能够发挥潜力。

领导同志号召和推动作家们下去体验生活，完全是必要的。但是这件好事情如果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做，也不见得会得出好的结果。例如，这几年我常常看见，有些领导同志把号召大家下去生活看成唯一的重要工作，只要大家下去，他们的责任就算尽到了。至于作家以后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在写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很需要他们帮助，他们却忙乱得连写回信的时间也没有。一句话，你所遇见的新问题不能引起他们的关心了。另外，在过去几年中，作家下去后要不要担任实际工作，应该担任什么工作，不是按照生活基地的具体情况和作家本身的具体条件进行考虑，而是以领导的主观要求为依归。比如，领导同志认为作家在生活基地必须担任实际工作，于是这就成了唯一的正确原则，不管其它具体条件多么复杂，多么不同，都得一律照办。我们认为，作家在生活基地担任实际工作是一个好办法，但不是唯一的好办法。到底哪种生活方式合宜，决定于当时当地的种种具体条件，而不能决定于领导同志的主观认识。坐在作家协会或文联的办公室中硬性要求作家下去后一定采取某种生活方式，常常是不妥的。从前有些皇帝（明崇祯帝就是如此）住在深宫之内，遥遥指挥远在几千里外的军队作战，叫做“遥制”。上述领导方法，实际上有点近似。

凡是有出息的作家都不会不愿意下去生活，因为下去参加群众的斗争生活，一则可以不断地改造自己，一则可以经常从生活中取得新的创作主题和题材，创作生命才得以继续。但是，倘若作家正在写一部稿子的时候，他不愿意半途停笔，就不应该催他下去。偏偏有时由于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祟，他们不关心作家正在进行的工作，认为作家不下去只是因为害怕吃苦。他们或直

言，或旁敲側擊，催作家趕快下去，對作家形成沉重的精神負擔。有時領導同志會問道：“他為什麼不趕快把稿子結束後下去呢？”這種關懷是好的，可是缺點在於他不肯進一步了解作家的創作情況，對作家所施的“精神壓力”只能叫作家潦草趕工或因疲勞過度而壞了健康。所以，領導同志能夠同作家多直接接觸，多談心，多理解創作的特殊性，非常重要。

在過去，作家的生活和創作計劃一半是自己的企圖，一半是領導的意圖，這叫做“自願與領導意圖相結合”。但如果作家的計劃不符領導意圖，領導是可以把它推翻的。還有一種情形，作家有一個長篇計劃，已經寫了七、八萬字，領導同志並不把稿子拿去看一看，只在主觀上不相信他能寫成功，就毫不通融地勸告作家放棄計劃，忍痛放棄已寫出的若干萬字。現在也許有人會問：“作家為什麼不堅持自己的計劃呢？”我回答說，在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前，在民主空氣稀薄的地方，作家同領導爭一爭的勇氣是不夠的，真要爭的話，會把關係弄得很緊張，很不愉快。

還有，過去編輯們喜歡大刪大改別人的稿子，實際上有一部分是官僚主義的領導思想的體現。有時，遇着老作家的稿子，編輯部不好意思改，送去給領導同志。領導同志本可以找作家當面談談，征求作家的意見，最好讓作家自己改。但是由於官僚主義作祟，雖然住在一個機關里，領導同志也不去找作家當面研究，非常自信地紅筆一揮，發去排印，點鐵成金的地方固然有，而點金成鐵，令人啼笑皆非的時候也不少。唉，何苦呢？

我覺得，這幾年來，有些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確實太忙，致使他們不但缺乏讀書學習的時間，更缺乏接觸工农兵群眾生活的機會。這樣，他們很容易落在生活的後面，養成一種作風，即用主觀主義代替實事求是地根據現實生活的複雜性去處理問題。這是他們身上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產生的根源之一。他們習慣於高高在上，不習慣於走群眾路綫。他們總覺得群眾落后，看不見

別人的進步，正說明他們自己落在現實發展的后邊。所以，如果能讓領導同志們每年有一定時間到群眾中參加鬥爭生活，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四

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互相依托的，是一對難兄難弟。我在今年一月初的上海“文匯報”上發表過一篇“創作問題雜談”，儘管對某些問題的提法有毛病，但是也揭露了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危害情形。已經談過的話我儘可能不多重複。現在我再簡單地談出來幾點小意見，請大家討論。

我覺得我們的教條主義不僅在領導同志、編輯和批評家身上相當嚴重。在讀者身上也相當嚴重。它曾經好像是一種時代空氣，或者象流行性感冒，散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在這樣的環境中，作家本身也不能不沾染着或多或少的教條主義。有些作家由於經常參加鬥爭生活，容易發現教條主義的不符合現實生活的複雜面貌與發展規律，總希望打破教條主義束縛，於是他們常常一面帶着教條主義進行創作，一面同教條主義鬥爭。這幾年我們都看到文學創作方面的公式化現象很嚴重。公式化這種現象不能完全歸罪於作家生活不深入，而更應該歸罪於教條主義的猖獗。既然有一部分領導、編輯、批評家和讀者群眾按照幾個簡單的教條對作品進行衡量、挑剔和指責，形成一種很大的壓力，作家中除非少數真正“特立獨行”之士，對生活和藝術確有真知灼見，而刊物編輯部和出版界又不敢擋他過關，敢於對教條主義嗤之以鼻，其餘一般作家就沒有這種魄力。而且，你真要完全不接受教條主義，刊物和出版社編輯們就不讓你過關。即讓斗過了這一關，還會有扛着教條主義大旗的批評家領導着他們所影響的一部分讀者隊伍從背後掩殺過來。情況如此，公式化的作品安得不相當流行？

首先，從下去體驗生活的时候開始，作家的思想就受着教條主義的束縛。下去後要看什麼，要發現什麼，要表現什麼，都有

一定的框框，這叫做“創作的指導思想”。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也提出來一些創作的指導思想，但那是幾個基本原則，可以靈活運用。現在的框框規定得很具體，很死板，硬要你拿住這些框框往生活上邊套，所以是教條。作家下去體驗生活，尋找他要表現的人物和題材，事先就決定好了只是下去“按圖索驥”。對於框框以外的生活，作家因受了框框的限制，失去敏感，或看見了也不知道是否應該寫。人們說宋朝文與可畫竹子畫得好，象“胸有成竹”。他是觀察過無數竹子之後畫竹子，所以能夠隨着自己的心意畫出竹子，而且是真正的藝術品，教條主義者也是“胸有成竹”，但是毛病在於不是從生活出發，而是從主觀出發。一句話：他們胸中的“成竹”是死框框。

教條主義者把無限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簡單化、圖式化。他們常指責說：“現實中有這樣的情形嗎？”“你為什麼不把中農的性格寫成動搖的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造的，難道也會落淚嗎？”“你把張三的品質寫得這樣壞，工人階級中難道有這樣的人嗎？”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在新社會，創作的道路本來應該是非常寬闊的，自由的，但是各種各樣的教條主義卻到處布置了絆馬索，等着你一萬個小心中的一個疏忽。這樣，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古語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和上述教條主義相結合的是所謂“本質論”。前兩三年，忽然流行着一種理論叫作家寫本質。藝術當然應該反映事物的本質，但這理論一變成教條就貽害不淺。它成了唐僧的緊箍咒，動不動就使你頭疼。比如你寫一個旅客夜間坐在硬席車廂里，附帶地把車廂中的情形烘托幾筆。在藝術上，這種筆墨有時是非常必要的。但教條主義者會指責說：“這些不是本質，應該刪去。”你寫一個貧農比較落后，一個老工人對別人的成功有嫉妒心，教條主義者會告訴你說：“你寫的不是農民和工人階級的本質，不好。”如果你遵從他們的意見修改，那必須把藝術的枝枝葉葉都去掉，最後只剩

下一棵死的枯干，上边加个标签：“此系木本植物，无味，可以益气养神，服之不中风邪。”据教条主义者看，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教条主义的“本質論”是不能够理解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他們死啃住敌我斗争在建設社会主义胜利过程中愈来愈复杂尖銳的死教条，往往不承認有内部矛盾。我曾經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一个次要角色是一个落后工人，因有濃厚的宗派情緒和嫉妒心理，看見別人装錯齒輪，自己不管，影响了机器的正常運轉。出版社編輯同志認為工人不会这样的。要我把这个工人改成特务，我不同意，这部稿子就压下来了。有的同志写过几篇农村题材的小说，但没有写出富农的破坏活动。領导同志批評說：“目前农村中最本質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富农是农村資本主义的代表，你怎么不写富农的破坏活动？”这位同志怀着歉疚的心情回答說：“我在的那个地方許多村庄都没有发现过富农的破坏活动，也許中国的富农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富农有所不同。”“不，富农没有一个不从事破坏活动的，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你們那里一定有富农的破坏活动，沒有发现，是因为你們在政治上过于麻痹！”这位同志很苦恼，下去后果然写了一篇有富农破坏活动的小说交了卷，但由于故事和人物都是虛构的，小说是失败了。直到合作化高潮以后，富农都参加了合作社，这位同志心上的包袱才放下了。

其实，教条主义不但不懂得人民的内部矛盾，也不完全懂敌我矛盾。例如有的人写解放前或更早时期的农民、工人同地主、資產階級的斗争，必須写一个共产党员在地下領导才算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質。曾經有这样一個笑話：有一个对祖国历史毫无常識的青年編輯看完了一篇写明末农民起义的稿子，很不滿意地說：“这是歌頌自发斗争！为什么不写出党的領导？”撇开某些缺乏历史常識的問題不談，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压迫階級的自发斗争仍然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凡是有階級压迫存在的地方，

就可能爆发斗争，不一定每时每地的斗争都必须共产党员出头领导才会爆发。而且，所谓党的领导也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有的有地下党员参加领导，有的没有地下党员参加，而是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和启发。过去在教条主义的压力下，有的人硬安插一个自己所不熟悉的地下党员领导斗争，写出来满不象那么一回事儿；有的人知道自己写不好地下领导的党员形象，干脆不敢动笔了。

以上所谈的教条主义，其所以为祸甚烈，是由于教条主义总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扮演着马克思主义文学保卫者的姿态。而且它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今天虽然教条主义的障地被冲毁了，但如果不警惕，不但旧教条主义可以卷土重来，而且随时都可以产生新的教条主义。所以我认为同教条主义斗争是长期的，不能看做是一阵风。

五

关于宗派主义，一年来揭发和讨论得已经很多，我不打算多说什么。我只谈两点小意见：一个是关于培养青年作者，一个是关于军阀式的文艺批评。

应该大力培养青年作者，这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有时在正确的原则下也可以搀假带水，也可以带有不符合原则的毛病。正因为从大的方面看是符合原则的，所以其它的毛病不容易被人揭露。我要说的是，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片面地强调培养青年作者，片面地强调依靠新生力量，这就混合着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由于这种宗派主义作祟，发生了轻视和打击老作家的现象，也发生了培养青年作者采取“粗制滥造”和“拔苗助长”的办法。有些青年作家是由“包办”产生的，有的是硬捧出来的。有的稍有一点成绩的青年作者对待老作家的态度非常狂妄、霸道，这和文艺领导上的宗派主义是有关系的，不能完全怪青年。

在批评问题上，正确的批评永远是需要的，但受宗派主义支

配的批評却要不得。关于宗派主义的批評，我可以举出下面两件事作为例子：

1953年我路过郑州，郑州高中請我去对学生們講一講如何学好語文課，如何作文。我講到一般散文开头不要写得太复杂，也不要空空洞洞地描景一大片（中学生作文常有此毛病），中間内容要充实，如果写矛盾，也要在中間展开，而最后結尾要結得有力，不可拖沓、松懈。講到这里，我引了清代大詩人王漁洋的話：“凤头、猪腹、豹尾。”过了一年以后，这件事我已經忘了，忽然看見“河南日报”上发表了青年批評家王大海的一篇文章，加油加酱地用辛辣的笔調对我尽情地嘲笑一通，重点是批評“凤头、猪腹、豹尾”的說法多么庸俗无聊，多么充满着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一个青年批評家沒讀王漁洋的詩話，誤把这个比喻算做我发明的，毫不足怪。但何必那么加油加酱呢？何必那么霸道，摆着一付“真理在我手中”的面孔呢？此无他，盖宗派主义作怪也。

今年春天，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創作杂談”，随后姚文元同志发表一篇文章，批評我的某些論点。尽管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有一部分我不同意，但态度非常好，文章本身也对我有許多启发。可是有一位陈霞同志在“萌芽”上发表一文，态度十分恶劣，有些地方簡直是含沙射影，作人身攻击。这是什么思想支使他写出这样的批評文章呢？也是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的批評者自認為在为馬克思主义文学而战斗，实际在拆共产党文化事业的墙根脚；自認為自己的意見最代表真理，实际是紅皮蘿卜，外边很紅，里边是白的。

为着树立良好的批評风气，我愿意不再看見象王大海和陈霞那样的批評文章。

三、“卢沟桥礼赞”中的一部分

(載“旅行家”1957年6月号)

.....
我繼續停留在卢沟桥上，回想着二十年前的一些印象.....

当北平放弃的头一天下午，我同千百成群的市民站立在南池子街旁，迎接那些从卢沟桥負伤下来的士兵，每次看到一个伤兵，街两旁的市民們响起来动人的掌声，老太太們自动地送上茶水，拉洋車的搶上去，声明不要一个錢送他到他要去的地方。人們看見了战士身上的鮮血滾出热泪，而那些伤員們，由于他們身經百战，从来沒看見过群众对他們这样热情，也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毕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青年，在鼓掌时常常忍不住哽咽起来。我在心里說：“我們再也不对帝国主义低头了！”

街上不断地叫卖着号外，上边虛构些大捷消息。但人們都很相信，誰也不相信日本人会能够占領北平。有一分号外上登載着头条消息，說蔣介石亲率机械化部队到了保定。这条謊話，使我同許多天真的青年們都兴奋和激动得滾着热泪。十年来我們天天痛恨蔣介石。当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时，我們因为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曾失望得整天吃不下一点东西。現在我們忘掉了十年仇恨，庆幸說：“老蔣到底轉变了！”不幸，蔣介石在当时还在动摇，我們住在北平的人們受騙了。

但是，抗战初期，蔣介石毕竟是主張抗战的，所以他在人民中間的声望、威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重点是我們所加——編者）。“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是中国有名的一句古訓。假若蔣介石后来不再背叛人民，难道到今天不是还有他应有的声望和地位么？不，即讓他第二次背叛了人民，但只要他今天肯回到祖国怀抱，人民不是依然会原諒他，不必去算旧帳么？

我仿佛聽見了台灣人民的怒吼，聽見了孤儿寡妇的哭泣，聽見了从大陸上去的老兵們的呻吟、叹息和怨憤声音，我还聽見了

刘自然的妻子哭着控訴：“难道一个美国軍士便可以肆意杀人，而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却不值一顧？”我又听見她在說：“我憤慨，我痛哭，我抗議，我控訴！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我只有向社会呼吁！”……最后，我仿佛看見卢沟桥幻化成一個慈祥的老人，衣服上带着补好的20年前的枪彈窟窿，用充滿感情的声音呼喚：

“迷途的孩子們，回来吧！”

突然，一队叮叮咚咚的鈴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是張郭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駱駝队，向北京送煤土轉回来，步伐安閑地走过桥去。一列很长的火車从北边的鉄桥上走过，機車上的灯光在桥西头的树林中向前飞着。我想起来，就在这一点多鐘头內，已經有三列火車通过鉄桥了。多么忙碌的桥呀！听说，不久京汉綫就改成复綫，那时候和卢沟桥平行的将不是一座鉄桥，而是两座。但是，我相信，卢沟桥将万古千秋地保存下去。

您光荣的桥啊！美丽的桥啊！夜已深了你休息吧。等明天你还要迎接一群一群的、从远方前来訪問的客人。

第二部分：在大鳴大放中的两次发言

一、5月24日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座談会上的发言

作协几年来領導工作成績很大，这方面不談了。我主要是談些工作上的缺点。

今天分会的工作，都是和总会有关系的，如檢查分会的工作，总会也有責任。我觉得在工作中宗派主义严重，这表现在出版方面。如选集，某某人的选集。有許多选集是好的，但也有許多选集是不好的，一位老作家到北京来告訴我說要爭取出选集，否則就沒有名字。我說明朝的作品，尚且能把作者的名字保留下来，何况是今天呢？他說：不，今天不同过去，宗派主义很严重。这虽然是个別的事情，但总可說明一些問題。我們在下面感到一团烏

烟瘴气。有某些作品不好的，却被捧到天上那么高，这些被推崇的大都是党员作家或解放区出来的作家。这是关于推崇作品的情况；在处理稿子也是这样，有些刊物发现一些具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就大加修改（连作品主题也修改了）发表了。但是老作家的作品发表就不利。在同一个刊物上，把工农作者比较差的作品登在第一篇，老作家的作品放在后面，这里面表现出宗派主义。

第二，批评方面。应肯定今天文艺批评是提高了，但是也有宗派主义。有些只读过一点马列主义的批评家，在山高皇帝远的情况下，随意就把一些好作品一笔抹杀了。只要翻一下下面的报纸刊物，就可以看见骂人的很多，不实事求是评价作品的情况很多。另一方面是锦上添花，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出版以后，武汉请人作报告，对该作品捧得很高，做了不适当的推崇，但在报告中学生们对作品提出意见很尖锐，但是他们认为这是老作家的作品，就不敢批评，如果批评他们认为要等中央批准才敢批评。第三，在培养青年作者工作方面，也有缺点。比如某个青年作者根据别人的小说，改写了一个作品交给编辑部，由编辑部姓朱的同志全部改写了，全篇只有几句话是作者自己的。但结果这位青年被捧，他到北京来开青年创作会议，几个出版社都找他订合同，并得了2000多元的稿费。这样作法，实际上就是拔苗助长。在培养青年作者同时，请不要忘掉老作家。又如青年作者×××，是被合作社开除的，也被捧起来了。

青年作家轻视老作家，认为老作家过时了，这主要是由于宗派主义所致的，所以这不能光怪青年作家，领导也有责任。

所谓“墙”中南是有的，李蕤是非党员，是“长江文艺”的副主编，但是有职无权，没有说话的余地。

官僚主义也严重，有些同志做了领导就自高自大，和过去的老朋友也不能开诚布公了。“长江文艺”编辑部看到领导的稿子，明明看到稿上有别字错字也不敢改。

非党作家几年来的心情，由于祖国的建设的迅速、伟大，心

里感動得掉下眼淚，但是又感到這些不是自己的，他們有許多熱情、力量不能發揮。比如一篇稿子大前提沒有問題，小前提有些問題，就往往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馬上就打回來了，這是與三段論有關。又如討論“儒林外史”是否有民主主義思想，我曾說有，但這樣提法卻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長江文藝”為此而要作家檢查小資產階級思想。這一來，作家就受到很大的壓抑。在舊社會可以隨便罵一罵，但新社會是自己的事業，你罵也不好，只好悶在心裡。

比如武漢分會訂規劃，要在十二年內要寫出若干長篇，多少電影腳本等，都是領導上主觀提出來的。

政治與藝術問題，“長江文藝”去年發表了許多工業建設的作品，但這些作品都缺乏藝術性。當提出意見後就被扣上胡風思想。所以老作家有意見也不敢提，怕戴上這頂帽子。

提出兩點希望：（1）過去對黨外老作家下去生活照顧不夠，如果是黨員作家就好辦，但非黨作家就不是這樣的，好些會不能參加，希望作為人民舌喉的作家下鄉下廠時能得到方便。（2）希望黨內外作家一視同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文藝競賽，如果非黨作家有成績也是黨的功勞。

二、在“文藝報”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

文藝界的主要矛盾表現在宗派主義與文藝界革命統一戰綫之間的矛盾，由於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存在，致使團結工作一直沒做好。許多作家，特別是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生活的老作家，有很多人感到情緒壓抑。他們在理智上愛護黨的文學事業，在感情上是痛苦的、半熱半冷的。幾年來他們的潛力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他們過去也寫過好作品，但對這些好作品肯定的還很不夠。文藝界的這道牆，必須推倒才好。

其次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一部分是由於簡單化地理解毛主

席对于文艺的意见，一部分是由于机械地、不加选择地学习苏联，第三是由于宗派主义作祟。他们自以为只有自己是党的文艺事业的保卫者，是最坚决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处处以“卫道”的精神出现。可是由于他们不虚心，对别人有成见，又加之自己知识实在有限，就只好把几句教条作为驱邪的咒语。这一点谈起来很复杂，我将来另外写出来吧。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中基本道理，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参加斗争，进行自我改造，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等等，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导原则。但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在跟着发展。今天除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今天提出文艺的“百花齐放”，也是发展。必须从发展看问题，把指导原则看成是活的，不是死的，才不犯教条主义。几年来，在解释毛主席意见上，有正确的，但也有偏向。例如，去年春天“长江文艺”发表了許多工业特写，肤浅、干枯、毫无文学价值，这就是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结果。又如片面地强调写通俗读物，不问作家对象，凡企图写一点非通俗性的艺术作品的作家，便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几年确实存在着粉饰现实的严重现象。大家不是没看见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不敢谈，更不敢写。如果多谈，别人会说你故意夸大阴暗面，有反党情绪。他们认为一切内部矛盾都是非本质的，或都是有敌人活动的结果。这样怎么能叫作家大胆地揭露内部矛盾？

文艺领导上的问题，各地区不同，各部门不同。一般说来，有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反映在对待作家不关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创作。其次，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没有某些文艺领导同志撑腰，是不会那样猖狂的。最后，有些文艺领导同志原来的根基就不厚，几年来忙于工作，学习少，又没机会下去生活，落在形势的背后。

我以为不怕文艺界内部有矛盾，有矛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目前只要“广开言路”，让大家畅所欲言，把问题吵出来，解决矛盾的方法自然也就产生了。

（这是姚雪垠在“文艺报”邀请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8期。）

第三部分：給姜弘的一封信

（按：这封信是从姚雪垠給姜弘的若干封信中选出来的一封。从这封信里已经明显地暴露了这批右派分子要使用一切手段，对党的领导，組織“里外夹攻”的恶毒企图。）

姜弘：

我的文章来不及写了，請你們不要等啦。

接李蕤信，頗为振奋，我打算在赴北戴河之前写一文章，但不一定寄回“长文”发表。如交北京或上海发表，对武汉三大主义里外夹攻（重点是編者加的），力量也許大些。

几年来，武汉流行为生产服务理論以及如何压制反对者的事实，我不很清楚，請你写給我，以便言之有物。

我在些（此）找的人日漸多起来，頗影响写作，故要提前去北戴河，离北京远一点。昨天我在中國書店专家服务部以10元高价买了一薄本旧書偶然遂，系一位明末襄城举人所写，叙述他被李自成队伍捕获及釋放經過。

关于程千帆与李尔重两同志，我已写一短文，交給“文汇报”了。

祝 好！

雪 垠

6月8日

淑耘（作协武汉分会党組成員，长江文艺副主編——編者）如何打击李蕤及老宋（李蕤爱人“长江文艺”編輯——編者），也請詳細写給我。希望在我动身前能收到你的信。

附：姚雪垠的历史簡介

姚雪垠是全国作协会员，作协武汉分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委员。

揭开姚雪垠的“进步”外衣，暴露在人民面前的却是一颗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原来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早在1929年混进了共产党内后，不久就开了小差；1937年，他又重新混进了共产党内，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极端艰苦的年代里，他在河南竹沟不但拒绝接受党分配的工作，还大量地散布了反党的言论，积极主张抗日必须统一服从国民党。反对党办教导队、办小报，认为党这样作是标新立异，不统一于国民党，不利于抗战。这样他就被党清洗出去。此后，姚雪垠就一面打着“进步文化人”的招牌，连续写出了“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低级色情的“作品”。在抗日的外衣下，贩卖色情毒素，以麻痹青年人的抗敌意志；一面他又与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勾勾搭搭；并与文化特务陈纪澧合编刊物“微波”，与另一文化特务孙陵保存着“极其温暖的友情”（陈与孙现都在台湾）。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姚竟与叛党分子张松和、石小萍以及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等纠集在一起，组织伪地下组织“中共中央华东局江南工作委员会”，由姚担任所谓“宣传部长”。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政治投机活动。上海解放后，即被取缔。

由此可见，姚雪垠在政治上，是一个一贯投机、反动的野心分子；在文学上，也是一个贩卖资产阶级庸俗的颓废的艺术观点的作家。

（以上材料，见8月31日“长江日报”）

江云在作协武汉分会 作家座談会上的发言

編者按：党内右派分子江云，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編輯兼文艺編輯室主任，作协武汉分会会员。这个材料，是她在5月31日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的作家座談会上发言的記錄稿。在这个发言中，江云对省、市委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詆蔑和謾罵，她反对出版社“三化”的方針，反对培养青年工农作者，企图为反革命的胡风翻案，为“草木篇”进行辯护，对党性加以歪曲。从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出，江云完全背叛了党，陷入了资产阶級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

我是一个沒有作品的作协会员，我只从編輯工作者的角度和与领导接触上提一些自己的看法。作协武汉分会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有成績，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如李准、吉学沛、韦其麟等青年作家的成长，都是和分会的帮助分不开的，成績当然是不在話下。但缺点和錯誤也不少，产生了一些滿足现状的情緒，在培养新生力量的旗帜下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沒有去正視它，沒有很好地总结經驗教訓，明确努力方向，使这一事业順利地向前发展。如黑丁同志对李准的作品的評價我認为是正确的，这表现了领导上能敏銳地发现作者的才华，热情地振臂高呼，帮助他站住脚跟，关注他的創作生涯，引导他从不成熟到成熟；对吉学沛的培养，我也認为是正确的。然而象对李准的推荐是仅有一次，这也是黑丁同志做的最漂亮的一次。而对高玉宝式的培养方法，我是怀疑的，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从一个不識字的人培养成作家，从写不通作文到能进行創作，从不知創作为何物而成为作家，把众多的社会組織应做的一系列的教育工作都加在作协和編輯身上，这是

不可能的，結果是事倍功零，這是走了一段彎路，結果是起來一批又倒下一批，又起來一批又倒下一批，例如曹桂梅、王東維、小真、小慧、曾立憲等，和在作協搞過專業創作而又轉業的一批青年，就是很大的教訓，這些被培養的所謂青年作家，只能在紀念會上說一通感激黨的話，紀念會完了，作者也完了。解放初期培養通訊員的方針，那是無可厚非的，但到今天還抱着一塊磚頭往下背，就走不動了，這是很大的教訓。如編輯部大量發展通訊員，強調每稿必退，每退必詳細提意見等，都是這種指導思想所派生的東西，它的副作用就是給出版社和刊物編輯部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編輯部人少事繁水平不高，但投稿的人往往以新生力量自稱，如果不退稿或者退稿而意見提得較簡單，立刻就會受到譴責和控告，形成了一種社會的壓力。編輯部大部分的力量幾乎都用在退稿方面，而對於能採用的稿子，則往往是匆匆發稿草率成書，對創作就沒有精力作細致的研究，老實說，90%的時間、精力都消耗在處理廢品上，古今中外的藝術大師哪一個是從編輯的退稿信中成長起來的？一個文學青年如果想從編輯的退稿信中找到自己的發展方向，這簡直是笑話。總之培養新生力量應如何理解，編輯部究竟如何工作，這正是領導上應該重視和考慮的，可是領導上對這些問題卻沒有站出來講話，“解鈴還需系鈴人”，領導上沒有決心解決這些問題，主要是惟恐傷害主流和旗幟，但這消耗了多少人的青春和物力財力！“拔苗助長”在武漢文藝界相當嚴重，領導上是否總結過、討論過，我不知道，這我們有過沉重的教訓，這種浪費，是任何增產節約的數字所不能比擬的。作為前進中的一個問題，領導上是沒有很好地正視和研究的，為什麼解放七年來，費了這大的勁，沒有培養出人來？而長期以來迷戀於工作的表面成績。

武漢市的文藝思想，作協也沒有起到任何領導作用，究竟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那就要看省市領導的眼色行事。出了名站住了腳的，才加以注意。武漢市並沒有認真的領導討論過什

么問題，沒有看到任何真知灼見的理论，也沒有真正注意文艺特質的文章，因而有些該肯定的作品长期不見天日，而一些平庸的作品却充斥市場。象“揚子江边”，因作者是×××，就受到重視；而“二月七日”作者是沈沙，就百般苛求，不但不排演，还长期拿不出来。从艺术質量来看，“二月七日”比“揚子江边”高明的多，“揚子江边”整个剧本是交代工作方法，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在作品中得到真正的艺术的解决，並沒有刻画出站得住脚的人物，但剧本還沒写好，只有提綱的时候，就决定排演，参加全国話剧汇演，汇演以后，文艺界議論紛紛，而省委×××或×××同志却撐腰說：“为什么工作方法不可以写，工作方法不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嘛？”是不是一个作品省委書記給了封号，就成了艺术作品呢？大家只能在下面发发牢騷，不敢公开提出批評。而“二月七日”，从題材、人物刻画到情节結構，我認为都要比“揚子江边”高明多啦，是更富于艺术魅力的作品，却一改再改，还是不能演出。

楚奇的“不沉的軍艦”，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魅力，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但討論中說把敌人写的太猖狂了，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本質，因国民党是人心渙散众叛亲离嘛，結果这不是本質，那不是本質，就把它給彻底否定了。

程云同志写的“苏武牧羊”，由于牵涉到李陵的历史評价問題，也被擱下了，我看作家完全有权利把他写成叛徒，因为作品不是历史教科書，关于历史結論，那是历史家的事。这一些例子說明我們不能很好的从艺术特質来考慮問題，而且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象对吳烟痕、吉学沛、沈沙等作者，就应根据他們不同的特点，有系統的进行帮助，这些作协都沒有有意識的組織文艺陣綫的力量，进行帮助，对一部分人只是任其自流自生自灭，长期熟視无睹，只是作了些官样文章。对艺术作品是人云亦云，没有什么真知灼見的文章，对新生力量无动于衷，有了一块牌子，甘霖降下去，還沒出名就在领导的視綫之外了。

在反胡风时，有些人是奉命批判的，根本沒有讀过胡风的什

么东西。我不知道别人，我是不了解胡风的作品的，我很“佩服”××同志，他平时没有看过胡风的一本书，但到要做报告了，临时翻了一下书，一讲就是几个钟头，真令人奇怪。而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学论文却没有，只是奉命正确。为什么现在有人要替胡风翻案了？因为那时是人云亦云，不晓得葫蘆是长的方的圆的扁的，现在人们看到了葫蘆原来不是那么回事，难怪要替胡风翻案了。

我和黑丁同志的接触不少也不多，他给出版社很多关怀，这是很突出的，在提携后进方面，是很好的。但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是不同意的，那就是黑丁同志的党性问题，黑丁同志的党性包括了听话的成份的。几年来，文学艺术事业不为省市领导的重视，如房子问题，作协房子又黑又窄，拥挤不堪，武汉市的好房子之多，并不下于其它城市，为什么不解决呢？省市委究竟给作协以多大的帮助和关怀呢？作协的经济开支，财政部门没有作协的预算，名符其实的“黑丁领导黑户”，去年刊物的支出是挂在出版社的名下，敷衍过日子。由于经济困难，自然影响了支援作家、团结作家的的工作。刊物纸张不能得到解决，影响了刊物发行数的大量下降。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黑丁同志却不能据理力争，争取领导上的重视，不能为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向“三害”进行斗争，我认为这不是党性强的表现。

从中南局撤销以后，武汉市文艺界一天天不受重视，这些都与黑丁同志的党性有关系，怎么说怎么作，一句话，没有斗争性，这是不是叫党性？黑丁同志知道领导上的困难多些，因而就体谅些，但这些问题不解决事业就要受损失，如果对党的文学事业高度负责，是应该经常吵还是经常听话？黑丁同志走了一条简单、方便的道路，就是听话，对领导上是起了减少阻力和减少麻烦的作用，而对文艺事业并不有利，纸张问题，×××不同意，就应该吵到×××那里去。黑丁同志既然是听话干部，对下面干部也是要求听话。

在去年全國作協召開的擴大理事會議上，王若望同志在理論小組提出的問題是最受小組同志注意的，而黑丁同志在聽的時候，表現了坐立不安，看他那樣子，好像在說王若望怎麼這樣沒有党性、組織性呢？自己口頭上提倡干預生活，而却在生活面前感到胆怯，中央一說話就理直氣壯，如果不說話，就沉默不語了。說“草木篇”不好，我今天還不理解，如“藤”，生活中難道沒有這種人嗎？我看有，為什麼不可以描寫呢？如果說作者有殺父之仇我不知道，但就作品本身來看，並不是造謠誣蔑，我這可能完全是謬論，姑妄言之。

黑丁同志是幾個大領導中的一個，我在這裡反，家中也在反我，我們這些幹部是跟着活造孽。

黑丁同志對上面聽話，對下面要求幹部也聽話，一切都規規矩矩，我認為這不是党性，党性就是要向那些官僚主義和沒有良心的人進行鬥爭。聽說出版社這麼多的問題×××同志還是第一次才聽到，為什麼會形成這厚一道牆呢？還不是那許多有党性的人所造成的。

領導上提出出版社要通俗化、群眾化等“三化”，現在我們是陽奉陰違，因為如果聽“三化”的話，出的書沒人看，沒人買，出版社就得關門，陽奉陰違出版社就可以發展，這就還得要陽奉陰違。

作協領導上不能聽其他的聲音，這也表現在刊物上，“長江文藝”拿固定的框子要求人，因此就限制了幹部的積極性，也限制了刊物的長足發展。

這些感觸，在我來說是經過了長期痛苦的鬥爭過程的，在我們那裡，黨性強，固然有好的作用，但也起了“蓋子”的作用。

關於批評，在我們那里的黑板報對領導畫了點小漫畫，寫了點打油詩，批評了個把××，就一跳多高，說這不是對領導的態度，×××還說這是出領導的洋相，又說中央規定批評這些太守老爺要經過省市批准才行。掌握批評不好與我這支委有關係，

既是中央精神，我就只好檢討。現在看來，跳吧！我看你怎么跳！象我这样的干部，也是奉命正确，赶浪头，起着盖子的作用。

在职工福利問題上，几年来我們栽了几个筋斗？先是批評了李立三的工联主义；強調关心职工生活时就說人間天河，增产節約时又說柜台为什么不可以睡。

在文艺作品上也是这样的，往往作品是一回事，生活又是一回事。我們的文艺領導只允許歌功頌德，批評了一个区委会，全国的区委会就都緊張起来了。中央說了話，就理直气壮五体投地，批評起来非要人家身敗名裂。陈其通的文章发表以后，×××也出来报告了，但陈其通事件（中央批評后）又檢討。开禁，我認為也包括要讓作家干預生活，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我感觉問題是包不住的，不然就是象創作中的无冲突論，只能好！更好！我自己感到路子越走越窄，越走战斗性越弱，越缺乏信心。